

總第 21

MARCH 2026

左野黨™
Opposition Party
Freedom, Truth, Resistance



OPPOSITION PARTY

策劃：毛慶祥

火種不滅，精神長存

海內外民主實踐與觀察

網址：www.ZYD1998.com

The greatness of a nation and the progress of its moral character can best be judged by how it treats its people

中國民主黨主辦

中国民主党急切呼吁救助创党元老吕耿松

吕耿松，1956年1月7日出生，中国民主党浙江筹委会发起人之一，兼维权人士。1993年因支持民主运动而被其所属警察院校开除教职，此后继续写作，2008年因言获罪，被杭州法院以“煽动颠覆国家政权罪”判刑4年。2011年刑满获释，狱中获独立中文笔会“狱中作家奖”。

2014年，吕耿松先生再度以“颠覆国家政权罪”被捕。

2016年6月17日下午2点30分由杭州中级法院宣判，吕耿松先生被判处有期徒刑11年，剥夺政治权利5年。

根据杭州中级人民法院认定吕耿松是中国民主党的重要领导人之一。

2025年7月吕耿松刑满释放。

如今刑满释放不到8个月的吕耿松先生被诊断出“结肠癌”中期。现已住院手术治疗。手术治疗及后期治疗用药需要大量费用。由于吕耿松先生被当局迫害长期坐牢没有经济来源，吕耿松先生夫人汪雪娥一直靠打临工来维持日常最基本的开支。如今面临这么一大笔医疗费，已陷入非常艰难的困境了。

在此呼吁各位同仁和团体能伸出援手帮助吕耿松先生渡过难关！

谢谢各位！

中国民主党

请转账至以下账户，备注信息：Lgs + 捐款人姓名

Zelle (手机号)：6266151314

或 Zelle (邮箱)：zaiyedang20250625@gmail.com

账户名称：Los Angeles DPC Fund 或 账户名称：Opposition Party Inc.

收款方将为捐助者出具感谢信，《在野党》杂志社将于刊物中公示本次捐款信息以致感谢。

专项捐款 300 美元以上赠送当期杂志。

专项捐款 2000 美元或全年累计捐款 3000 美元以上赠送全年杂志。



開篇 <u>Prologue</u>	01	目錄 <u>Preface</u>
在野黨簡介 <u>Contents</u>	02	03
思想火種 <u>The seed of ideas</u>	05	05
05-07	05-07	人物專訪 <u>Voices of Change</u>
08-16	08-16	民主火種 <u>The Spark of Democracy</u>
真相中國 <u>Truth China</u>	17	17
17	17	中共罪行 <u>The CCP's Crimes</u>
18-23	18-23	時事評論 <u>Current Affairs Commentary</u>
24-34	24-34	社會評論 <u>Social Commentary</u>
民運之路 <u>The Road to Democracy Activism</u>	35	35
35-46	35-46	民運之聲 <u>Voices of the Democracy Movement</u>
47-50	47-50	民運行動 <u>Democratic action</u>
51-53	51-53	民運同道 <u>Fellow Democracy Activists</u>
連載 <u>Serial</u>	54	54
54-56	54-56	作品連載 <u>Serialized Works</u>
檔案館 <u>Archives</u>	57	57
55-58	55-58	迫害實錄 <u>Persecution Records</u>
59-60	59-60	中國記憶 <u>Chinese Memory</u>
雜誌社介紹 <u>About the Magazine</u>	61	61

《在野党》简介

《在野党》杂志是中国民主党组党时期唯一的党刊，以传播中国的民主、人权等理念为宗旨，成立于1998年9月。《在野党》由毛庆祥先生倡议，并在中国浙江省创办，浙江筹委会成员轮值各期的编撰。出刊至第9期后，绝大多数成员被抓，刊物由聂敏之、陈树庆、王荣清继续出刊至第11期，因聂敏之等人被抓而停刊。

但民主火种一直未灭，在历经27年之久，在毛庆祥、谢长发、朱虞夫和郑存柱等海内外中国民主党人的共同努力下，期刊于2025年6月25日在美国洛杉矶成功复刊。它正在以全新的面貌，延续前辈的精神火炬。

复刊《在野党》杂志分为《思想火种》、《真相中国》、《民运之路》、《视频专栏》、《作品连载》、《档案馆》等内容模块，设有官方网站 <https://www.zyd1998.com>，并于每月25日刊出电子期刊，纸质期刊会同步发布，敬请订阅。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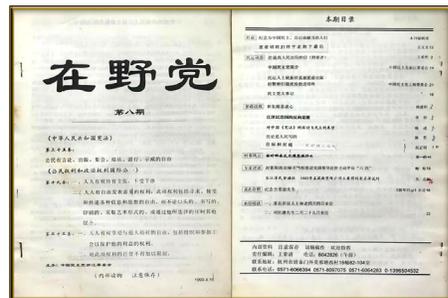
主要成员介绍：

毛庆祥（1950年5月24日），中国民主党创始党员，新《在野党》杂志的发起者。浙江杭州人，自由撰稿人、人权活动家。1976年“四·五运动”参与者，被关押三个月；1978年起投身杭州民主墙运动，担任《四五》、《华东》等民刊编辑，1981年因“反革命宣传煽动罪”判刑三年。1998年积极筹建中国民主党，主编党刊《在野党》。1999年6月被捕，11月以“颠覆国家政权罪”获刑八年、剥夺政治权利三年，直至2007年9月14日刑满获释。目前居住在中国大陆。

朱虞夫（1954年2月1日），现任《在野党》杂志总编辑。浙江杭州人，诗人、异议作家、人权活动家、中国民主党创始党员。1978年底投入杭州民主墙运动，是发起人之一，主编《四五》月刊，并多次被传唤、抄家。1989年“六四”因“参与动乱”被收容审查，撤职；1998年积极参与中国民主党的筹备工作，并于当年11月当选为浙江筹委会常务工作组秘书长、全国筹委会筹委。1999年6月19日被捕，9月15日正式以“颠覆国家政权罪”判刑七年、剥夺政治权利三年，2006年9月15日出狱。出狱后仍持续民主运动，2007年再次被捕判刑二年、剥权二年；2011年因“茉莉花运动”被捕。判刑七年、剥权三年，累计服刑达16年。出狱后仍被严密监控，直至胃癌晚期出境治疗，目前居住在美国。

谢长发（1951年10月7日），中国民主党湖南筹委会主席，是复刊《在野党》杂志的倡议人。湖南望城县坪塘镇人，民主异议人士。1989年参与天安门民主运动，任“工自联”领袖，六四后坚持公开谴责当局暴行，被判劳动教养两年。1998年与潘明栋等筹建中国民主党湖南筹委会，屡次遭拘留；自2002年起坚持定期聚会，联系各地民运人士并资助经济困难者。2005年撰写《中国民主党宣言》、《昭告海外同胞书》等文，并筹划召开全国代表大会。2008年因批评汶川地震“豆腐渣工程”再度被捕，2009年以“颠覆国家政权罪”判刑13年。目前居住在中国大陆。

郑存柱（1967年），现任《在野党》杂志社社长。安徽合肥人，曾任中学、大学教师、出版社编辑、企业家、人权活动家、中国民主党党员、海外党部高层人士。1989年六四期间发起合肥学生运动，组织发起安徽省高校自治联合会并率学生赴京声援，是安徽省与政府谈判的学生代表之一。2000年在上海秘密参加中国民主党，2006年在美国洛杉矶建立海外联合总部，历任全国联合总部副秘书长及副主席、主席等职务。



图为《在野党》第八期

组织框架介绍:

总编辑: 朱虞夫 社长: 郑存柱 出品人: 景辉辰

荣誉主编 (目前均居住在中国大陆): 毛庆祥、谢长发、胡石根、陈西、吕耿松、查建国、陈树庆、许万平、刘贤斌、胡明君、黄燕明

《在野党》设副总编辑、副社长、轮值总编辑、副主编、编辑部、责任编辑部、美编部、信息技术部、采访部、翻译部、收稿部、校对部、宣传与发行部等职能部门和行政部、财政部、外联部、人权观察部等综合部门, 并设有日本及加拿大分社, 成员多为中国民主党的海外新生力量。



图为《在野党》复刊第十二期杂志社部分成员 - 洛杉矶

Introduction to The Opposition Party

The Opposition Party was founded in September 1998 as the only official publication of the China Democracy Party during its formative years. Initiated in Zhejiang by Mao Qingxiang, with members of the Zhejiang Preparatory Committee editing in rotation, the journal was dedicated to advancing the values of democracy, human rights, and civic participation in China. By its ninth issue, most of its editors had been arrested; even so, Nie Minzhi, Chen Shuqing, and Wang Rongqing continued until the eleventh issue, when further arrests forced it into silence. For years, the publication remained a symbol of democratic aspiration and the sacrifices borne by its founders.

After twenty-seven years, the flame was reignited. On June 25, 2025, through the joint efforts of veteran leaders Mao Qingxiang, Xie Changfa, Zhu Yufu, and Zheng Cunzhu, together with a new generation of overseas activists, The Opposition Party was successfully revived in Los Angeles. Its reappearance not only honors those who endured prison and repression but also reaffirms the commitment to record truth, preserve memory, and carry forward the ideals of freedom and human dignity.

The renewed The Opposition Party is published monthly, in both digital and print editions, with sections such as Seeds of Thought, China Unveiled, Paths of the Movement, Video Columns, Serialized Works, and Archives. It maintains an official website at www.zyd1998.com As a platform for dissent, it seeks to amplify voices silenced inside China, to link the efforts of activists at home and abroad, and to ensure that the struggles of past and present are neither erased nor forgotten. Above all, it stands as both a witness to history and a torch for the future, sustaining the spirit of opposition through changing times.

For the full English version, please visit: www.ZYD1998.com

他因一句话坐牢十四年

— 专访郭泉

采访：林小龙 资料整理：赵杰 编辑：张致君 责任编辑：朱虞夫 美编：胡海宁

在当今中国政治言论空间持续收紧、公共表达不断被压缩的现实中，公开讨论制度问题本身已成为一种风险行为。在这样的环境下，仍坚持表达独立政治观点的人，往往要付出沉重代价。郭泉，曾任南京师范大学副教授，社会学硕士、哲学博士，正是这样一位在高压之下持续发声的学者型异议人士。

与许多仅停留在学术讨论层面的知识分子不同，郭泉将其政治理念直接付诸实践。他并不满足于抽象地讨论“民主”“自由”等概念，而是以极为明确甚至具有挑战性的方式提出：真正的制度核心不在于修辞，而在于“多党竞选”。在他看来，所有可以被专制体制反复包装和利用的政治话语——无论是“民主”“法治”还是“宪政”——如果缺乏真实的权力竞争机制，都不过是对权力的再装饰。

2007年，郭泉在互联网发起组建“中国新民党”，公开主张以多党竞选取代一党专政。这一举动立即触碰政治禁区，使其成为当局重点打压对象。2008年，他以“颠覆国家政权罪”被判刑十年；出狱后短短一年多时间，再次因言论问题被捕并被判刑四年，直至2024年才得以再次走出监狱。前后超过十年的牢狱生涯，并未使其沉默，反而使其立场更加激进、表达更加直接。

郭泉的特殊之处，在于他不仅是制度批评者，更是制度替代方案的明确倡导者。他将复杂的政治问题压缩为一个极具冲击力的判断：没有多党竞选，就不存在真正意义上的民主；一切不建立在权力竞争基础上的制度，最终都将滑向专制。这种高度简化但极具指向性的表达，使其观点在支持者与反对者之间都引发强烈反响。

在一个强调“稳定压倒一切”的政治环境中，郭泉的持续表达本身，已构成一种对现实秩序的挑战。他的经历，也折射出当代中国公共知识分子所面临的共同困境：在表达与风险之间反复权衡，在沉默与发声之间作出选择。

本次采访中，郭泉不仅回顾了自身从学术研究走向政治表达的思想路径，也进一步阐述了其对专制体制、外部干预以及中国未来政治转型的判断。他的观点或许激烈，甚至具有争议，但在日益收缩的公共空间中，这样的声音本身，已成为值得记录的一部分。

林小龙：郭先生您好，鉴于目前国内的严峻政治言论环境，关于本次采访您的问题，你愿意回答就回答，不愿意回答，你换个题目就是了。

首先我想您这边能不能简单介绍一下您的一个成长的经历和家庭背景，对您的成年后的价值观会产生过什么影响，以至于后来您在那样一个政治高压的社会敢于公开的发表自己的政治观点并也为此付出巨大的代价。

郭泉先生：我先简单介绍一下我自己，我是1987年上大学，所以经历过八九六四运动，但是我不是在北京，不是在天安门，我们在全国各地，在各自的地方，也就是参加过那次的运动。那么之后呢，也是经历过，接受过一些民主思想的熏陶，后来90年大学毕业后带着这些民主思想后就走向工作岗位，它就会对我的日常生活产生了很大影响。

先是在企业政府里面工作，那么就发现很多社会问题，如果不用民主的方式进行解决，那就解决不了，虽然专制制度它很能解决一些问题，但是它在民主决策上面是有很大很大问题的。所以我93年就考了南京大学社会学的硕士，在这个社会学硕士的学习过程中，我更加发现民主制度会给社会带来一种运作方式，但是专制不



行。所以说硕士毕业之后，然后读博士，这个时候是在法院工作，在南京市法院工作。那么在法院的审判工作当中，也发现很多很多的，其实社会问题是专制体制造成的。所以后来我就又去读了哲学博士，在读哲学博士基本上形成的观念就是，政治它跟哲学是密不可分的。也就是说，如果不用哲学来思考政治，那么政治就会走向极端。

所以说在96年到99年读哲学博士，这三年就形成了民主观，也就是普世价值。那么这个普世价值呢，现在整个社会也在讲普世价值，但是比如说自由，民主，我认为自由民主这四个字，专制者它也会拿来忽悠人，它也会用说：我们是社会主义民主，社会主义法治，甚至还有我们社会主义也是自由。所以我觉得这个不行，所以我把这个自由民主换成四个字，多党竞选，我认为只有多党竞选，才能制衡专制。

林小龙：是的，几乎所有的反美的国家它都是专制的制度，它有一个共同特点，就是它不愿意多党竞选。

郭泉先生：所以这个是专制制度的死穴。我在我写的文章里面讲过这个问题，后来1999年博士毕业，我到南师大做博士后，在博士后研究的课题就是：自由主义文学，这个更加让我觉得，一切社会矛盾的根本原因，就是缺乏民主制度。所以后来做了博士后论文结束之后，留在南师大做副教授，在教学过程中，就逐渐地给同学们探讨民主制度，然后和他们一起研究中国未来的发展方向。最后逐渐到了2007年，就自己在网上发起了中国新民党。那么到2008年，就抓起来，被判刑，判了10年，那么整个这个过程呢，就是从发展到被捕，然后

在监狱里 10 年，出来 2018 年，出来我的观点不仅没有改变，相反越来越成熟，越来越成熟。就是说多党竞选，哪怕有一万个，这不好，比如说效率的一种损耗，那不好啊，比如：是决策的缓慢，或者其他对于专制制度的劣势，但是多党竞争的制度都要比专制要好。这是一个确定的概念，就是民主制、多党竞选的民主制，一定比专制要好。所以你专制制度怎么伪装自己，说我们是社会主义民主，全过程民主，等等，那肯定是不如多党竞选的。这是肯定的。所以到现在 2020 年，就出狱一年两个月，又被捕了，又说我是在煽动宣传颠覆国家政权罪，又判了 4 年，到 2024 年出来。出来之后，我没有任何改变，还是在写文章，包括现在，我认为关注国际政治的民主发展，对中国将来是有很大的一个借鉴和促进作用的。所以我现在在我的文章已经不大关注中国内部的事务，因为我觉得中国内部事务其实很简单，比如说什么食品问题啦、环境问题啦、这个维权问题啦，这些我认为这些东西如果用多党竞选，一切迎刃而解。

林小龙：您的这个多党竞选理论是与宪政这个概念有什么区别，这两者有什么不一样的地方？

郭泉先生：就现在，我们中国现在也讲我们国家也是宪政民主，但其实它不是多党竞争的。就是说，如果不是多党竞争，那你是什么宪政都没有用的。因为这可以就像我刚才讲的，民主、自由、宪政、法治，专制国家它也这样讲了。历史上秦始皇统治的时期，它也有秦朝的法律，它也可以说它是法治国家，皇权专制。所以，用多党竞争这四个字来替代一切，就是掩盖真相的那些名词，什么人权啊、自由啊、民主啊、法治啊、宪政啊，那些东西我认为全部都会被专制者利用。即使是希特勒活到现在，或者是慈禧太后活到现在，她也是。

林小龙：对，要落在实处，落在实处就是四个字：多党竞选。关于竞选，您认为，如果实现这个多党竞选，需要什么样的社会去变动或者推动，然后怎么样去实现这个呢？

郭泉先生：过程呢，我现在我的感觉呢就是如果没有美国打击委内瑞拉，没有美国打击伊朗，这种方式是实现不了的。也就是说，如果美国不去把马杜罗抓到美国，那么委内瑞拉永远都是这种专制国家。那么，如果没有美国对伊朗发动的实施怒火行动，伊朗永远不可能走向民主。那么，同样是中国，也是现在有很多人认为，专制制度自己内部矛盾、内部斗争，会出现像蒋经国或者戈尔巴乔夫这种敢于推翻的专制制度的人，那种方式就是自动的通过党内内部的斗争走向民主，我认为不可能，所以必须借助外力，一定要来自外力的干预。

林小龙：但是我的了解的就是共产党，它是一个集体，它现在是一个集体在执行这个专政，并不是一个人。如果就是把这个人，就是把一个总统，或者把习近平这个抓了以后，但依然不会影响这种专制体制，不会走到您说的那个多党竞选。

郭泉先生：我今天写的文章就谈到这个事情，就是说让一个领导人先走，根本不能动摇它整个管理体制的那种运行方式，就是说如果是川普总统这次把哈梅内伊杀死了，但是没有把革命卫队所有的管理层消灭的话，那没有用的，他换成他儿子就行了，他儿子还有什么弟弟啊，哥哥啊，甚至还有孙子啊。所以说，现在的问题已经不是让领导人先走，而是要让领导层全走，让整个管理体制全部消灭，才能够让老百姓去建立一个新的政权，一个新的政府。但是呢，在委内瑞拉这个问题上，川普总统选择了一个方法，就是先用了你原来的人，但是你原来那些人如果不是按照美国那种操作方式操作的话，美国照样把你清除掉。所以川普总统现在就是用委内瑞拉原来政府里面的一些人进行临时的操作，目的是为了过渡到最后多党竞选，这点是很明确的，就是他的现在临时政府是为了多党竞选做准备。

林小龙：也就是说你认为：未来中国如果要实现多党竞选这条路，就必须依赖外部的力量干预。

郭泉先生：对，就是只有外力，只有外力，否则不可能的，因为中国九千万党员，你去掉哪一个，那么还有其他人，就会继续上台专政。

林小龙：那您认为普通的老百姓如何参与这样一个进程，如何贡献自己的一份力量，在推动中国民主这个事情上去呢？

郭泉先生：我觉得就是，就像我一样嘛，接受你们的采访嘛，和你们在海外的朋友们做朋友嘛，然后写文章，多介绍国外的一些情况，然后让国外的一些先进的制度，能让中国人知道。然后也要让我们这些在国内的人做的事情，让海外的人知道。这个就像什么呢？就是，如果一个新的政府要使用人的话，它当然要使用符合新的运行体制的人，不能使用原来的人的。所以说，我们这些人将来肯定是新社会要使用的人。所以说，我们现在在国内的人，如果你愿意成为新社会使用的力量，那么现在就要露出你的光芒，要准备好。

林小龙：您认为这个进程会很快吗？

郭泉先生：我个人认为还是很快的，因为中国经济现在越来越下滑，老百姓的生活很显然没有前几年好了。中国跟克林顿当时搞这个经济捆绑，那个时候经济非常好，现在基本上脱钩，断链差不多了。经济非常不好，这就是一种内在的因素，就是说老百姓希望生活。然后，另外中国有一种这个扩张的这种意图，这种意图跟美国是冲突的，所以说必然未来中美冲突可能会以某种方式会发生。

从经济战发生到外交战，最后还是能发生成热战的。只要一旦热战爆发，那么中国就会发生变化，就会发生变化。所以现在看中国攻台，中国打台湾可能是解决问题的一个关键的时间点。所以我经常跟很多人开玩笑，我想如果中国不攻打台湾，那么中国就会永远这样，因为国际社会没有办法改变中国。那么，但是中国如果攻

打台湾，那么很有可能这就是一个破局。比如说其他国家就会美日澳就会联合起来帮助台湾。如果中国不攻打台湾，那中国永远跟国际社会不会战斗，那不会战斗，那它永远能执政。所以说如果中国不发声攻台，很有可能，因为没有办法可以改变他，没有办法。中国老百姓可以讲，14亿人，14亿没有枪的人根本打不过10万有枪的。

林小龙：对1989年，我们已经经历过了。

郭泉先生：对呀，所以那个伊朗9000万人根本打不过10万革命卫队，根本打不过。所以说，美国必须帮伊朗人民。如果美国不帮伊朗人民，伊朗永远永远被这个伊朗邪恶政权统治。

林小龙：在您公开表达自己的政治观点后，您印象最深刻的是有什么具体事件？因为您经历过很多困难和压力嘛，包括被逮捕，判刑过程中。

郭泉先生：我最深刻的，就是总是社会上有很多人理解我。我觉得这个是最开心，也是最让人鼓舞的地方。如果我做这个事，很多人不能理解，社会上人不能理解，那么我就觉得我做错了。如果是一部分人不理解，但是另外一部分人理解，多党竞选就是有人赞同你，有人支持你，要有人反对你，对吧，有人反对你，有人支持你，那我现在，我总是能发现有人支持我，这就够了。包括很多朋友，在我没有收入的情况下，看我文章，看我一篇文章，打赏一元钱。钱虽然不多，但是就这样子，也能够让我生存了，所以非常开心。

林小龙：这个也是您持续这样做自己的一个观点，去形成一个动力。对，只要有人支持你，这就是动力，我之前也对中国的一些大民众稍微有一点失望吧。但是听您这么说，我觉得还是我们还是有一定的希望的。

郭泉先生：现在可以讲就是改变。我们没有办法，没有什么改变的。你比如说：你要想帮老百姓维权，或者批评政府，那么很显然，马上就坐牢，这改变是不可能的。所以我现在就是说，我们现在能做的，我认为就是把自己这把宝剑打造成锋利，等待最后的时刻，我们要杀出去，要恢复这个宝剑的。所以说，现在的在国内的人应该多写文章，多接收你们的访谈，然后让社会上知道，比如说这个中国还有一个郭泉，还有一个某某某。那么将来这个社会发生变革之后，这些人要能用起来，要能用起来。比如说，我从2007年写文章，一直写到现在，除了坐牢的时间，其他时间一天一篇文章，一天一篇文章。那么整个国际社会都在关注，都知道我的思想始终没有发生变化。那么等到中国社会发生变化之后，那么我就是可以被用的人，被使用的人。至于放在什么岗位上使用，那个时候需要竞选，但是如果你在国内，你默默无闻，或者你有观点却没有文章，你怎么能接受别人的选择呢？你怎么参加？

林小龙：对的。最后一点，您对接下来中国的一些年轻一代，您有什么想说的，或者一个期待？

郭泉先生：我不建议大家搞一些实体性的对抗运动，

因为这个很显然，你只要稍微有一点活动就会被消失。

我建议大家第一个：就是了解中国现状，这个很关键。那么了解这个现状呢。

第二个：必须得出一个结论，就只有多党竞选才能解决这个问题，其他没有用。很多人讲改革开放，改革开放能解决这个问题，但是改革开放，它是在党内，是一种专制的延续方式，它并不是在根本上解决问题的。所以，根本上解决问题还是多党竞选，这点是明确无误的。

第三个：你要持续表达你的观点，而且要强化，强化就是每天都要有表达，这样才能到了一个新时代之后，你才有资本来参与竞选。因为最终，中国不是靠打打杀杀，像革命者，像那种成为领导人的，一定不是，一定是多党竞选。那么多党竞选的一个核心，就是你曾经做过的事和你曾经的表达，这个才是最关键的。如果你曾经没有做过事，你只有表达也不行，因为别人会讲某某人只会说，不会做，所以说，又要有行动，又要有表达。当然，现在行动是很困难了，但是也要做一些行动，要有表达。最后还要跟国外建立好一种良好的关系，因为最终的中国一定是像委内瑞拉和美国，伊朗和美国最后的那种连接方式，它是建立在美国这个民主思想熏陶下的。中国一定的未来是这样子，它不可能是脱离美国搞的一个民主制度，这肯定不行的。比如现在欧洲，欧洲现在的民主制度就是脱离美国的一种民主制度，结果出问题了吧。你讲西班牙呀，法国呀，英国啊，他们都脱离美国来搞他们的民主，最后就搞成了一种类似于伊斯兰社会主义的东西，这个多可怕。

林小龙：是的，感谢郭老师接受我们在野党杂志采访，也希望中国早日实现我们的多党执政制度，保重，再见。

编者按：

在本次访谈中，郭泉以其一贯鲜明而坚定的立场，反复强调“多党竞选”作为政治制度核心的重要性。在他看来，衡量一个制度是否具备民主性质的关键，并不在于其宣称的理念或标签，而在于是否存在真实、有效的权力竞争机制。相较于任何形式的专制体制，多党竞争不仅是一种制度安排，更是一种防止权力固化与滥用的根本性保障，是解决社会矛盾与实现公共利益的必要前提。

与此同时，郭泉对中国未来可能出现的变革路径也作出了明确而直接的判断。他认为，在现有权力结构高度稳固的情况下，单纯依赖内部演变难以撼动体制根基，国际格局的变化与外部力量的介入，将在某种程度上成为推动转型的重要变量。这一判断，既反映出其对现实结构的清醒认知，也体现出其对制度变迁路径的激进预设。

对于个体而言，郭泉特别强调“准备”的意义。他认为，制度的更替不会自动完成，它最终需要具体的人去参与、去承担、去构建。因此，持续表达、形成思想、积累公共记录，不仅是一种个人选择，更是一种面向未来的政治准备。在他看来，未来的新制度不会凭空产生，它需要一批早已完成自我塑造的人，作为其参与者与推动者。

更进一步，这种“表达本身”的意义，甚至在当下就已经成立。在一个表达受限、风险高企的环境中，发声不再只是意见的传递，而成为一种对沉默机制的突破。它既是对现实秩序的微小撬动，也是对未来可能性的提前书写。

尽管现实环境依然严峻，代价依然真实存在，但正如郭泉在访谈中所言，只要仍有人理解与支持，这种表达便不会是徒劳的。它所维系，不只是个体的立场，更是一种尚未消失的公共精神。

而这种持续而稀缺的声音，也正构成了当下中国公共知识分子群体中，少见却未曾断裂的思想脉络。

记中国民主党人毛庆祥的夫人胡晓玲女士

作者：司空先让

编辑：钟然 校对：程筱筱 翻译：周敏 美编：胡海宁

在浙江有这么一个类似当年沙俄时期“十二月党人”夫人的群体，这个群体的代表人物就是中国民主党人毛庆祥的夫人胡晓玲女士。

胡晓玲女士出生于名门之后，母亲祖上是嘉兴名门望族蒋光焯，蒋光焯，清著名藏书家。(1825—1892)当年在嘉兴赫赫有名的“衍芬堂”就是祖上在嘉兴府的府邸。

胡晓玲女士的母亲，年轻时非常漂亮，接受过现代西方教育，能说上一口流利的英语。加上性格活泼，更是受人尊敬喜爱。胡晓玲的母亲在民国时期就在杭州铁路公司重要部门工作。

1947年胡晓玲的母亲，因曾无意间被同学拉进过国民党的“三青团”组织，加上其出生成分不好，在共党掌权后的历次政治运动中经历过不同程度地政治迫害甚至差点送命。胡晓玲也因此从小就遭受歧视和不公，这经历对胡晓玲之后支持民主党人毛庆祥反中共政权是有着不可分割关系的。

1980年，被政治运动整怕了的胡晓玲女士的母亲得知胡晓玲与79年“民主墙”的热血青年毛庆祥谈恋爱时，是坚决反对不同意的。

毛庆祥杭州人，出生于1950年。曾在上海警备区服役，1971年服役期满，退伍后分配到杭州磁钢厂工作。

1979年，发端于北京西单民主墙的民主运动影响到浙江，以76年“四五”运动参与者（毛庆祥曾参与天安门“四五”运动被判过刑，后平反）为基础的浙江有志之士也纷纷行动起来，将杭州的民主墙活动搞得红红火火。形成了一个部落“黑暗中的盗火者”，相互交流思想与认识，并萌发了许多生机勃勃的民刊（起源“出自民间”“宣扬民主”故称民刊），而毛庆祥就是参与其中的杰出人士之一。

正是这段时期，冥冥之中自有天意，有着共同志向的胡晓玲与毛庆祥在一次偶然的相遇之后，进入了爱恋阶段。在世俗人的眼里出生于名门望族之后的胡晓玲下嫁出生贫寒的毛庆祥是件不可思议的事，尽管受到胡晓玲家人的强烈反对，但意志已定的胡晓玲还是将户口本偷了出来决然毅然地与毛庆祥走进了民政局登记拿到了结婚证书。

1981年4月1日，毛庆祥先生和胡晓玲女士喜结伉俪，婚后不久借蜜月之旅，花了一个多月的时间游历了福州、广州、桂林、北京、青岛、上海等地，见到了



王希哲、刘国凯等民运先驱，还带回了《告各界（行业）人民书》广为应用，加强了浙江民运与全国各地同仁的交流与联系。同年8月13日，新婚不久的毛庆祥被中共当局抓走。不久，被浙江省杭州市中级人民法院杭法刑（81）第47号以“反革命宣传罪”判刑三年。

1984年8月刑满释放后，毛庆祥不畏当局的打压继续从事民运活动。

1999年6月因参与组建中国民主党再次被捕，11月9日被当局以“颠覆国家政权罪”判处有期徒刑8年，剥夺政治权利3年，毛庆祥拒绝认罪服法，服满刑期。

浙江自成立中国民主党以来在监狱中一直有中国民主党人在坐牢，前后坐牢的达36人，至今仍在坐牢的有3人。这些民主党人的刑期加起来近200年。

胡晓玲每当看到中国民主党人被判刑心痛无比。她深知，在这个艰难的时刻，被判刑的民主党人家人最需要的就是支持和陪伴。于是，她毫不犹豫地站了出来，主动联系其家人尽可能提供帮助和情绪安抚……在胡晓玲的带动和帮助鼓励下，这些民主党人的夫人们也坚强了起来，在狱中的丈夫如受到不公或虐待就会自发团结起来与当局抗争并呼吁国际社会予以关注和谴责。

在毛庆祥坐牢期间，胡晓玲不仅要照顾年老的双亲、抚养孩子、上班工作，还坚持每个月去监狱探望夫君。

就探监这事，对于中国民主党人夫人这个群体来说，是件很重要的事，因为只有通过探监，才能知道丈夫在里面有没有遭受不公或虐待，更重要的是通过探监能安抚亲人情绪，可以想像，一个人在大牢里呆着，如果没有亲人的关心和探望，是一件多么痛苦的事啊！这种痛苦有时可能比坐牢本身还受煎熬！

这里我特别提一下，民主党人吕耿松第二次坐牢11年，在浙江长湖监狱服刑期间，其妻汪雪娥每月至

少一次前往探望。算了一下，杭州至湖州长湖监狱为 90 公里，来回是 180 公里，刑期是 11 年要来回跑 132 次（132 次 x 180 公里 = 23,760 公里）相当于绕地球大半圈还多呢！

由于组建中国民主党案同案的民主党人吴义龙是外地人，在杭州生活相当困难，胡晓玲时常给他送些钱物，在杭州的其他中国民主党人夫人团体也会伸出援助之手，让他度过艰难困苦时期。

如今胡晓玲已 70 多岁了，身体也不是很好，可还经常去养老院看望照顾身陷囹圄的中国民主党人邹巍 90 多岁的老母亲。

中国民主党主要创始人之一朱虞夫先生，在谈到胡晓玲帮助受难者民主党人家人时是深有体会和感触的。当朱虞夫先生第一次坐牢时，最担心的是自己的夫人性格内向懦弱，怕接受不了这突如其来的打击。朱虞夫先生首先想到是托人带话给胡晓玲，希望帮助其夫人克服恐惧和焦虑。在胡晓玲的鼓励帮助下朱虞夫先生的夫人走过了那段最难熬的日子。

就这样在浙江中国民主党人的夫人团体一直以来相互鼓励，相互支持下度过了一个个的艰难时刻。

在民主党人毛庆祥前后获刑 11 年多中。胡晓玲和儿子相依为命，艰难地过着常人不可想象的日子。

胡晓玲就靠一点微薄的退休工资维持生活。到孩子念大学了，教育费很高，只靠这点退休金根本不够。还要打零工，跟朋友借点钱和亲友的资助。儿子 13 岁的时候，爸爸就不在身边，在性格等方面对孩子的成长都可能产生负面影响。

就在这样艰难日子里，胡晓玲坦然面对现实，引导孩子要坚强，不要因为爸爸的事情而自卑，自暴自弃；培养其积极向上的性格。儿子在母亲良好品格的潜移默化影响下，非常努力地读书学习。大学毕业后只身一人前往迪拜发展，历经千辛万苦和不懈努力终于在迪拜站住了脚跟。

创办了《迪拜人传媒》的网络媒体，传播介绍阿联酋（迪拜）和中国的历史、文化、经济、旅游、美食……架起了两国交流相互了解的桥梁……经过多年打拼发展《迪拜人传媒》在阿联酋（迪拜）和中国有了一定的影响力和知名度。

去年还出版了《迪拜往事》一书，这是一部描述迪拜华人创业的史诗篇章。受到相关读者和专业学者的广泛赞誉。

胡晓玲以坚韧不拔的品格和实际行动不仅默默守护着心中的信念，更是守护支撑起了一个被当局破碎了的家庭。是当之无愧中国现代版的“十二月党人”夫人！

向中国民主党人夫人团体致敬！

杭州司空先让

2026 年 2 月 22 日

On Hu Xiaoling, Wife of Chinese Democracy Party Member Mao Qingxiang

Hu Xiaoling, the wife of Chinese Democracy Party member Mao Qingxiang, represents a group in Zhejiang comparable to the “Decembrist wives” of Tsarist Russia. Born into a prominent family, her maternal lineage traces back to Jiang Guangyu, a well known Qing dynasty book collector, whose residence “Yanfentang” was once famous in Jiaying.

Her mother was well educated, spoke fluent English, and worked in an important department of the Hangzhou railway system during the Republican era. After 1949, due to a past connection with the Nationalist Youth League and her family background, she experienced repeated political persecution. This left a deep imprint on Hu Xiaoling’s early life and later influenced her support for Mao Qingxiang.

Mao, born in 1950 in Hangzhou, had served in the Shanghai Garrison and later worked in a factory. He was involved in the 1976 April Fifth Movement and later became active in the Democracy Wall movement in Hangzhou. In 1981, despite strong opposition from her family, Hu Xiaoling chose to marry him.

Shortly after their marriage, Mao was arrested and sentenced to three years in prison. After his release, he continued his activities. In 1999, he was again detained for participating in the founding of the Chinese Democracy Party and was sentenced to eight years in prison. Altogether, he spent more than eleven years in prison.

During these years, Hu Xiaoling carried the full burden of family life. She cared for elderly parents, raised their child, maintained employment, and visited her husband regularly in prison. These visits were essential, both to provide emotional support and to understand his situation inside.

She also extended help to other families of imprisoned members, offering financial support and encouragement. Over time, this formed a network of mutual assistance among the wives, strengthening their resilience under pressure.

Despite financial hardship, she supported her child’s education. Her son later built a career in Dubai, creating a media platform and publishing a book on overseas Chinese experiences.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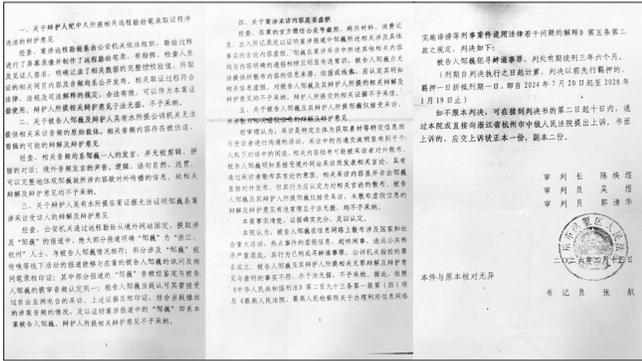
Now in her seventies and in poor health, Hu Xiaoling still visits and cares for elderly parents of imprisoned activists. Her life reflects endurance, responsibility, and quiet strength.

For the full English version, please visit: www.ZYD1998.com

对《行政复议答复书》的申述

作者：陈树庆

编辑：周志刚 校对：冯仍 翻译：周敏 美编：胡海宁



杭州市拱墅区人民政府（行政复议局）：

申述人陈树庆，杭拱政复 [2006]67 号的行政复议申请人（以下称“申请人”）。

2006 年 3 月 2 日下午，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复议法》第四十七条的规定，申请人到杭州市拱墅区行政复议局查阅并复制本行政复议案被申请人杭州市拱墅区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的《行政复议答复书》和其他有关材料。

在收到上述《答复书》等有关材料之前，申请人在与被申请人交涉中，从未收到如此详细的，关于被申请人关于其履职的书面理由和依据。同时发现对本案《行政复议申请书》中提出的被申请复议的行政行为不合理、不合法主张，《答复书》既无认可也没有反驳与否定，现申请人对《答复书》进行必要的事实补充说明及针对性申述。

一、关于申请人的除名、视同缴费年限问题，《行政复议答复书》写有“1995 年 7 月申请人被做除名处理，故被申请人对其视同缴费年限认定为 0 年 0 个月，申请人的连续工龄应从其参加养老保险之日 1992 年 4 月起计算。”

首先，拱墅区半山商业综合公司《关于对陈树庆除名处理的批复》里以理由“1995 年 7 月 1 日离岗至今”将申请人除名，还是当月匆匆忙忙做出的除名决定。如果扣除的视同缴费期间为 1995 年 7 月 1 日所谓“离岗”至做出决定之前，当然名正言顺，但扣除的是我在单位 1991 年 12 月至 1992 年 3 月无任何过错的 4 个月上班期间，是否适当？

1995 年 7 月拱墅区半山商业综合公司《关于对陈树庆除名处理的批复》，里面所描述“该员于 95 年 7

月 1 日离岗至今”是虚构的、不符合我与该公司约定。实际情况是单位本身经营长期不善（老国有商业单位受大量专业市场、综合市场个体商贩的冲击），早在一年多以前已停发工资，随后我提出承包业务，但因没有提供我为单位创收所需要的条件（看中的营业场地被别人租走），只好约定允许申请人陈树庆自谋生计，人事关系继续挂靠单位并代为缴纳社保，当然实际费用都由陈树庆自己提供（见申请人前些天家中翻箱倒柜才找出的，在本《申述》的附件：陈树庆向单位支付的代缴社保费用《杭州市工商企业统一收款收据》0077295 号为证），这种情况下，当然就不存在所谓的“离岗”还是“在岗”的问题了。在通知我“除名”前我没有被告知将要除名的理由及维权途径，我当时也只是把它当作单位的单方面解约行为，将“除名”与辞退、辞职之间的实际意思与后果没有去认真了解与分辨。

虽然这种“除名”在一定程度上也反映了社会法治不健全情况下，公民个体法治意识尤其是维权意识欠缺情况下的弱势。总之，由于申请人对于自己职工权利的无知及所谓“除名”后疏于维权，也由于扣除的视同缴费年限实际只有 4 个月，所以在本案提出的复议请求按 24 年 4 个月的缴费年限办理养老金审定中，并没有包含这 4 个月的视同缴费期间。既然被申请人在《行政复议答复书》把这个问题提出来了，申请人也不妨做出补充说明并提供足以推翻“除名”事实的证据，在复议程序中如果能够对此问题做出公正解决当然最好，如果不予理会或在形式上继续认同被申请人关于本案“除名”及 4 个月视同缴费清零的认定，由于无关本案大局，申请人愿意采取“对方不再提，我方不再究”的行为立场。

二、《答复书》对于被申请人“约而不守”、损害政府行为信赖利益保护原则的问题避而不谈。

当初缴费的时候，被申请人没有告知包括申请人在内的缴费人所谓“服刑期间违规参加基本养老保险”问题，假装不知“违规收费”，作为政府行为对社保缴费来者不拒；现在要其支付法定社会保险责任的时候，突然变卦，找理由说“违规”了，是因为缴费人的“违规缴费”。时到今日，被申请人作为专业的（也是应知的）涉嫌故意或明显过失的“知规不告”并“违规收费”不用承担“违规”的责任，反而让外行的、积极履约缴费的社保受益人即本案申请人陈树庆来承担以“违规”为名的毁约损失。更何况所谓的“违规”绝不能等同于“违

法”，中华人民共和国没有任何一条法律明确规定“服刑期间不得参与社会保险”或规定社会保险机构“对服刑期间参与社会保险的可以取消并拒绝承担届时保险责任”，被申请人的行为，放到任何一个讲道理、行法治的文明时代，放在任何一个讲道理、行法治的文明地方，都会因其显失公平，看作权力强势的任意和荒唐，严重损害了政府的社会公信力！

三、在本案申请人到被申请人的窗口办理退休手续时，一再（口头）提请被申请人考虑我国已经签署、有的已经批准的人权公约，里面有关于禁止强迫无偿劳动及人人普适的社会保险规定，当时有其科长级的工作人员笑答我“扯远了！”我权当其不知或开玩笑而已。现在，申请人在《行政复议申请书》中正式详列了《经济、社会及文化权利国际公约》、《世界人权宣言》、《公民权利及政治权利国际公约》有关条款及内容，但《答复书》继续无视行政行为（包括具体行政行为与抽象行政行为）不得与法律相抵触原则、无视国家已经签署和批准生效的国际公约。

国家签署尤其是已经批准的国际公约，是向包括中国人民在内的全世界公开承诺，任何在具体案件适用法律时对这些公约的漠视，不仅有损于国内的法治实现，也势必严重损害国家的国际信誉和国际形象。社会的文明进程到了二十一世纪都已经过了二十多年，无论国家工作人员还是国家机关在行使权力时，如果还继续忽视本国已经签署及批准的国际公约的作用与效力，其知识面、其能力、其格局，能说是合格的吗？

四、《答复书》无视机关事业单位大量违法使用劳务派遣工的虚假务工（实际务工与包括登记社保在内的挂名务工不一致）并严重违反“同工同酬”的法律规定，只对于本案申请人服刑期间的社保缴费作“违规”认定。实质上是同样的“社保代缴”，这种双重标准不仅有违于法治社会“政府行为法无授权不可为，公民行为法无禁止即自由”的基本原则，而且与古代封建专制主义社会权力恣意的“只许州官放火，不许百姓点灯”有何区别？

五、毋庸置疑，违反联合国宪章及联合国两个人权公约、违反普世文明价值的监狱强迫无偿劳动，在我们国家要保持改革开放或进一步扩大开放的过程中，是必须做出根本性的改观甚至废除的。这也正是国家司法部、外交部等的发言人在接受相关采访或主动播报时一再（掩饰性地）强调“新疆没有强迫劳动”、“中国没有强迫劳动”的原因。申请人在坐牢期间与同室服刑人员晚上按规定收看中央电视台新闻联播，每每看到、听到这种“没有强迫劳动”的发言或宣称，都会群起而笑之，“中国没有强迫劳动？只要有监狱的地方就有强迫劳动，至少我们所在的乔司监狱一直以来都在强迫劳动”当然除了我自己看到、听到不少关于强迫劳动的“手段”，接下来如果有必要，还不妨让“大家都来讲故事”说说他

们坐牢的亲身感受（包括强迫无偿劳动），让有关经济问题学者来谈谈“监狱强迫无偿劳动”对市场公平竞争、对社会就业形势及劳工权益的冲击、劳改产品对中国商品出口的作用与影响等等，在这里，怕太“离题”也限于篇幅点到为止，先不再展开更加具体、充分的讨论。

如果从本行政复议案申请人陈树庆的个案开始，希望能逐步推广到普遍承认过去服刑期间的社保缴费有效，甚至允许广大服刑人员出狱后补缴服刑期间的社保缴费不足年限让刑满释放人员真正像其他公民一样都能公平地老有所养，不仅有利于服刑人员在监狱的安心改造，也有利于刑满获释人员的安置及回归社会正常生活，避免部分人员走投无路下可能的铤而走险。在现行刑罚制度及执行状态与将来废除监狱强迫无偿劳动之间，建立一个合理的缓冲与过渡期。

综上，申请人恳请杭州市拱墅区人民政府（行政复议局）在审定本行政复议案时，对于申请人在《行政复议申请书》中提出的问题和理由，就被申请人在《行政复议答复书》中既不认可也不反驳的行为，予以必要的注意。这种对于法律适用争议焦点的拒绝回答：如果是因为不能，说明其行政行为的合法性与合理性经不起推敲；如果是不屑，那是权力的傲慢，更应该予以防止。

盼望本案最终能做出合法、公正、周全的行政复议决定。

此致
敬礼！

申请人 陈树庆
2026年3月3日

附：

- 1、本对《行政复议答复书》的申述副本1份
- 2、《杭州市工商企业统一收款收据》0077295号复印件2份

Statement in Response to the Administrative Reconsideration Reply

This document is Chen Shuqing's response to a government reply concerning his pension eligibility and contribution record. He argues that the social security authority lacks legal basis in denying certain deemed contribution periods and has acted inconsistently by accepting payments but later rejecting obligations. The statement highlights issues of fairness, good faith, and unequal standards in administrative practice. It also points to the disregard of international human rights principles related to labor and social protection. Chen requests that the authority address the unresolved legal issues and issue a lawful and fair reconsideration decision restoring his pension rights.

For the full English version, please visit: www.ZYD1998.com

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

会议提案

提案名称	恢复政协的正常功能:邀请反对派政党、异议人士参加政治协商会议
提案人	中国民主党:朱虞夫、郑存柱
提案日期	2026年3月4日
提案类别	政治体制改革

一、案由

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政协）设立之初，其核心宗旨在于将各党派、各界别、各民族、各团体的代表纳入政治协商框架，实现“长期共存、互相监督、肝胆相照、荣辱与共”的政治协商原则。然而，当前政协的实际运作已严重偏离这一初衷，真正的反对派政党和持不同政见者被全面排斥在外，政治协商名存实亡。本提案旨在呼吁恢复政协作为政治协商机构的正常功能，切实落实《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章程》的相关规定，向包括反对派政党、异议人士在内的各界人士开放政协席位，使政治协商制度回归真实、多元、包容的本来面目。

二、历史依据与现实背景

（一）政协的历史初衷。1949年第一届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召开时，共有各党派、各界别、各团体代表共662人出席，其中包括中国国民党革命委员会、中国民主同盟、中国民主建国会、中国致公党、九三学社、台湾民主自治同盟等多个党派和无党派民主人士。这一制度的设计初衷，是在新中国建立之初统一各方力量、共商国是。彼时的政协具有实质性的政治协商功能，各方可以自由发表不同意见。

（二）1957年后的转折。反右运动后，政协的政治协商功能逐渐弱化。民主党派中大量敢于直言的人士被打成“右派”，从此以后，政协逐渐从政治协商机构异化为形式上的“统一战线组织”，反对意见被视为禁区，真正的政治协商名存实亡。

（三）当前政协的结构性缺陷。现今政协的委员构成中，各“民主党派”均自认“接受中国共产党领导”，不存在任何真正意义上的反对派或独立声音。异议人士、独立知识分子、民间组织代表、不同政治观点持有者均无法进入政协平台。这使得政协失去了其作为“政治协商”机构的核心意义。

三、提案内容与具体建议

基于上述历史依据与现实分析，本党郑重提出以下建议：

- 开放政协席位给真正的反对派政党。允许包括中国民主党在内的未注册政党及独立政治团体派出代表参与政协会议，使政协席位真正体现“各党派”的多元性。
- 邀请异议人士、独立知识分子参加政协。为长期关注公共事务、人权事业、法治建设的独立人士提供政协委员席位，包括但不限于维权律师、公共知识分子、独立媒体人、民间社会组织代表等。
- 保障政协委员的言论自由与谏正质询权。任何政协委员在政协会议期间的发言、提案、质询不得作为政治追诉的依据，确立政协委员谏正免责权。
- 建立政协提案的强制回复机制。政府部门对政协委员的提案必须在规定时限内作出书面回复，并向社会公开，接受全体政协委员的质询和监督。
- 改革政协委员选拔机制。政协委员应通过其所代表界别的民主协商或选举产生，而非单纯由上级指定，以增强政协委员的代表性和合法性。
- 公开政协会议过程。政协全体会议、小组讨论及提案审议应向媒体和公众开放，实现政治协商的透明化，接受全社会的监督。

四、提案理由

(一) 实现《宪法》赋予公民的政治权利。《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第三十五条规定，公民有言论、出版、集会、结社、游行、示威的自由。将持不同政见者排斥在政治协商体制之外，违背了宪法精神。

(二) 增强国家治理的合法性与有效性。当所有政治参与者均持相同立场时，政治协商失去意义。引入真正的反对派和不同声音，能形成有效的政策辩论和监督，提升决策质量，增强国家治理的合法性。

(三) 回应社会多元化的现实需求。当今中国社会已高度多元化，不同的利益群体、价值观念、政治诉求广泛存在。政协作为“最广泛的爱国统一战线组织”，应当真正容纳和反映这种多元性，而非将其压制和消弭。

(四) 展现制度自信。一个真正自信的政治制度，不应害怕不同声音，而应当通过包容和对话来展现其优越性。开放政协平台给反对派，正是制度自信的体现。

五、结语

政治协商的前提是多元与包容。没有反对派的参与，政治协商便无从谈起。中国民主党作为一个追求宪政民主的政党，愿意在政协的框架内，以和平、理性、建设性的方式参与国家治理，为中国的政治文明进步贡献力量。

我们期望政协能够回归其历史使命，成为真正的多党派政治协商平台，而非形式主义的橡皮图章。这不仅是对政协创立者的告慰，更是对十四亿中国人民政治权利的尊重。

提案人：

中国民主党：朱虞夫、郑存柱 2026 年 3 月 4 日

Chinese People's Political Consultative Conference Proposal: Restore the Normal Functions of the CPPCC by Inviting Opposition Parties and Dissidents to Participate

This proposal, submitted by members of the China Democracy Party, calls for restoring the original functions of the Chinese People's Political Consultative Conference (CPPCC) as a genuine platform for political consultation. It argues that the CPPCC has deviated from its founding purpose of including representatives from diverse political parties, social groups, and viewpoints, and has instead become largely symbolic, lacking real pluralism and meaningful debate.

Historically, the CPPCC was established in 1949 to unite different political forces and deliberate national affairs. Early sessions included representatives from multiple parties and independent figures, allowing for the expression of diverse opinions. However, after political campaigns in the late 1950s, especially following the Anti Rightist Movement, its consultative function was weakened. Independent voices were suppressed, and dissent became restricted.

The proposal states that today's CPPCC lacks real diversity. Existing "democratic parties" operate under the leadership of the Communist Party, and no genuine opposition or independent dissenting voices are represented. As a result, the CPPCC no longer fulfills its intended role.

To address this, the proposal offers several recommendations. These include opening CPPCC membership to opposition parties and independent groups, inviting dissidents, intellectuals, and civil society representatives to participate, and guaranteeing freedom of speech for all members without political consequences. It also calls for a mandatory response mechanism for proposals, reform of member selection to improve representation, and greater transparency by opening meetings to the public.

The proposal argues that these reforms align with constitutional principles of freedom of expression and association, and that excluding dissent weakens governance. It emphasizes that a diverse society requires inclusive political consultation, and that allowing different views would improve decision making and strengthen legitimacy.

In conclusion, the proposal states that political consultation requires pluralism. Without opposition participation, consultation loses meaning. It calls for the CPPCC to return to its original role as a genuine multiparty consultative platform.

For the full English version, please visit: www.ZYD1998.com

致朱虞夫先生的一封公开信

朱虞夫先生：
您好！

近日拜读您与郑存柱先生联名提出的《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提案——恢复政协的正常功能：邀请反对派政党、异议人士参加政治协商会议》。通篇阅读之后，我对您长期以来为中国民主事业所付出的勇气与坚持，依然深怀敬意。您在提案中提出，希望恢复政协设立之初的政治协商精神，让包括反对派政党、异议人士在内的不同政治力量进入协商体系，从而推动中国政治制度向更加开放、多元、包容的方向发展。这种以和平、理性方式推动政治进步的愿望，本身体现了一种建设性的政治理想。

然而，在认真思考之后，我仍有一些不同的看法，愿以坦诚而尊重的方式向您提出讨论。

从历史经验来看，中国共产党执政七十年来，其政治结构、权力运行方式以及对社会的控制机制，已经形成了高度封闭且自我保护的体系。在这样的体系之中，真正意义上的政治协商空间极为有限。虽然在某些历史时期曾出现过短暂的“政治协商”的表面景象，但很快便以严厉的政治运动作为收场。1957年的反右运动，正是一个深刻而沉痛的历史例证。许多原本被邀请“帮助共产党整风”的分子和民主人士，最终却被打成“右派”，其后数十年的人生命运因此彻底改变。

这一历史事实，使人不得不对“体制内部改良”的可能性产生深刻怀疑。

表面上看，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在制度设计上，本应成为多党派参与公共事务的重要平台。但在现实运作中，所谓“民主党派”早已成为体制内的附属组织，它们在政治上公开承认并接受中国共产党的领导，缺乏真正独立的政治立场与监督能力。在这样的结构下，政协更多呈现为一种象征性的政治仪式，而非真实意义上的政策辩论与制度监督平台。

因此，尽管您提出邀请反对派政党与异议人士进入政协，是一种试图恢复制度本意的努力，但这一设想依然建立在一个前提之上：即中国共产党愿意主动开放权力结构，并允许真正的政治竞争与监督存在。

而这一前提，在现实政治逻辑中却显得极其脆弱，不现实的。

纵观近几十年的政治发展，特别是习上台之后，中国共产党不仅没有逐渐放松对社会与政治空间的控制，反而在多个领域呈现出更加集中化和收紧化的趋势。独立媒体空间不断缩小，民间组织受到严格限制，言论环境日趋紧张。在这样的背景下，邀请真正的反对派进入政协，恐怕不仅难以实现，甚至在现行政治环境中几乎没有现实可能。

更进一步说，中国社会之所以不断出现要求改革的声音，恰恰说明现行体制已经积累了大量深层矛盾。如果一个制度在几十年时间里始终拒绝建立真正的权力制衡机制，拒绝允许社会力量参与政治监督，那么这种制度本身就很难通过局部修补来完成自我更新。

正因如此，我个人逐渐形成一种较为悲观却也更加现实的判断：单纯寄希望于体制内部的改良，是不可能解决中国政治结构中长期积累的问题的。

历史上许多国家的经验表明，当权力长期缺乏监督与制衡时，制度内部往往难以自我纠正。真正的政治转型，往往来自社会力量、历史环境以及制度压力的综合作用，而不是仅仅依靠执政集团的自觉改变。

因此，在我看来，与其期待一个已经高度固化的权力体系主动开放，不如更加清醒地认识历史发展的规律。任何政权，无论其力量多么强大，只要长期背离社会公义与人民权利，终究无法逃避历史的审判。历史长河中曾经不可一世的统治集团，最终大多都成为时代的过客。

当然，这并不意味着我们应当放弃理性、和平与文明的原则。恰恰相反，在面对复杂而漫长的历史进程时，更需要保持理性的思考与道义坚持。对于过去历史中发生的种种政治迫害与制度性伤害，也终究需要在未来某个阶段通过公开、透明、法治化的方式进行历史清算与责任追究。这既是对受害者的尊重，也是一个国家实现真正和解与重建所必须经历的过程。

先生长期以来以诗人与行动者的身份参与中国民主运动，您的经历本身已经成为中国当代历史的一部分。正因如此，我也十分希望未来中国的政治讨论能够更加坦诚、多元，而不同路径之间也能够彼此理解、相互讨论。

对于中国未来的道路，我们或许有不同的判断与策略。但所有追求自由、法治与尊严的人们，最终的目标应当是一致的——那就是建立一个真正尊重公民权利、拥有制度制衡、能够保障人性尊严的现代国家。

谨以此信表达个人的一点思考，若有不当之处，尚祈海涵。

顺颂
安好。

中国民主党旧金山宣传部副部长
《北京之春》《在野党》旧金山记者站站长 缪青
2026年3月6日

朱虞夫回复缪青：

缪青先生的信写得非常好！我完全赞同。中共的本质难道还有人比我更清楚吗？王某的信与我没有任何关系，难道我还不知道其醉翁之意吗？有人对苍蝇说，我给你消消毒，苍蝇不会答应，因为它的本质必须是脏的。但是可以通过苍蝇的讳疾忌医让大家更看清中共是什么货色。我发此文到群里的時候给张致君说，用意一，给中共添堵；用意二，给国内民主党朋友打气。与其空喊口号，不如大家都来为“两会”献计献策。

An Open Letter to Mr. Zhu Yufu

This text is an open letter responding to a proposal by Zhu Yufu and Zheng Cunzhu regarding the Chinese People's Political Consultative Conference (CPPCC). The author expresses respect for Zhu's long standing commitment to democratic ideals and acknowledges the constructive intention behind proposing to restore the CPPCC's original consultative function by including opposition parties and dissenting voices.

However, the letter raises fundamental doubts about the feasibility of such reforms within the current political structure. It argues that after more than seventy years of rule, the existing system has developed into a highly closed and self protecting structure. Historical experience, especially the Anti Rightist Movement of 1957, is cited as evidence that earlier attempts at limited political openness were followed by severe repression, leading to long term consequences for those who participated.

The author further observes that the CPPCC, while designed as a multiparty consultative body, has in practice become largely symbolic. The existing "democratic parties" are described as operating within the framework of acceptance of Communist Party leadership, lacking independent political capacity or effective oversight. As a result, the institution no longer functions as a genuine platform for policy debate or supervision.

The letter questions the key assumption behind the proposal, namely that the current political system would be willing to open itself to real competition and dissent. It argues that recent developments indicate the opposite trend, with tighter control over media, civil society, and public expression. In this context, the inclusion of opposition voices in the CPPCC is viewed as unrealistic.

The author concludes that relying on internal reform alone is unlikely to address deeper structural issues. Instead, historical patterns suggest that meaningful political change often emerges from broader social and institutional pressures. While maintaining a commitment to peaceful and rational principles, the letter emphasizes the importance of continued discussion, reflection, and accountability in any future transformation.

For the full English version, please visit: www.ZYD1998.com

前上海律师彭永和致上海市委、市政府公开信

索求赔偿、恢复律师执业

赔偿：按照上海市相应年份的律师平均收入的标准赔偿自 2020 年 4 月 1 日起至恢复本人律师执业之日止的收入损失（含两年半期间限制人身自由的损失）。

上海市委书记陈吉宁、市长龚正，你们好！

记得，上次给上海市委、市政府写公开信是四年前上海封城期间，要求当时的书记李强和龚正你鼓气勇气，勇于承担历史责任解封上海。

我是 2021 年 1 月 29 日在李强任中共市委书记、市长龚正、局长陆卫东期间被“合法”注销律师执业证的中国公民彭永和

之所以是合法，那是因为上海是要脸且会“用法”的地方——注销的事实依据是“无律所聘用”。

然，事实是，前后我签订了三家律师事务所。

2020 年 3 月 30 日签订的第一家在我办完手续离开原所不到十分钟就来电了，说：“听律师说你有点政治倾向问题，我不能拿律所去赌”。为此，我特意写信给上海市司法局和上海市人民政府还做了一个视频，问：什么样的政治倾向在上海是可以做律师的？什么样的政治倾向在上海是不可以做律师的？强调：本人接受普世价值，坚决反对专政、反对独裁——如果这属于政治倾向。

——你们两位是不是跟我有同样上述的“政治倾向”？我赌你陈吉宁一定是！理由：你在英国的书没有白读！

2020 年 7 月 14 日第三家律所的主任中午请我吃了午饭，饭后让我帮他完善修改聘用合同条款，下午离开律所一个半小时左右，这家律所主任就打电话过来说：“司法局说你不能转到浦东来，我没想到你情况这么严重（签合同前我对他大致讲了我的情况）。为此，我又做了一个视频说：“在上海有一股神秘的力量在阻止本人律师执业，找律所签合同的事情没有告诉任何人，手续也还没有提交到司法局，怎么就被知道了呢，难道是我被跟踪了或是通信被监控了，这跟踪监控的活司法局能干吗？

后，“厕所革命”领导人季孝龙出狱期间国保来我这“深刻交代”时说……——二位猜猜他们说了什么？

律师证被注销大概就两三天后，国保跟我说，该信访信访，该诉讼诉讼。我回复说：“我是白痴吗？我去向把我律师证干掉的人申冤，我脑子坏掉了”？

向对自己做局的人寻求救济维权，是不是脑子坏掉——书记、市长你们说是不是？

全国的公民、访民你们说是不是？

律师证被合法注销后，我就被 24 小时，两班倒，每班 2 人，看守了两年半！

疫情上海封城期间借“”公开信，委托李强书记帮我问问龚正你——上海市民会允许你们这样糟蹋他们纳税的钱吗？

——借此机会，我要再问一下全体上海市民——你们同意他们这么做吗？

文述到此，请问：书记陈吉宁、市长龚正，我彭永和的律师证是不是被中共上海市委、市政府领导下的某些“滥用职权”的腐败份子搞掉的？我彭永和有没有权利要求赔偿？我彭永和的律师证该不该恢复？

另外，本人制定的《上海市律师协会选举和罢免规则草案》已经发给律协和司法局，规则的制定和促进颁布是我对上海全体律师作出的承诺。麻烦二位帮我一个忙、帮上海全体律师一个忙——要求上海市司法局限期上海市律师协会制定颁布《上海市律师协会选举和罢免规则》——书记陈吉宁、市长龚正，可以吗？

就以上问题的处理，我期待你们两位的作为。同时，我邀请全体中国公民，尤其是上海的市民和律师跟我一起做这个见证。

最后，2026 年 1 月 1 日我被 11 人安全从北京带回上海，带回上海前两天的 12 月 30 日晚上在北京发生的我跟上海公安一起“锻炼健身”的故事，哪天兴趣来了我跟你们讲讲。

结尾，看到此文的中国公民、外国友人如果你知道或判断是谁非法阻止我在上海律师执业，麻烦联系我或者有关部门，陈吉宁书记、龚正市长公务繁忙就不要打扰他们了，以便后续本人维权、党和政府打击腐败。

本人微信电话 13816353773，住上海市浦东新区航头镇沈庄村 15 组 52 号。

公民：彭永和 2026 年 3 月 1 日

逃港潮与自由之地的陨落

作者：钟然

编辑：钟然 校对：王滨 翻译：戈冰 美编：胡海宁



自由雕塑公园大逃港纪念碑 THE GREAT ESCAPE TO HONG KONG

“中国逃港潮”主要指发生在 20 世纪 50 至 80 年代，这并非零星个体的越境行为，而是在中共残酷统治下，由生存危机、制度压迫与社会封闭共同催生的集体选择，反映了当时民众通过“用脚投票”来对抗命运的悲壮历史。

自 1951 年深港边界被封锁以来，至 1985 年的三十余年间，约有 250 万内地居民冒险南下。他们或在大鹏湾中与风浪搏命，甚至有人葬身鲨口；或冲过深圳河武警的严密防守；或长时间泅渡深圳湾，在体力与意志的极限中挣扎求生，只为抵达香港，寻求一线生机与新的生活。

自中共建政起，直至 1997 年香港主权移交之前，逃港潮始终未曾间断，其间更出现过四次规模尤为突出的高峰期。

一、1957 年由于反右运动及农业合作化运动导致大规模逃港潮。

二、1962 年大跃进运动导致的大饥荒引发规模最大、最为惨烈的逃港潮。

三、文革造成社会经济失序，“上山下乡”使大批知青困于农村、前途黯淡，在失望与无望中，催生了 1972 年前后的知青逃港潮。

四、中国内地经济低迷，与“亚洲四小龙”之一的香港形成巨大反差，月薪差距动辄百倍。在这种鲜明落差下，1979 年深圳建市前，再度掀起一波逃港潮。

逃港潮中抵达香港的大陆人，并非只

是“过客”，而是逐渐融入并托举起这座城市，成为香港社会不可替代的地基石。正是这群从专制与饥荒中逃生的人，塑造了狮子山精神的内核；也正因为记得苦难的来处，在大陆同胞遭受压迫与不幸时，始终选择站出来支持与声援。

然而，香港今非昔比，这座曾经庇护无数逃难者的城市，如今在中共的高压控制下，自由与自主空间正被蚕食殆尽。曾经承载希望与逃生的庇护所被拆解，那些曾在狮子山下奋斗、塑造城市精神的人们，那些试图捍卫自由的人，不被中共容忍，甚至被投入监牢，昔日的荣光与理想正遭全面摧毁。

上世纪六十年代逃港的黎智英，为追求自由与尊严奋斗一生，却在 2026 年因国安罪被判二十年监禁，成为香港从“庇护之地”沦为“惩罚异议之地”的最残酷见证。



趁深圳河枯水期涉水前往香港地逃港者 摄于 1962 年



1957 年开始的反右运动，使全中国 317 万右派知识份子遭受迫害



穿越边境地逃港者 摄于 1962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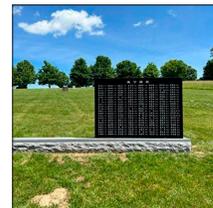
1960 年 3 月，苏就带领其全家共 48 人，从广东省惠阳乘渔船逃往香港



农业合作化运动将农民私有的土地等主要生产资料变为合作社集体共有，实质上取消了土地私有权



2014 年幸存的知青逃港者在吉澳岛东南角立了一块“知青难友纪念碑”



香港纪念逃港死难者的活动阻碍重重 2022 年旅居美国的逃港幸存者在美国建碑 延续每年的拜祭



1979 年香港铜锣湾街景

解放者

——国际新秩序的制定者

作者：郭泉

编辑：李晶 校对：冯仍 翻译：周敏 美编：胡海宁

《川普逻辑》之 92：川普总统说：“对于那些以主权之名行暴政之实的政权，我们的回答是：你们的‘主权’到此为止了。美国，将作为解放者，作为新秩序的制定者，为被压迫者带来曙光。这就是我们的使命，也是历史赋予我们的责任。行动继续，目标不变：终结暴政，还权于民！”

2026年3月3日，华盛顿特区。五角大楼深处，战争部长海格赛斯的办公室笼罩在一种凝重而决绝的气氛中。

窗外，首都的灯火在早春的寒意中闪烁，但室内，一场将重塑世界格局的讨论正在进行。

椭圆形办公室的主人，唐纳德·川普总统，端坐主位，目光如炬。环绕着他的是副总统 J.D. 万斯、国务卿马可·卢比奥、重量级参议员林赛·格林厄姆，以及三军参谋长联席会议主席查尔斯·Q·凯恩将军。

空气中弥漫着硝烟未尽的气息——就在数日前（2月28日），美军对伊朗核设施及关键军事指挥节点发动了代号为“史诗怒火”的精确打击，正式拉开了这场被外界称为“第三次海湾战争”的序幕。

此刻，国际社会，尤其是那些被总统称为“流氓国家”及其同情者，正以“侵犯主权”的罪名猛烈抨击美国。

“先生们”，川普总统的声音打破了沉寂，带着他标志性的直率与不容置疑，“外面的噪音，那些关于‘主权’的哭嚎，我们听得够多了。他们指责我们侵犯了伊朗的主权？很好。那我们就来谈谈，伊朗政权，还有那些躲在它身后的委内瑞拉、古巴，以及他们的邪恶大 boss，他们所谓的‘主权’，到底是什么东西？”

他身体微微前倾，手指有力地敲击着厚重的红木桌面。

“我们美国，在座的诸位以及我们的先辈，曾经在人类最黑暗的时刻挺身而出。二战，我们粉碎了希特勒、墨索里尼、东条英机的邪恶轴心。我们解放了欧洲，解放了亚洲，我们不是为了征服，是为了终结暴政！战后，我们怀着最崇高的理想，主持建立了联合国，希望它能成为维护和平、自由与正义的殿堂。我们以为，那是世界新秩序的基石。”

国务卿卢比奥适时接话，他的语调沉稳却充满力量：“总统先生，历史的教训清晰无比。我们建立的秩序，本应是保护人民免受暴政之苦的盾牌。然而，这个体系



被蛀蚀了。伊朗这样的政权，它们从未真正认同自由民主的价值。它们渗透、操纵、利用联合国。它们把‘主权不可侵犯’这块遮羞布挥舞得震天响，为的是什么？”

他环视众人，“只是为了保护它们自己！保护它们在国内肆无忌惮地压迫人民、践踏人权、发展毁灭性武器而不受惩罚的特权！联合国，在某些时刻，某些议题上，已经可悲地沦为了它们的保护伞。”

一份报告被推到桌子中央。格林厄姆参议员，这位以鹰派立场著称的资深议员，指着文件，声音因愤怒而有些沙哑：“看看这些！不是猜测，是铁证！伊朗政权过去几年干了什么？大规模处决异议人士，数字触目惊心，被国际社会多次谴责为反人类罪行！它们系统性迫害少数族裔和宗教群体，制造恐惧。它们利用国际机构的漏洞，甚至渗透其中，试图掩盖其核野心，同时将矛头指向遵守规则的国家。当联合国下属的机构都可能成为情报泄露的通道，当监督者本身的可信度都摇摇欲坠时，”他重重拍了下桌子，“这个旧秩序，还有什么公正可言？它保护的，是暴君骑在人民头上作威作福的‘主权’！不是人民当家作主的权利！”

凯恩将军打开了面前的战术平板，调出最新的战场态势图和情报摘要。他的声音冷静、专业，带着军人特有的务实：“总统先生，各位，军事行动按计划推进。‘史诗怒火’有效瘫痪了伊朗的核反击能力和关键指挥链。但真正的挑战，是国际舆论和旧秩序的惯性思维。我们面对的不仅是伊朗的导弹，更是根深蒂固的、被曲解的主权观念。情报显示，伊朗政权正试图利用‘主权’牌，在联合国框架内动员同情者，试图将我们塑造成侵略者。”

副总统万斯一直凝神倾听，此刻他开口，语气坚定：“这正是关键所在，将军。我们必须清晰地定义主权。

主权，它天然地属于人民！一个政权，如果不是人民自由意志的选择，如果它依靠暴力、恐惧和谎言维持统治，如果它屠杀自己的人民、威胁世界的安全——就像二战时的轴心国一样——那么，它凭什么享有主权豁免？它拥有的只是暴政的权力！伊朗现政权、马杜罗的委内瑞拉、古巴的独裁者，以及他们的大 boss，它们无一不是通过压制而非选举上台，它们的存在本身就是对主权的最大亵渎。它们对内是刽子手，对外是麻烦制造者。这样的政权，不配拥有‘主权’这块免死金牌！”

川普总统猛地站起身，目光扫过每一位与会者，仿佛要将他的意志注入每个人的灵魂。“林赛说得对，马可分析得透，凯恩将军执行得好，万斯点中了要害！这个旧秩序，这个被邪恶渗透、被懦弱纵容、被谎言包裹的旧秩序，必须终结！它保护不了无辜者，反而成了暴君的护身符。联合国在某些方面已经失灵了，它无法阻止伊朗屠杀自己的人民，无法阻止它发展核武器威胁邻国，甚至其内部机制都可能被滥用。我们不能再被这种虚伪的规则束缚手脚！”

川普总统他走到窗前，背对着房间，望着夜色中的华盛顿纪念碑，声音洪亮而充满使命感：“二战后的秩序，是我们美国带领世界建立的，是为了防止法西斯主义卷土重来。今天，我们面对的是新的邪恶轴心——伊朗神权政权及其庇护下的恐怖网络、委内瑞拉的独裁者、古巴的压迫机器，以及他们的大 boss。它们对内残暴统治，对外输出动荡。它们的存在，就是对人类良知和世界和平的持续威胁！它们不是合法政府，它们是骑在人民脖子上的犯罪集团！”

总统转过身，眼神锐利如鹰：“所以，我们的行动，不是侵略，而是解放！是履行我们作为自由世界领袖的历史责任！当这些政权犯下反人类罪，当它们用‘主权’当挡箭牌继续作恶时，美国有责任，也有力量，去击溃它们！将权力从暴君手中夺回，交还给它们真正的主人——人民！支持当地渴望自由的力量，建立真正代表民意的、负责任的政府。这才是在废墟上建立真正持久和平与自由秩序的唯一途径！”

总统走向座位，双手撑在桌面上，语气不容置疑：“我们正在开创的，是一个全新的世界秩序。一个基于真理而非虚伪、基于自由而非压迫、基于人民主权而非暴君特权的秩序！一个让‘主权不可侵犯’回归其本意——保护人民免受内外侵害——的秩序！对于那些以主权之名行暴政之实的政权，我们的回答是：你们的‘主权’到此为止了。美国，将作为解放者，作为新秩序的制定者，为被压迫者带来曙光。这，就是我们的使命，也是历史赋予我们的责任。行动继续，目标不变：终结暴政，还权于民！”

办公室内一片寂静，只有总统铿锵的话语在回荡。

万斯副总统眼中闪烁着认同的光芒，卢比奥国务卿郑重地点了点头，格林厄姆参议员紧握拳头，凯恩将军

挺直了脊背。

窗外，夜色依旧深沉，但在这间决定世界命运的房间里，一个打破旧枷锁、试图塑造新未来的决心，已然如同出鞘的利剑，寒光凛冽。

他们深知前路艰险，国际社会的指责风暴必将更猛烈，旧秩序的卫道士们会拼命反扑。然而，在总统描绘的这幅“解放者”图景中，他们看到了一个以美国力量

和价值观为主导的、截然不同的世界秩序蓝图正在铺开。这场始于德黑兰上空的战火，其目标已远不止于更换一个政权，而是要彻底改写国际规则的根基。

泉史公作《史诗怒火赋》，赞川普公之功勋卓著，如下：

伊朗狼烟，岂惟殄灭凶残；寰宇新章，实肇清夷玉宇。
夫天纲解纽，戾气横流。伊阙逞枭獍之威，胁苍生而盗神器；波斯沉臃腥之雾，假主权以锢黔黎。于是美利坚奋雷霆之怒，川普公秉昊天之神命，爰整貔貅，恭行天罚。

其志也，黜伪崇真，斥虚尚实。解倒悬于水火，岂容暴虐苟延？还明曜于幽昏，誓令自由重焕。昔者主权蒙垢，竟成独夫之盾；今兹正义张弓，终现本初之义。护兆民于衽席，御奸宄于疆垣。

其行也，长戟指处，魍魉魂销。战焰灼云，非止焚德黑兰之阙；仁旌卷地，更将塑新秩序之基。看星条耀空，裂重昏而破蛰；听惊雷震野，醒九域以苏枯。暴政之“主权”云乎？至此永绝；生民之夙愿也哉，于焉得偿！

至若拯溺怀襄，解悬焦灼。布真理为圭臬，易压迫以和宁。使四海知主权在民，非属僭主；令八荒识威仪由法，岂任狂狷？此非一国之事，实乃万世之功。

伟矣哉！挥剑决浮云，三军气慑波斯月；举旗开正道，九域春随自由风。

诗曰：

且看波斯故地
重开玫瑰之春
更听国际新章
永续山河之盟

Liberator: Architect of a New International Order

This text presents a political narrative in which the United States, under President Donald J. Trump, is framed as a "liberator" shaping a new global order. Following a military strike on Iran, it argues that regimes using sovereignty to justify repression have lost legitimacy. Sovereignty is redefined as belonging to the people rather than rulers. The text portrays intervention as a duty to end tyranny and establish a new order based on freedom, accountability, and human rights.

For the full English version, please visit: www.ZYD1998.com

宏福苑大火百日祭

——灾难之后香港在发生什么

作者：关永杰

编辑：钟然 责任编辑：胡丽莉 校对：冯仍 翻译：周敏 美编：胡海宁

截至 2026 年 3 月 6 日，香港大埔宏福苑大火已经过去整整一百天。

这场发生在 2025 年 11 月 26 日的火灾，波及七幢高层住宅大厦，大火持续燃烧超过四十小时，最终造成 168 人死亡、79 人受伤，成为香港开埠以来伤亡最惨重的火灾事故之一。港府随后宣布成立独立调查委员会，并计划在 2026 年 3 月 19 日开始举行听证会，2026 年 9 月左右公布最终调查报告。

然而，火灾后这一百天里发生的一些事情，却让不少人对调查结果是否能够真正回应公众关心的问题产生了疑问。

回顾这 100 天，香港社会发生了几件值得注意的事件。

一、提出调查诉求的学生被捕并遭开除

火灾发生后，香港中文大学学生关靖丰公开提出包括成立火灾独立调查委员会在内的四项诉求。然而不久之后他被警方拘捕，一些媒体甚至将其行为形容为“以灾乱港”。

2026 年 2 月 13 日，香港中文大学宣布开除其学籍。校方给出的理由并非直接因为其提出相关诉求，而是指其“多次行为不当”，其中包括他在 2023 年曾因张贴六四相关标语而被记过。

二、问责问题几乎没有被提起

按照中国《生产安全事故报告和调查处理条例》的规定，死亡超过 30 人的事故属于“特别重大事故”，应由国务院或者国务院授权有关部门组织事故调查组进行调查，并对负有领导责任的省长、自治区主席、直辖市市长以及国务院有关部门主要负责人给予行政处分。

而香港的现实则是：香港特首李家超不但没有被问责，2025 年 12 月 16 日，他向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述职时，习近平还明确表示，一年来李家超带领特区政府“勇于担当、积极进取”，并强调中央对李家超及特区政府的工作是“充分肯定”的。习近平还提到李家超在坚定维护国家主权、安全及发展利益方面的表现尤为突出。至于大埔宏福苑火灾，则只是向灾民表示慰问，并肯定了特区政府在灾后支援及重建方面的努力。

三、罹难者名单未向公众公布

在大多数民主社会及法治国家，处理大规模伤亡事故时，“公开名单”通常被视为政府透明度与社会共同哀悼的重要部分。



但香港政府在大埔宏福苑五级火警后，以“保护隐私”为由拒绝公开 168 名罹难者名单。

四、媒体人黎智英被重判

2026 年 2 月 9 日，在一个被外界广泛质疑为受到政治影响的司法环境下，香港法庭以《国安法》框架下的“煽动颠覆国家政权”与“勾结外国势力”罪名，重判黎智英二十年，《苹果日报》多名高层被判七至十年。

在这样的打击之下，香港可能很难再出现真正具有独立性的新闻媒体，剩下的更多只是官方宣传体系的一部分。

五、“天眼”密布，香港或进入《1984》时代

2026 年 2 月中旬，港府向立法会申请 40.6 亿港元的拨款，用于扩展名为“智眼”（SmartView）的监控程序。该计划准备在未来数年内，为全港 6 万多组监控摄像头进行技术升级，包括引入更强大的 AI 人脸识别与大数据分析功能。

宏福苑火灾的具体原因仍在调查之中。根据早期报道，火势可能与楼宇外墙维修工程中使用的竹棚、尼龙网等材料的阻燃系数不达标有关。火焰沿着外墙迅速蔓延，导致多个楼宇被波及。如果最终调查结果证明问题仅仅是工程材料不符合标准，那当然是一场严重的工程事故。但香港使用竹棚已经超过百年，公众目前关注的焦点集中在尼龙网阻燃系数不达标的问题上。而这一问题很可能涉及工程腐败与监管漏洞。因此，对很多香港市民来说，他们担心的问题或许更深一层——英国殖民时代建立并有效运作上百年的制度，回归中国后是不是已经发生了质变？

过去几十年，香港之所以能够维持较高的公共治理

水平，与其制度中的多个要素有关：独立媒体、专业监管机构以及公开透明的调查机制。

但 2019 年，北京推动修订《逃犯条例》引发大规模社会抗议，并最终在 2020 年出台更为严厉的《香港国安法》。此后短短几年，香港的政治与社会环境发生了深刻变化。香港从一个开放、文明、法治、富裕的国际大都市，迅速转变为一个被高压管控的社会。大量中高端人才流失，楼价大幅下跌，经济增长明显放缓，并罕见地出现财政赤字。

《国安法》实施后，在高压环境下民众与媒体普遍趋于沉默。自 2020 年以来推行的一系列“宣誓效忠”制度，也使得不少官员更多只需对北京负责，而无需再面对来自反对派与社会舆论的监督。当政府将大量精力与资源投入在肃清异见、维护所谓国家安全时，真正关乎公众生命安全的公共治理能力，就可能在不知不觉中被削弱。

历史经验提醒人们，在中国近几十年的一些重大灾难事件中，也曾出现类似的争议。

例如 2008 年汶川地震后，一些家长质疑校舍质量问题，疑似是豆腐渣工程，推动调查的谭作人随后被拘捕；2011 年温州动车事故，官方最初将原因归结为雷击；还有 2021 年郑州“7·20”水灾、2024 年广东梅大高速塌方等事件，也都曾因责任归属问题引发社会争议。在这些事件中，政府往往倾向于将责任归咎于天灾，而不少民众则认为其中人祸是主要因素，由此引发了关于责任追究与信息公开的讨论。最终的结果往往是删帖、封号，舆论逐渐沉寂，事件也随之被遗忘。

宏福苑大火已经过去一百天。168 条生命的逝去，人们希望看到的不仅是对遇难者的悼念，更是对制度漏洞的认真检视。

但从灾后这 100 天发生的事件来看，我们对于 9 月将要发布的调查报告，还能抱有多大的期待？是水落石出的真相？还是避重就轻的解释？

如果真相没有被揭示，责任人没有被追究，那么这场大火留给香港的，恐怕不仅是一段悲痛的记忆，更是一种长期存在的不安——这样的灾难，随时可能再次降临。



Hundred Day Memorial of the Hong Fook Court Fire: What Is Happening in Hong Kong After the Disaster

As of March 6, 2026, one hundred days have passed since the fire at Hong Fook Court in Tai Po, Hong Kong. The blaze, which began on November 26, 2025, spread across seven high rise residential buildings, burned for over forty hours, and caused 168 deaths and 79 injuries. It became one of the deadliest fires in Hong Kong's history. The government established an independent inquiry, with hearings scheduled for March and a final report expected around September. However, developments after the disaster have raised doubts about whether the investigation will fully address public concerns.

Several events during these one hundred days stand out. A university student who called for an independent investigation was arrested and later expelled, with authorities citing prior misconduct. Questions of accountability have also been largely absent. Despite the scale of the tragedy, no senior officials have been held responsible, while official statements have praised existing leadership. The government has also refused to release the names of the victims, citing privacy concerns, which contrasts with practices in many societies where transparency is considered essential.

Other developments have influenced public perception. Media figure Jimmy Lai was sentenced to twenty years in prison under national security charges, raising concerns about judicial independence and press freedom. Meanwhile, the government proposed expanding a surveillance system known as SmartView, involving tens of thousands of cameras with facial recognition and data analysis functions, leading to fears of increased monitoring.

The cause of the fire remains under investigation, with early reports suggesting that construction materials may not have met safety standards. This has raised concerns about regulatory gaps and possible corruption. More broadly, the disaster has intensified questions about changes in Hong Kong's governance.

Since 2019, after large scale protests and the introduction of the National Security Law, Hong Kong's political and social environment has shifted significantly. Restrictions on media, civil society, and public expression have increased, while oversight mechanisms have weakened.

One hundred days after the fire, the loss of life continues to demand answers. Whether the final report will provide clarity or leave key issues unresolved remains uncertain.

For the full English version, please visit: www.ZYD1998.com

哈梅内伊伏法

——敲响中共暴政的丧钟

作者：张维清

编辑：钟然 校对：熊辩 翻译：戈冰 美编：胡海宁

一、60秒的雷霆：神权的幻灭与暴政的终结

2026年2月28日，一个足以载入史册的日子。世界屏息凝神，目睹了一个血腥时代的戛然而止。伊朗最高领袖哈梅内伊——这个自诩“真主代理人”、统治波斯大地数十年的独裁者，在美以联军的精准斩首行动中，成为掩体下的亡魂。

这场持续仅60秒的定点清除，不仅仅是军事科技的胜利，更是一场政治图腾的彻底崩塌。多年来，哈梅内伊依靠残酷的伊斯兰革命卫队，通过秘密警察、酷刑室和公开绞刑，在伊朗构筑了一座恐惧的迷宫。他曾傲慢地宣称其统治“神圣不可侵犯”，但在高精度导弹穿透加固混凝土的那一刻，那层虚假的神圣外衣被撕得粉碎。暴君的死亡向全球残存的独裁者们发出了震耳欲聋的警告：依靠屠杀本国人民来维系的非法统治，本质上是沙上之塔，无论防御工事多么坚固，都无法阻挡正义从天而降的审判。

二、历史的共振：从德黑兰的冷藏车到天安门的坦克

哈梅内伊的覆灭，是他多年积攒血债的必然因果。在政权倒塌的前夕，由于伊朗民众对自由的渴望突破了临界点，德黑兰街头一度演变成屠宰场。伊朗政府动用大口径机枪对示威人群进行无差别扫射，甚至由于太平间爆满，卑劣地动用冷藏车秘密转运年轻抗议者的尸体。

这种令人发指的暴行，让人们无法不联想到1989年那个血色的初夏。在天安门广场上，中共同样动用了国家战争机器，用坦克碾碎了青年学子的民主梦想，用刺刀封锁了通向文明的出口。两场横跨三十余年、相隔数千公里的暴行，其内在逻辑竟然如出一辙：当独裁者意识到自己的谎言不再起作用时，暴力便成了他们最后的“救命稻草”。

然而，中共比哈梅内伊更加狡诈。在“六·四”之后的三十多年里，他们利用全球化带来的红利作为经济诱饵，搭建起号称“金盾工程”的数字监狱，试图用物质享受换取民众的沉默，用信息防火墙抹去历史的记忆。但哈梅内伊的结局证明了一点：没有任何防火墙能挡住正义的意志，也没有任何洗脑术能平息深藏于民心的愤怒之火。

三、连锁反应：北京红墙内的阵阵寒意

当哈梅内伊在掩体中伏法的信息传遍全球时，最感到恐惧的莫过于北京红墙内的独裁核心。中伊两国作为威权阵营的“背靠背”盟友，长期在压制人权和挑战国

际秩序上同气相求。如今，伊朗这座“邪恶轴心”的重要堡垒瞬间崩塌，这种巨大的地缘政治震荡和心理冲击，正以前所未有的速度传导至中南海。

历史的清算从未消散，只是在等待合适的时机。当年坦克碾过广场，留下的不只是血迹，更是政权合法性的彻底破产。如今，随着中国经济幻影的破灭、地方债务的暴雷以及社会管控的极端化，曾经的“经济契约”已经作废。当底层民众的生存权受到威胁，当“白纸运动”的火种在灰烬中复燃，独裁者所依仗的暴力机器将面临严重的内耗与瓦解。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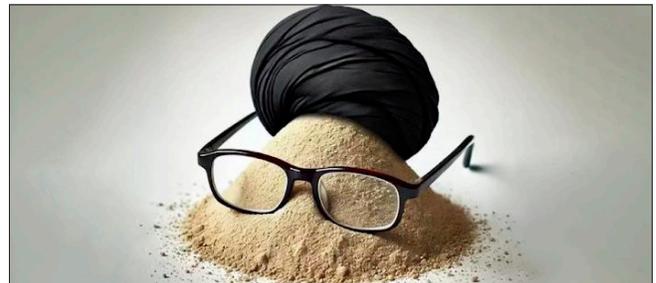
德黑兰的今天，就是北京的明天。这种审判或许表现为内部权力结构的剧烈崩塌，或许表现为经济危机触发的全国性觉醒，亦或是国际正义力量在全球格局重组中的总清算。当正义的铁拳挥下，那堵看似坚不可摧的“高墙”，在觉醒的民意面前将如枯槁般不堪一击。

四、觉醒时刻：让自由的光芒照亮审判台

从哈梅内伊的倒台到中共统治的摇摇欲坠，事实反复证明：没有任何屠杀能永远阻挡自由的意志，没有任何暴政能逃脱历史的法庭。当年在天安门广场下达开火命令的罪人，以及如今在德黑兰街头扣动扳机的施暴者，最终都将被钉在历史的耻辱柱上，被万世唾弃。

这是一场光明与黑暗的终极博弈。哈梅内伊的伏法，正是全球独裁阵营全面溃败的第一块多米诺骨牌。对于每一个身处黑暗、向往自由的人来说，现在是觉醒的时刻，是呐喊的时刻！我们不仅是在见证一个暴君的消亡，更是在共同参与一个新时代的诞生。

正义或许会迟到，但当它以雷霆万钧之势降临时，任何高墙都无法遮蔽自由的光芒。让我们共同期待，在那不久的将来，天安门广场不再是坦克的领地，而是自由人民欢庆胜利的海洋。在那一天，全世界被压迫的人民将齐声宣告：暴政已死，自由永存！



For the full English version, please visit: www.ZYD1998.com

从李延贺案谈言论自由的价值

作者：朱晓娜

编辑：胡丽莉 校对：熊辩 美编：胡海宁

2025年2月17日，李延贺一案在上海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一审宣判。官方通报称，其因“煽动分裂国家罪”被判处有期徒刑三年，剥夺政治权利一年，并处没收个人财产人民币五万元。通报还表示，当事人当庭表示认罪服法，在法定上诉期内未提起上诉，判决已经生效。

李延贺是台湾出版机构八旗文化的出版人，多年来出版了大量涉及中国历史、政治以及社会问题的书籍。2023年，他在上海探亲期间被有关部门带走调查。此案在很长时间里缺乏公开信息，直到判决公布，外界才逐渐了解案件结果。

作为一名曾经生活在中国大陆、如今身在海外的人，我看到这样的新闻感到十分沉重。因为我非常清楚，在中国表达不同意见可能带来的后果。我曾经因为在社交媒体上发表个人经历以及对社会问题的看法，被当地警方上门要求删除相关内容。当时的经历让我深刻意识到，在中国，普通公民的表达空间是十分有限的。

那次事件之后，我开始更加关注中国的言论环境以及公民权利问题。我逐渐意识到，很多社会问题之所以长期存在，很大程度上是因为缺乏公开讨论和自由表达的空间。当不同意见无法被表达时，社会也就失去了自我修正的能力。

后来我来到美国，在这里接触到了更多关于民主制度、公民权利以及言论自由的理念。生活在一个可以公开表达意见的社会里，让我第一次真正体会到自由表达的重要性。正是在这样的环境下，我加入了中国民主党，并开始参与海外华人的民主活动。

过去两年中，我多次参与与中国人权和民主议题有关的公开活动，包括纪念历史事件的集会、声援政治案件的抗议活动，以及呼吁关注中国人权问题的公共活动。据不完全统计，我参与的相关活动已经超过80场。在这些活动中，我不仅参与集会，还举牌发言，表达自己对中国政治现状的看法。许多活动都有媒体报道，也留下了照片和视频记录。

对我来说，这些活动不仅仅是政治表达，更是一种责任。我相信，一个社会只有允许不同声音存在，允许历史与现实被不断讨论，才有可能真正进步。出版、写作以及公共讨论，本来就是推动社会发展的重要力量。

李延贺案再次提醒我们，在当今世界，思想与信息早已跨越国界传播，但制度之间的差异仍然深刻影响着个人命运。同样的观点、同样的书籍，在不同制度之下

可能会被赋予完全不同的意义。

也正因为如此，像我这样身在海外的人，才更加珍惜表达的权利。虽然离开了中国，但我仍然关注中国社会的发展，也希望未来有一天，中国的普通公民能够在不必担心风险的情况下讨论历史、表达观点、参与公共事务。

对于很多海外华人来说，表达本身或许是一件很小的事情，但在某些环境下，它却意味着勇气。正因为经历过压抑与限制，我们才更加明白自由表达的价值。



On the Value of Freedom of Expression: Reflections on the Li Yanhe Case

On February 17, 2025, Li Yanhe was sentenced by the Shanghai First Intermediate People's Court to three years in prison for "inciting secession," along with one year of political rights deprivation and a fine. His case drew attention due to limited public information prior to the verdict. Li, a Taiwanese publisher, had long published books on Chinese history, politics, and society, and was detained in Shanghai in 2023.

The author reflects on personal experience of being pressured by police to remove online content, highlighting the limited space for expression. The text argues that without open discussion, societies lose the ability to self correct.

After moving abroad, the author experienced a different environment where expression is more open and participated in public activities related to human rights. The case underscores how systems shape the consequences of speech and why freedom of expression remains essential.

For the full English version, please visit: www.ZYD1998.com

1460 天的坚韧与罪证

——写在俄乌战争四周年

作者：唐奇

编辑：黄吉洲 校对：程筱筱 翻译：周敏 美编：胡海宁

2026年2月24日。对于世界而言，这或许只是漫长历史中的一个刻度；但对于乌克兰，这是这场由俄罗斯发动的全面入侵战争进入第五个年头的凛冬。一千四百六十个昼夜的炮火，不仅撕碎了主权国家的边界，更在人类现代文明的躯体上留下了一道至今仍在流血的伤痕。

站在四周年的时间节点上，我们不仅要为受难者哀悼，更要以无可辩驳的事实和数据，对这场非正义的侵略行径发起最严厉的谴责。

一、凋零的生命：数据背后的血泪

战争最直观的残酷，莫过于对生命的漠视。根据联合国人权事务高级专员公署（OHCHR）截止2026年2月发布的最新核实数据，自2022年2月24日以来，乌克兰境内已证实的平民死亡人数超过15,000人，另有超过41,000人受伤。联合国同时强调，由于前线及俄占区（如马里乌波尔等地）的数据极难获取，实际伤亡数字可能远高于此。

更令人痛心的是，根据联合国2026年2月的最新简报，这场战争已夺去了至少766名儿童的生命。2025年成为了战争爆发以来平民伤亡最为惨重的一年，平民伤亡人数较2024年增加了31%，这直接源于俄罗斯对乌克兰民用基础设施、尤其是能源系统的系统性远程打击。而在军事层面，这场被称为“二战以来最大规模消耗战”的冲突，其代价更是惊人。美国战略与国际研究中心（CSIS）2026年1月的报告估计，双方士兵伤亡（含阵亡、受伤及失踪）总数已逼近180万人。其中，俄罗斯方面的损失尤为惨烈，预计伤亡人数达120万，其中死亡人数约为32.5万。这是自第二次世界大战以来，任何大国在单一冲突中所承受的最高伤亡记录。

二、破碎的家园：系统性的文明摧毁

这不仅仅是一场领土争夺战，更是一场针对乌克兰生存根基的破坏。

世界银行在2026年2月23日发布的第五份《乌克兰迅速损害与需求评估》（RDNA5）报告中披露：

- 直接经济损失：乌克兰遭受的直接物理损坏已达到1950亿美元。

- 重建成本：未来十年乌克兰的恢复与重建需求总额估计高达5880亿美元，这几乎是乌克兰2025年名义GDP的三倍。

- 住房与基建：乌克兰全国约14%的住房建筑在战

火中受损或被毁，影响了超过300万户家庭。

更残酷的手段体现在对能源设施的“武器化”利用。2025年入冬以来，俄罗斯加强了对发电厂和输电网的袭击。联合国数据显示，2026年初，乌克兰仍有约1100万人处于急需人道主义援助的状态，数百万人被迫在零下20摄氏度的严寒中忍受停电与断暖。

三、颠沛流离：消失的人口红利

战争引发了自二战以来欧洲最大的难民危机。根据联合国难民署（UNHCR）2026年2月的数据：

- 目前全球记录在案的乌克兰难民约为590万人。

- 乌克兰境内仍有370万人处于流离失所（IDP）状态。

- 乌克兰总人口已从战前的4113万骤降至2025年底的3600万以下。

这种人口结构的剧烈变动，不仅是当下的苦难，更预示着乌克兰未来几代人将面临的社会与经济重创。

四、结语：正义不应因习惯而麻木

四年来，国际社会见证了乌克兰人民无与伦比的勇气。正如北约秘书长在2026年四周年纪念仪式上所言，这是一场“英雄民族对黑暗侵略的持久抵抗”。

我们谴责俄罗斯，不仅是因为它违反了《联合国宪章》和国际法，更是因为它试图用武力逻辑取代法治文明，用帝国野心践踏个体尊严。如果这种赤裸裸的侵略行为在21世纪依然能被容忍，那么世界上任何一个主权国家的安全都将无从谈起。

支持乌克兰，就是支持我们自己对和平与规则的向往。四周年之际，世界不应习惯于战火的硝烟，更不应面对苦难产生“审美疲劳”。停止侵略，撤回军队，归还领土——这是通往正义和平的唯一途径。愿明年的此时，我们书写的不再是伤亡数字，而是关于重建、回归与真正和平的篇章。



For the full English version, please visit: www.ZYD1998.com

“政治清算”不等于“制度转型”

作者：张致君

编辑：李聪玲 校对：程筱筱 翻译：戈冰 美编：胡海宁



“斩首”现在已经成为公共讨论中的高频词，情绪已经压过理性。尼古拉斯·马杜罗被美国政府捕获，阿里·哈梅内伊被美国政府击毙，无论是针对委内瑞拉的强人政治，还是伊朗的神权结构，外界都曾反复出现同一种声音：一个独裁者倒下，是否就会改变国家现状？

在威权政体转型的公共讨论中，政治精英的突发性更迭常被赋予过度跨时代的意义。“个体清算”仅属于政治学意义上的“突发事件”，无法自动诱发“结构性转型”。公众对“强人政治”的瓦解常抱有一种基于“政治清算叙事”的乐观预期。

必须先说清楚一点——独裁者的灭亡，从道义上讲，永远不值得同情。长期依赖压制、恐惧与控制维系统治的人，其权力终结本身，就是历史对权力滥用的回应。强人政治本质上压缩社会空间、扭曲制度运行、制造系统性恐惧。它的终结，无论以何种形式发生，在价值判断上都不需要替它辩护。

但问题在于，肯定独裁者的灭亡，并不等于可以把那一刻当作制度重生的完成。

以委内瑞拉为例，在马杜罗执政时期，权力高度集中，司法与军方被深度政治化，反对派长期受压。国际社会多次预测“临界时刻”即将到来，甚至出现过短暂的权力对峙。但真正改变国家命运的，并不是某个瞬间的冲击，而是军方站位、制度安排、经济结构和社会力量对比。如果这些结构没有重组，强人离场也未必带来制度性自由。

再看伊朗，哈梅内伊作为最高领袖，掌握宗教合法性与宪政之上的权威。外界长期设想“后哈梅内伊时代”的权力走向。但伊朗真正的核心，不仅是个人，而是“最高领袖—革命卫队—宗教监护委员会”这一整套权力体系。如果体系仍然完整，换人并不意味着换轨道。

这正是问题的关键：独裁的本质，不是某个人的性格，而是一种结构安排。

如果权力结构允许一个位置同时拥有军队的最终控制权，司法的最终解释权，媒体的话语垄断权，行政的任命主导权。这样的政权无论是谁掌控，都是在制度惯性中强化集中。因而人们在庆祝独裁者的灭亡只是历史的节点，却绝不是历史的终点。

一位叫 Iman Jalali 的伊朗人对体制的恐怖分析尤其警醒：哈梅内伊死了，很好。但现实远没有那么简单。伊朗已经为这一时刻准备了地球上最严密的应急计划，每个关键职位都设有四级继任机制，军事打击事先获得授权，地区指挥官无需德黑兰的命令即可采取行动。

当文章被读到时，新的最高领导人已经诞生。政府没有被推翻，体制承受了冲击，而这一切正是体制设计的初衷。所有可信的情报都指向同一个结论：后哈梅内伊时代的伊朗，更有可能变得更加强硬，而不是温和；伊斯兰革命卫队将更加活跃、更具威胁。对于伊朗人民而言，这种制度韧性可能带来比哈梅内伊本人更严重的压迫。

情绪让人渴望一个干脆的句号。多年压抑之后，人们自然希望看到象征性的崩塌。但政治现实没有句号，只有结构。如果结构没有被拆解，真空只会被新的力量填补。在高度集权体制中，权力真空往往引发内部重组，而不是自动民主化。历史多次证明，混乱中人们对“稳定”的渴望，反而可能为新的权力集中提供理由。这就是为什么，把政治想象成一次“终极清算”是危险的。它让人误以为问题的根源在“某个人”，而忽视了真正需要被改变的是：

权力如何分配。

权力如何被监督。

权力如何被限制。

真正的政治成熟，不是否认独裁者应当退出历史，而是明白制度没有约束机制，新的强人随时会出现。民主从来不是独裁者倒下的自然结果。它是一种制度设计的产物，是规则被写进法律、被执行、被普遍接受的结果。它意味着任何人掌权，也不能为所欲为；即使掌权者拥有多数，也不能压死少数；即使最高领袖声称代表国家，也必须受法律限制。

在强人政治中，人们习惯等待“关键人物”。在成熟制度中，人们依赖规则。民智不是情绪高潮，而是规则意识的形成。是多数人开始理解权力必须被拆分、军队必须国家化、司法必须独立、媒体必须开放，并愿意

为这些原则承担责任。公民社会的成长，比任何戏剧性节点都更重要。

独裁者的灭亡，值得肯定，它象征着压迫性节点的终结。但真正值得庆祝的，不是独裁者名字消失，而是从此以后没有人可以再拥有那样的权力。如果权力仍然没有边界，那么下一位坐上去的人，可能只是换一种语言、换一种风格，却在同样的轨道上运行。

情绪可以推翻一个象征，理性才能建构一个制度。历史不会因为一次震荡就自动改变方向。方向取决于结构是否重组，规则是否重写，权力是否真正被关进制度的笼子。

真正的胜利，不是强人的终结，而是强人政治的终结。

前者是事件，后者是结构。

中文世界中“斩首习近平”的呼吁绝对是对个人权力滥用的一种回应，具有象征性意义的存在。但中共的体制也早已设计得天衣无缝：权力不仅集中在一个人身上，更深深嵌入了党、军队、宣传体系、官僚网络和地方利益集团的多层次结构。谁上位，国家机器照样运转。

中共不依赖个人，它是依赖制度化的权力链条。军队、公安、宣传、行政、地方党组织，各自独立又互相牵制，即便习近平倒下，继任机制、核心领导班子、应急指挥体系早已准备完毕。权力空缺不会变成民主自由的空白，而是被制度化安排的下一位掌权者迅速填补。清掉一个名字，政治也不会解放。更重要的是，这套机器经过几十年的运作，已经学习了如何在震荡中自我稳固。任何外部冲击、内部动荡，都不会让制度本身被撼动太久。军队和安全系统有明确指挥链条；地方党组织在平衡中央与本地利益中已形成自我保护机制；宣传和舆论系统能够在瞬间重塑合法性。斩首只是切掉了一个象征，却不能拆掉支撑权力的框架。幻想中有人认为下一任会更温和、会开放空间，这是典型的逻辑错误。历史和现实告诉我们：权力空缺往往促使体制强化，而不是松动。继任者必须维持党的统一和权力集中，否则体系会崩塌。

如同伊朗的哈梅内伊，核心人物的倒下并没有撕裂制度，制度反而借此机会显示了韧性和自我延续的能力。中共也同样如此。

把希望寄托在“习近平倒下”上，本质还是在消费强人逻辑，只是从崇拜换成仇恨。真正的关键不在个人，而在制度。如果没有制度约束，司法、军队、宣传、官僚体系依然可以被新的掌权者无限扩张。斩首幻想只会让你忽略长期问题，而政治现实永远关注结构。

所以人们在幻想斩首习近平能带来自由，请先清醒：斩首只是事件，制度才是结构。前者短暂，后者长久。任何真正的改变，都必须从结构入手，而不是偶像。

对于我们来说，独裁政权必然灭亡，只是先别呼吸，路还很长，一切只是刚刚开始。

"Political Purge" Does Not Equal "Institutional Transformation"

This article argues that the removal or death of an authoritarian leader does not automatically lead to meaningful political change. In public discourse, events such as the capture of Nicolas Maduro or the killing of Ali Khamenei are often interpreted as decisive turning points. However, the author emphasizes that such moments are political events rather than structural transformations.

The central argument is that authoritarianism is not defined by an individual, but by a system of concentrated power. In cases such as Venezuela and Iran, authority is embedded in institutions including the military, judiciary, and ideological structures. Even if a leader is removed, these systems may remain intact and continue to function. Without structural reorganization, political outcomes are unlikely to shift toward greater openness.

The article highlights that such regimes often prepare for leadership transitions through layered succession mechanisms. This institutional resilience allows them to absorb shocks and maintain continuity. In Iran, for example, the power structure involving the supreme leader, the Revolutionary Guard, and religious oversight bodies forms a system that does not depend on a single individual. As a result, leadership change may reinforce rather than weaken centralized control.

The author warns against the illusion that removing a strongman will naturally produce democracy. Historical experience suggests that power vacuums in highly centralized systems often lead to internal reorganization rather than liberalization. In some cases, instability can even justify further consolidation of authority.

A key distinction is made between events and structures. The removal of a leader is a symbolic moment, while genuine transformation requires changes in how power is distributed, supervised, and limited. Democracy depends on institutional design, including legal constraints, independent institutions, and broadly accepted rules.

The discussion extends to China, where some voices focus on the idea of removing a top leader. The author argues that this perspective misunderstands the nature of the system, which is sustained by a complex network of party, military, administrative, and propaganda structures.

Ultimately, real political change depends on restructuring power rather than targeting individuals. The end of authoritarian rule is not defined by the fall of a person, but by the dismantling of the system that enables concentrated power.

For the full English version, please visit: www.ZYD1998.com

在中国，祷告也需要“许可证”？

——谈家庭教会的荒诞处境

作者：张帅

编辑：黄吉洲 校对：冯仍 翻译：周敏 美编：胡海宁



在很多国家，宗教信仰是一件再普通不过的事情。有人去教堂祈祷，有人去寺庙烧香，有人安静地读经、唱诗，这些都是个人的自由选择。但如果把同样的事情放到中国，有时就会变得非常“复杂”。

在中国，如果你想做基督徒，其实是有一条“标准路线”的——那就是去政府批准的“三自教会”。在那里，一切都井然有序：教会要登记、讲道要备案、活动要审批，连宗教事务都要接受行政管理。换句话说，在这里，信仰最好是“有组织、有计划、有监管”的。

问题在于，并不是所有基督徒都认为信仰需要这种管理方式。于是，一些人选择在家里、在小型聚会点读经祷告，三五个人唱诗、分享信仰，这些被称为“家庭教会”。按常识来说，这不过是一群人在家里聚会而已，但在一些地方，这却被定义为“非法宗教活动”。

于是，一幅颇具讽刺意味的画面就出现了：几个人在客厅里读《圣经》，可能会被当成需要“整顿”的对象；一场祷告会，有时会迎来警察的“现场指导”；一本普通的宗教书籍，也可能被当成需要被没收的“物品”。更有意思的是，很多家庭教会并没有公开宣传，也没有大型活动，只是简单地聚在一起祷告、读经，但在一些地方，这样的聚会仍然会被登记、询问甚至取缔。仿佛信仰这种事情，如果没有经过行政批准，就显得格外“危险”。

于是问题来了：如果祷告必须审批，那信仰还是信仰吗？

如果读经需要备案，那良心还算自由吗？很多家庭教会的成员其实并没有什么宏大的目标，他们只是希望在没有干扰的情况下表达自己的信仰。但现实却常常告诉他们一件事：在某些地方，连最安静的祈祷，也可能变成一件“需要解释”的事情。

一个社会是否真正开放，并不只体现在经济发展或城市规模上，而是体现在人们能否自由地思考、表达和信仰。信仰本应属于内心，而不是审批流程。

或许有一天，人们不再需要在客厅拉上窗帘祷告，不再担心聚会被打断，也不再需要解释为什么要读一本宗教书籍。那时，信仰才真正回到了它原本应该存在的地方——人的良心与自由之中。

In China, Does Prayer Require a "Permit"?: On the Absurd Situation of House Churches

This article examines the situation of Christian house churches in China, highlighting the contrast between officially approved religious practice and informal gatherings. In many countries, religious belief is treated as a personal matter, but in China, participation is often expected to follow state regulated channels such as the government sanctioned "Three Self Church," where activities are registered, supervised, and approved.

However, some believers prefer small, informal gatherings in private homes for prayer, reading scripture, and sharing faith. These house churches, though limited in scale and non public in nature, are sometimes classified as "illegal religious activities." As a result, ordinary practices such as reading the Bible or holding a small prayer meeting may attract administrative attention or intervention.

The article questions whether faith can remain genuine if it is subject to approval processes. It argues that religious belief should belong to individual conscience rather than bureaucratic regulation. Ultimately, it suggests that a truly open society is one in which people can think, speak, and believe freely without fear or restriction.

For the full English version, please visit: www.ZYD1998.com



如果习近平被消失，中国民主进程会是什么样？

作者：卢超
编辑：李晶 校对：程筱筱 翻译：周敏 美编：胡海宁

最近国际局势的变化快得让人眼花缭乱。从德黑兰传出的最高领袖哈梅内伊去世的消息，到南美委内瑞拉马杜罗政权的摇摇欲坠，这些“强人”的谢幕方式各不相同，但都指向了一个核心议题：当一个高度集权的统治者突然从权力版图上消失，这个国家会走向民主，还是坠入深渊？

如果把这个剧本套用在中国身上，那场景可能会比伊朗和委内瑞拉更加复杂。

1. 权力之巅的“真空效应”

目前的中国政坛，权力已经高度集中到“定于一尊”的地步。这种模式最大的弱点在于：它极度依赖个人的政治意志。如果这个“核心”突然消失，且没有一个被各方公认的接班人，中南海会瞬间进入一个“高度过热的真空期”。

在政治学里，这叫“威权脆断”。就像伊拉克的萨达姆，虽然他在位时看起来不可一世，但一旦顶层坍塌，底下的官僚系统、军方和特务机构会因为失去统一指令而陷入短暂的瘫痪。这时候，北京那些掌握实权的人，首先想的不是怎么治理国家，而是如何自保。

2. 精英阶层的“求生式改革”

参考委内瑞拉的例子，马杜罗的失势往往伴随着内部精英的“跳船”。在中国，如果领袖消失，那些原本在层层压力下噤声的官员和军方将领，会面临一个重大的选择：是继续抱残守缺，还是为了保住身家性命去拥抱变革？

这种情况下，中国很可能出现一种“自上而下”的被动转型。为了防止社会秩序彻底崩溃，或者为了换取国际社会的承认（以及撤销制裁），一部分务实派精英可能会提出“恢复集体领导”、“依法治国”等口号。这种从“一人说了算”回到“大家商量着办”的转变，往往是民主进程的第一道裂缝。

3. 地方力量的“离心力”

中国太大了，各地的利益诉求完全不同。如果北京的中央权威因为领袖消失而减弱，东南沿海那些经济发达省份的“自主意识”会迅速抬头。

这有点像当年苏联解体前的征兆：地方政府发现不再需要把大笔财政上缴给一个“指挥不动”的中央，于是开始尝试独立制定经济和民生政策。这种“地方竞争式”的松动，虽然有动荡的风险，但也为基层民主和法治提供了实验田。就像伊拉克在战后努力结束“城市军

事化”一样，中国的地方政府也可能在压力下开始尝试真正的村民选举或社区自治，以平息民众的不满。

4. “沉默大多数”的爆发

最关键的变量其实是每一个普通人。过去这些年，社会积压了很多情绪——无论是对经济放缓的焦虑，还是对高压管控的抵触。一旦那个维持高压的“核心”不在了，民众的胆量会瞬间变大。

如果出现类似委内瑞拉大选后那种大规模街头抗争，而军队又因为高层内斗而犹豫不决，那么民主进程就会进入快车道。这种时候，能否避免伊拉克式的乱局，取决于中国的中产阶级和知识分子能否迅速形成共识，建立一套基本的法律秩序，而不是陷入无止境的派系斗争。

危机还是契机？

独裁领袖的消失，从来不自动等同于民主的降临。它更像是一个“潘多拉魔盒”，里面既有混乱的风险，也藏着重生的希望。

伊朗和委内瑞拉的故事告诉我们：靠恐惧维持的忠诚，在领袖合眼的那一刻就会灰飞烟灭。中国如果走到那一天，真正的挑战不在于“谁来接班”，而在于我们能否趁着那个权力真空的间隙，把权力的笼子从一个人手里，挪到法治和选票的手里。

毕竟，一个健康的社会，不应该把十几亿人的命运，系在任何一个人的呼吸之间。因为“强人”总会死，但制度可长青。



For the full English version, please visit: www.ZYD1998.com

当独裁者成为战争成本

——从伊朗“斩首战”到台海不对称威慑

作者：《在野党》记者 缪青

编辑：周志刚 校对：熊辩 翻译：彭小梅 美编：胡海宁

一、历史的重合：“二·二八”记忆与中东政局巨震

2026年2月28日，历史在不同地理空间里发生了一次意味深长的重合。

这一天，台湾社会依然在纪念1947年的“二·二八”事件。那场血腥镇压不仅改变了台湾社会结构，也成为台湾民主化道路上一段无法回避的历史创伤。

然而就在同一天，中东政治格局发生了震动世界的剧变：美国与以色列联军发动代号“史诗狂怒”的军事行动，对伊朗最高领袖实施定点打击，终结了其长达三十七年的统治。

这场行动的象征意义迅速超越了中东地区本身。它不仅是一场军事行动，更成为21世纪战争形态变化的一个标志性事件。

对于台湾而言，这一天从此具有双重历史含义：既是记忆威权历史伤痛的纪念日，也是见证现代“斩首战”如何终结长期独裁统治的时刻。

二、战争逻辑的转变：从总体战到“斩首战”

从军事战略角度看，这次行动实际上代表着一种战争逻辑的转型。

在20世纪的两次世界大战以及冷战时期，战争的基本逻辑是“总体战”。国家之间的竞争往往依赖资源储备、工业产能与兵力规模，谁拥有更多坦克，更多飞机，更多兵员，谁就更可能取得胜利。

然而，“史诗狂怒行动”展示的却是一种完全不同的战争方式。

当伊朗最高领袖在高度严密的安全体系之内仍然被精准清除，这意味着现代战争的威慑逻辑正在发生改变。决定战争结果的关键因素，不再只是武器数量，而是是否具备对敌方决策核心实施精准打击的能力。

决定战争胜利的关键，正在从“阵地消耗”转向“决策中枢”。

这种转变，使得战争成本不再只是抽象的国家损耗，而开始直接落在具体的决策者身上。

三、伊朗案例：现代军事技术的代差现实

在哈梅内伊统治崩塌之前，伊朗长期宣称自己拥有庞大的导弹库存和先进的防空系统。

这些武器在官方宣传中被描述为能够瘫痪地区对手的“防御之盾”。



然而，这些看似强大的系统大多从未在真正的高强度电子对抗环境中接受检验。

当美国与以色列联军展开跨代际作战时，隐身技术、电子战系统与实时情报网络形成了压倒性的技术优势。伊朗原本引以为傲的防空体系在这种环境下迅速暴露出致命弱点：探测能力不足、反应速度迟缓、指挥体系混乱。

那些曾被描绘为坚不可摧的防御网络，在现实战场上几乎无法发挥作用。

这一结果再次证明，在现代战争中，技术代差往往比装备数量更具决定性。

四、北京的军事叙事与现实风险

长期以来，北京通过大型阅兵展示导弹部队和隐身战机，试图塑造一种“钢铁洪流”的战略形象。

这种叙事的目的，是通过规模优势形成心理威慑。

然而伊朗的案例提醒人们，在高度信息化战争环境中，单纯依赖武器数量并不能保证军事优势。

如果一支军队从未在真实高强度对抗环境中接受检验，其庞大的装备规模可能只是一种视觉震撼。在面对顶级电子战与隐身突防技术时，这些装备甚至可能成为精确打击的目标。

换言之，在21世纪战争中，数量优势正在被技术优势重新定义。

五、台湾的战略选择：不对称威慑

对台湾而言，这一事件提供了重要的战略启示。

台湾不可能在军费规模、人口数量或工业产能上与中国大陆进行全面对等竞争。如果陷入传统消耗战的逻辑之中，台湾将始终处于不利位置。

因此，台湾的安全战略必须建立在不对称威慑之上。这种威慑的核心，并不是摧毁对方的大量兵力，而

是让决策者在发出战争命令时必须面对个人风险。

当战争成本从国家损耗转变为对决策者自身安全的威胁时，威慑的心理效果将被大幅放大。

六、独裁体制的结构性弱点

独裁政权的一个显著特点，是权力高度集中。

这种结构在传统战争中可以提高执行效率，但在“斩首时代”却可能成为致命弱点。

因为当国家权力集中于极少数人甚至单一领袖时，整个政治体系实际上依赖于一条极其脆弱的指挥链。

一旦这一链条被切断，整个国家机器可能迅速陷入混乱。

与此相对，民主国家通常拥有更为分散的决策结构，即使个别领导人遭遇风险，国家运作仍然可以持续。

因此，“斩首威慑”对独裁体制产生的战略冲击远远大于对民主国家的影响。

七、从军事威慑到心理威慑

如果未来台湾能够与美国、日本等盟友在情报与技术领域进行深度合作，发展远程精确打击能力，那么台海安全格局可能发生根本性变化。

当潜在侵略者在计算战争成本时，不再只是考虑装备损失，而必须面对个人安全风险，战争决策本身就会变得更加困难。

这种威慑的本质，不仅是军事威慑，更是一种心理威慑。

战争的代价一旦从抽象的国家损失转变为具体的人生死，再强烈的扩张主义冲动也必须重新计算风险。

八、民主与独裁的制度对抗

归根结底，台海问题不仅是一场军事博弈，更是一场制度竞争。

民主制度的优势，在于其权力结构的韧性和合法性。

而独裁体制则往往依赖个人权威维系统治。一旦权力核心受到威胁，整个体系就可能迅速动摇。

因此，在现代战争环境下，独裁政权往往比民主国家更加脆弱。

如果台海安全战略能够建立在这种制度差异之上，那么台湾在维护民主与自由的道路上，就可能拥有更稳固的战略基础。

结语：和平的真正底牌

台海和平并不仅仅依赖武器数量或军费规模。

真正决定战争与和平的，是决策者如何计算风险。

如果有一天，北京的决策者意识到，发动战争的代价不再只是士兵伤亡，而可能直接威胁到自身统治核心的稳定，那么战争选项就可能在决策源头被长期搁置。

那时，和平才会拥有真正可靠的战略底牌。

When Dictators Become the Cost of War: From Iran's "Decapitation Strike" to Asymmetric Deterrence in the Taiwan Strait

This article examines the shift in modern warfare from traditional large scale confrontation to targeted "decapitation strikes," using a recent U.S. and Israel operation against Iran as a central case. The event, taking place on February 28, 2026, coincided with Taiwan's commemoration of the 1947 "February 28 Incident," giving the date dual symbolic meaning in both historical memory and contemporary geopolitics.

The author argues that this operation reflects a fundamental transformation in the logic of war. In the twentieth century, military outcomes depended largely on industrial capacity, troop numbers, and resource mobilization. By contrast, modern warfare increasingly emphasizes precision strikes against leadership and command structures. The successful targeting of a highly protected national leader suggests that technological capability and intelligence integration now outweigh numerical strength.

The Iran case illustrates the limits of conventional military power. Despite long standing claims of advanced missile systems and air defenses, these assets proved ineffective against coordinated operations involving stealth platforms, electronic warfare, and real time intelligence networks. The result highlights a growing reality: technological asymmetry, rather than quantity, determines battlefield effectiveness.

The article extends this analysis to China's military posture, noting that large scale displays of weapons may not guarantee actual combat resilience. Forces that lack experience in high intensity conflict environments may be especially vulnerable to precision targeting and electronic disruption.

For Taiwan, the implications are significant. Unable to match China in scale, Taiwan must adopt asymmetric deterrence. This strategy focuses not on destroying large numbers of enemy forces, but on imposing direct risk on decision makers. If initiating war exposes leaders themselves to personal danger, deterrence becomes more immediate and psychologically effective.

The author also emphasizes the structural weakness of authoritarian systems. While centralized power may improve efficiency, it creates dependency on a narrow leadership core. Removing that core can destabilize the entire system. In contrast, democratic systems, with distributed authority, are more resilient.

Ultimately, the article concludes that modern deterrence is both military and psychological. Peace depends on reshaping how leaders calculate risk, shifting the cost of war from abstract national losses to concrete personal consequences. For the full English version, please visit: www.ZYD1998.com

从黎智英案看威权体制下新闻自由与法治的系统性崩塌

——兼论现代普世人权与威权治理逻辑的根本冲突

作者：《在野党》记者 Cooper Guan
编辑：李晶 翻译：彭小梅 美编：胡海宁

一、一场被重新定义的“新闻审判”

黎智英案并非普通的刑事案件它更像是一场具有象征意义的政治审判。

案件的核心争议，不仅是个人行为是否触法，而是新闻活动本身是否被定义为国家安全威胁。在现代法治国家，新闻自由是权力监督的重要机制，而在威权政治结构中信息控制则被用作维持统治合法性的核心工具。

黎智英的审判实际上反映了一个问题：当权力将自由言论视为风险时，法律是否仍然是法律，还是仅成为政治工具。

二、新闻自由的国际法基准与现实背离

国际社会对于新闻自由与表达自由有明确规范：

世界人权宣言第 19 条，明确保障思想、良心与表达自由包括传播信息的权利。

公民权利和政治权利国际公约 ICCPR，将新闻与言论自由列为核心基本权利。

联合国人权理事会多次强调，国家安全不得成为压制媒体的模糊性理由。

黎智英案所引发的争议，恰恰集中在以下几点：

首先，国家安全概念的无限扩张。新闻评论、国际交流被纳入“危害国家安全”的范畴。

其次，法律的模糊性与追溯性适用，使行为人在事前难以判断合法边界。

第三，本案程序公正的国际质疑。包括陪审制度变化、审理透明度下降等。

当法律不再提供清晰预期时，新闻工作者面对的将不再是法律风险，而是制度性危险。

三、威权信息治理，从内容管理到思想控制

黎智英案并不是孤立事件而是更大信息管控体系的一部分。这一体系具有典型特征：

特征一，从“内容审查”升级为“意图审查”。

不再仅关注具体信息真假而是追究观点立场与其产生的潜在影响。

特征二，从“违规处罚”转向“刑事化表达”。

行政监管逐步升级为刑事指控形成寒蝉效应。

特征三，从“媒体管理”延伸至个人表达。

普通公民的社交媒体言论也被纳入管控范围。

这种模式的结果是：新闻机构趋于自我审查；公共讨论空间急剧收缩；社会共识形成机制被削弱。最终，社会失去真实信息与理性讨论能力。

四、新闻伦理的悖论，当追求真相成为风险

新闻职业伦理要求：独立调查、权力监督、公开讨论。但在被高度控制的信息环境中，这些职业要求反而可能成为风险来源。

这产生一种结构性悖论，越专业、越独立的新闻行为，越可能被视为威胁。长期来看，这影响将从传媒行业扩张至整个社会。使学术研究受限，创作表达萎缩，让公共政策失去反馈机制，最终损害国家治理本身的理性基础。

五、法治的核心不是法律文本，而是权力边界

真正的法治，不取决于律的数量，而是看法律是否限制权力，法律是否保障少数派与异见者，法律是否具有可预期性。如果法律主要用于规范言论、定义思想、惩罚批评，那么它更接近“统治技术”，而非现代意义上的法治。

黎智英案引发的国际关注，本质上并非针对个案，而是对法律工具化趋势的系统性担忧。

六、社会舆论的长远影响：信任结构的瓦解

新闻自由不仅是媒体人的权利更是社会的公共资产。

当公众意识到媒体无法独立报道、信息存在系统性过滤、表达可能带来风险，社会将出现三种长期不良后果：一是信任断裂，官方信息与民间认知脱节。二是谣言生态化，真实信息缺失反而滋生谣言。三是公共讨论极端化，中间理性空间消失。这对任何社会的稳定与发展都是长期隐患。

七、新闻自由不是特权，而是文明社会的基础设施

黎智英案，不仅关乎一个人的命运。当新闻成为罪名，社会失去的不只是记者，而是对现实共同理解能力。

现代社会的稳定，不来自沉默，而来自开放的信息流通、多元的意见表达、独立的监督机制。真正的强大，不是没有批评，而是能够容纳批评。

新闻自由、言论自由与法治原则，并非西方或东方的专属价值，而是现代文明运行的基本条件。当这些原则被侵蚀时，受损的不仅是媒体行业，更是整个社会的未来。

For the full English version, please visit: www.ZYD1998.com

当信仰被“统一管理”

——三自体制之外的宗教空间为何被压缩

作者：张超瑜

编辑：胡丽莉 校对：程筱筱 翻译：戈冰 美编：胡海宁

宗教信仰，本质上属于个人良知与内心领域。无论信或不信，选择何种方式敬拜，都应当是公民最基本的自由之一。然而，在现实治理结构下，宗教并非完全处于社会自发状态，而是被纳入严格的行政管理体系之中。这种管理逻辑，在基督教领域表现得尤为明显。

在中国大陆，官方认可的基督教组织主要是中国基督教三自爱国运动委员会（通常简称“三自教会”体系）。这一体系强调“自养、自传、自立”，并在组织、人员任命、讲道内容等方面接受统一管理。理论上，这被解释为宗教中国化与规范化治理的一部分。

问题在于，当制度只允许一种“被管理的信仰形态”存在，而对其他自发形成的宗教聚会——例如家庭教会——采取打压、取缔、罚款乃至刑事追责的方式时，信仰自由的边界就被实质性收缩。

家庭教会并非秘密组织，其成员大多只是希望在不受行政干预的情况下聚会、祷告、研读圣经。他们的核心诉求，并非政治参与，而是宗教自主。然而，在现实操作中，未经登记的宗教活动往往被视为“非法聚会”。在某些地区，甚至出现将部分宗教团体贴上“邪教”标签的做法。这种一刀切式的定性，将行政管理问题上升为意识形态问题，使得普通信徒承受极大的法律与心理压力。

在习近平提出“宗教中国化”方向后，宗教活动更加被要求与官方意识形态的协调一致。官方解释认为，这是为了防止境外势力渗透、维护社会稳定。但从权利角度看，当信仰内容与表达方式必须符合政治标准时，宗教本身的独立性就被削弱。

信仰自由的核心，不在于是否允许“信”，而在于是否允许“按照个人理解去信”。如果一个人只能在指定场所、指定话语框架下表达宗教情感，那么这种自由更像是一种被限定的许可，而不是天赋权利。

将家庭教会一概视为风险来源，本质上是对自发社会组织的不信任。这种逻辑背后，是对社会多元性的警惕。可是，一个真正稳定的社会，并不害怕多元存在。相反，压缩空间才可能制造紧张。

更重要的是，把行政登记问题与“邪教”概念混为一谈，会严重伤害法治的严肃性。“邪教”原本指向具有强制控制、精神操控或社会危害行为的极端组织。如果普通的家庭聚会也被贴上类似标签，不仅模糊法律边界，也使得真正需要防范的极端组织难以被清晰区分。

宗教问题之所以敏感，是因为它触及人的终极关怀。越是涉及内心领域，越需要谨慎。强制整合或压制，往往不会消除信仰，只会让其转入更隐蔽的空间。历史经验反复证明，信仰无法通过行政命令消失。

一个成熟的治理体系，应当区分“非法行为”与“非官方组织”之间的界限。若没有具体危害，仅因未纳入统一管理体系便被定性为问题，这种做法无异于对个人信仰选择的间接迫害。

真正的信仰自由，并不是国家替个人选择信仰路径，而是保障个人在法律框架内自主选择。允许三自教会存在，并不必然意味着必须排斥家庭教会。二者并非天然对立，除非制度将其设定为对立。

当一个人因为选择不同的敬拜方式而承担风险时，我们就需要反思：问题究竟出在信仰本身，还是出在管理逻辑？

宗教若必须服从单一组织形式，信仰便不再完全属于个人。信仰一旦被过度行政化，自由就会退居其次。对于任何社会而言，如何在治理与自由之间取得平衡，都是一道无法回避的课题。



For the full English version, please visit: www.ZYD1998.com

养活了中国的人，被中国遗弃了

——论中国农民养老困境与中共统治的道德破产

作者：周敏

编辑：周志刚 校对：熊辩 翻译：戈冰 美编：胡海宁



2026年3月，中国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在人民大会堂召开。政府工作报告宣布了一项所谓惠民举措：城乡居民基础养老金月最低标准再提高20元，由143元调整至163元。

163元折合美元，约22美元。这是这个自称世界第二大经济体的国家，给予1.3亿农村老年人的全部国家保障。

与此同时，另一组数字在同一份报告中赫然在目：2025年，中国国防预算17846亿元人民币，同比增长7.2%，折合约2458亿美元；中国GDP总量超过18万亿美元，人均GDP突破1.3万美元。习近平则在不同场合以东升西降、制度自信战略格局自居，向全世界宣扬所谓中国式现代化的历史成就。

这两组数字之间的距离，不是普通的贫富差距，而是一个政权对待其国民的基本态度的真实写照。一个军费一年增幅即超过千亿、却将最底层老人的养老金锁定在每天不足1美元的国家，其所宣扬的所谓“为人民服务”，不过是写在纸上的谎言。

若要理解今日之不公，必须回溯历史的账单。

1953年起，中共推行“统购统销”制度，以远低于市场价的价格强制收购农民粮食，再高价卖给城市。农民的血汗，成为工业化最初的积累。与此同时，户籍制度如同一道铁幕，将农民锁死在土地上，剥夺了他们自由流动、分享城市发展红利的权利。数十年来，农民以压低自身消费的方式，补贴了整个工业体系和城市生活。

改革开放后，数亿农民工涌入城市，以廉价劳动力支撑起“世界工厂”的奇迹。他们建造了摩天大厦，却

无权在那里定居；他们创造了GDP，却被排斥在社会保障体系之外。当他们蹒跚老去，返乡后等待他们的，是每月不足两百元人民币的养老金，以及政府工作报告里那句轻描淡写的“再提高20元”。

历史的债务，从未被清算。中共从未正式承认这笔欠账，更遑论偿还。

中国的养老制度，是一个蓄意设计的不平等体系。数字最能说明问题。

根据《中国劳动统计年鉴》的数据，机关事业单位退休人员月均养老金为6099元人民币，企业退休职工月均3148元；而同期城乡居民养老金（农民为主体）全国人均仅205元。前者 and 后者之比，高达30:1。这不是市场竞争的自然结果，而是国家财政主动选择的再分配方向——权力庇护的群体，获得丰厚的公共资源；无权无势的农民，得到的是象征性的施舍。

地区差距同样触目惊心。上海城乡居民养老金已经超过1490元，而多省农村老人仅领取全国最低标准143元——同处一个国家，同顶一面国旗，两者相差十倍有余。更残酷的数据是：农民的基础养老金，在多数省份甚至低于当地农村最低生活保障标准的一半，黑龙江、安徽、四川等省的农民养老金与低保标准相差两倍以上，广东省则相差逾四倍。

还有一组数据令人心酸：农民的平均预期寿命为69.55岁，城镇居民为75.21岁。农民不仅养老金更少，还比城镇人少活约6年。在一个以“全民共济”为名的养老体系中，寿命更短、贡献更多、保障更少的农民，实际上是这个体系的净输血者。

面对批评，中共的惯常辩护是：财力有限，逐步改善。这是谎言。

2025年，中国国防预算17846亿元，增幅1200亿元。若将这一年的军费增量平均分配给全国1.3亿农村老人，每人每月可增加77元，远超政府所谓倾力惠民的20元涨幅。倘若将北京冬奥会390亿美元的耗资，或一带一路数千亿美元的海外投资中的极小部分转而用于民生，农民养老困境早已可以得到根本性改善。

2025年“两会”期间，多位人大代表和政协委员提出：应将农民养老金大幅提升至每月300-500元（约40-70美元）乃至与当地低保标准看齐。浙江大学学者张翔提出“国民基础养老金”方案，建议2030年前将标准提升至每月852元。这些建议年复一年出现，年复

一年被忽视。不是预算不够，是优先级的排序——军队、维稳、形象工程在前，老农民在后。

更值得深思的是：20 元的涨幅如此微薄，政府工作报告却将其作为重大民生成就大书特书，新华社发通稿，央视做专题，地方官员齐声表态。难道不是一场精心演出的戏码——用廉价的姿态，换取廉价的合法性？

有人会问：一亿多农村老人，为何沉默？

答案如是：中共一党专政的核心逻辑，正是系统性摧毁一切有组织的抗争渠道。没有独立工会，没有自由媒体，没有反对党，没有独立的农民协会，没有真正意义上的选举。农民在政治上从来不是平等的公民。1953 年《选举法》规定，农村选区代表所代表的人口数是城市选区的 8 倍——也就是说，一个城市工人的政治权重，等于 8 个农民。这一不平等比例在 1995 年缩减为 4:1，直到 2010 年才实现名义上的同等。

在铺天盖地的宣传机器面前，许多农民甚至不知道自己有权利抱怨。从取消农业税到发放养老金，每一次微薄的“恩赐”都被包装成党和政府对人民的“深切关爱”，让本应是公民权利的东西变成了感恩戴德的理由。一位山东农民的儿子这样描述他的父母：他们觉得领了这点钱已经很幸福了。因为宣传无处不在，早已将麻木顺从解读为满意。

还有更沉重的数字。武汉大学学者刘燕舞的研究揭示，许多中国农村老人因无收入、丧失劳动力、患病、子女无暇照顾，选择以自杀结束生命。统计数据显示，2006 年至 2015 年间，每 10 万名 65 岁以上农村老人中，有 21.99 人选择自杀。更令人心碎的是，在刘燕舞的田野调查中，一位老人听说政府要发钱后说：那就先不自杀了，再挺两年。这句话，应当刻在每一个谈论“中国崛起”的人的心上。

今日之中国，是一个极为奇异的存在。在国际舞台上，它以大国身份纵横捭阖，与美国并称 G2，主导多边论坛，倡导“人类命运共同体”；在国内，它对最需要保障的群体吝啬至极，每月 163 元的养老金，甚至抵不上一张北京地铁月票的价格。

这并不是发展阶段的限制，横向比较可以更清晰。印度 2024 年农村养老金约合人民币 400 元；巴西农村最低养老金与城市最低工资挂钩，约合人民币 1800 元；即使经济体量差很远的泰国，其农村老人也可以领取基础养老金，且配套医疗覆盖更为完善。中国的问题从来不是缺钱，而是选择把钱花在哪里。

“共同富裕”是习近平近年来最高频的口号之一。然而，当我们追问：谁的富裕？答案不言而喻。中国的财富再分配，始终都在体制内循环——从国家到中南海，从城市到城市，从官员到官员。农民，始终瑟缩在这个循环之外，用沉默和忍耐，承载着这个“崛起”奇迹的底部重量。

一个社会的文明程度，体现在它如何对待最弱势的

成员。中国农民养老金问题，不只是一个轻飘飘数字游戏，不只是一个政策问题，它是关于尊严、关于公正、关于政权合法性的根本性问题。

一个不愿意善待自己农村老人的政权，不论在国际舞台上如何粉饰，其所谓“执政为民”的宣称，都是对历史的欺骗，对这片土地上每一位公民的侮辱。

老农沉默，不代表没有委屈。土地上的每一条褶皱、每一颗老茧、每一行浑浊老泪，都是这个政权亏欠人民的历史账单。历史的账，终须清算。

中国农民真的等待了太久。他们等待的，不是一次涨价 20 元的恩赐，而是作为公民理应得到的平等与尊严。



Those Who Fed China Have Been Abandoned by It: On the Pension Crisis of Chinese Farmers and the Moral Bankruptcy of CCP Rule

This article argues that a 20 yuan pension increase for rural elderly reveals deep structural inequality. Despite China's economic scale, over 130 million farmers receive minimal support. The disparity stems from decades of policies that extracted rural labor while excluding farmers from welfare systems. Pension gaps between urban and rural groups remain extreme. The author contends the issue is not lack of resources, but political priorities, showing a system that neglects its most vulnerable citizens while maintaining state power and elite interests.

For the full English version, please visit: www.ZYD1998.com

我为什么要逃离中国

作者：胡德旺

编辑：程伟 校对：程筱筱 翻译：戈冰 美编：胡海宁

我是来自安徽芜湖一个普通农民家庭。在中国生活了四十多年后，最终于 2023 年 5 月逃离了中国大陆。离开后，我才敢把在中国真实的生活经历写下来，希望让更多海外的人了解：中共所宣传的“盛世繁荣”完全是一场谎言。

一、来自长辈的血泪记忆

我的外公在上世纪六十年代所谓“三年自然灾害”中饿死。我母亲说外公的尸体停放一夜后，第二天早上她看到外公的眼睛被老鼠吃掉了。难以想象，那是个怎样饥荒的年代，老鼠饿得都能啃食人类的尸体。直到今天，她谈起这一幕仍然内心恐惧。所谓的“自然灾害”，实则是中共荒唐政策制造的人祸。什么大跃进、人民公社、大炼钢铁……都是违背人性和经济规律的一场场闹剧。然而承担后果的确是普普通通的中国民众。在那场饥荒中有多少人被饿死，多少家庭毁灭，酿成一幕幕的人间悲剧。

八十年代，噩梦再次降临。计划生育运动如同一场国家暴力。我舅母怀孕七个月时，被人举报。干部上门威胁：要么打掉孩子，要么拆掉房子。最后，在外公万般无奈下（后外婆改嫁），舅母被迫流掉了本该健康出生的孩子。这不仅仅是一次堕胎，而是中共政府强迫家庭亲手“杀死”自己的骨肉。这是怎样的一个反人类邪恶政权？！

二、一套只为压榨民众设计的制度

中共的统治，不仅给我的父辈带来了难以磨灭的伤害，也对我的人生带来各种摧残，他们更要继续的残害我的一下代。

（一）户籍制度：在中国，我们从农村走出来的人，虽然在城市工作生活那么多年，但我们的户口仍然是在农村，所以，我们的孩子也就只能在农村接受教育，尤其到高考时，学生必须要回到原户籍地参加高考。这就造成我们这些千千万万的所谓农民工家庭无法让自己的孩子跟着父母一起在城市上学、生活，也就有了所谓的千千万万的留守儿童，这些孩子长期不能跟父母一起生活，得不到父母的关爱，心理上是很容易出问题的。我的女儿就是一个典型的例子，到了大学一年级的的时候，患上了严重的抑郁症。这就是我痛恨中国的户籍制度的

一根本原因，我们在城市工作、生活、纳税，也为城市的发展作贡献，为什么我们的孩子不能跟我们一起生活、学习？这就很简单，农民工为城市做贡献可以，但城市的福利就不给农民工。这就是制度的压榨和剥削！

（二）医疗制度：医院本应该是一个救死扶伤的地方，但中国的医院却是世界上少数的商业机构，她是要以赢利为目的的，是一个牟利的机器。我的妻子因结石就医，医生直接给出两次手术的治疗方案，费用两万元。朋友介绍民间诊所，仅一千元便治愈。在中国的医院里，很多医生首先考虑的不是用怎样有效的方法进行治疗，能减少病人的痛苦。而是哪套治疗方案能给医院带来最大的利益，或者给医生本人带来更大收益。这就造成，能粘上边的高端医疗设备都用上了，该化验的不该化验的也都化验了，有时或明或暗的要个红包。。。病人是什么？只是医院收割的一个对象而已！所以，为什么在中国医院有那么多的所谓“医闹”就不足为怪了！就是专业的机构和专业的医生对病人进行坑、蒙、骗，有少数患者发现了端倪，讨要说法，就说你是“医闹”！我不能说每个医生都是这样的，但制度在这里，人性在这里，能有几个好的？

（三）教育制度：我的儿子在幼儿园就被灌输仇恨教育，回家张口就是“日本坏”“美国欺负中国”。这不是教育，而是洗脑。

我们为了给孩子能上好一点学校，每个月向政府缴 2600 多元的社保金，结果是，我们孩子只能上一般的小学，要上好一点学校，必须要在当地买房产。一套房产就是一百多万，是普通人能买得起的吗？如果没有买社保金，就只能上农民工子弟学校。这就是教育资源被中共政府用来掠夺民众经济的一个见证。

（四）经济制度：中国的法制基本就是人治，经济制度亦是如此。各种经济政策因领导一句口号或一篇讲话，就能产生根本转变。根本不以市场经济规律，或者法律法规来行事。我两次创业，先是因“环保运动”，所谓“金山银山不如绿水青山”，领导人一句口号，工厂被强拆，没有任何法律流程，更没有任何经济补偿。后因领导人一句“亲自部署，亲自指挥”疫情荒唐封控导致电商崩溃。政府随时可以改变政策，让普通人多年

努力瞬间化为乌有，而他们无需承担任何责任。

所以，在这样的环境下，企业很难真正的作长远发展。有的只有投机取巧，官商勾结！

三、离开的必然选择

通过这些年来我亲身的经历，我得出一个结论：中共政权不是一个以民为本的政府，而是一个不断制造灾难、压榨民众的邪恶政权。从大饥荒、计划生育，到户籍、教育、医疗，再到“动态清零”，我们一代又一代人被迫在各种的苦难中轮回。

离开中国，对我而言不是轻易的决定。那里是生我养我的土地，也有我最亲的亲人。但一个地方若只能带来一次次的伤害和绝望，若制度本身就是为压榨民众，剥夺民众的生存权利。那么我有什么理由留下呢？逃离就是必然的选择！

Why I Had to Flee China

This personal account explains the author's decision to leave China through family history and lived experience. The narrative begins with memories of past political campaigns. The author's grandfather died during the famine of the 1960s, and a relative was forced to terminate a pregnancy under family planning enforcement in the 1980s. These events are presented as formative experiences shaping the family's perception of the political system.

The author then describes structural challenges encountered in contemporary life. The household registration system is said to limit access to urban education for migrant families, contributing to long term family separation and psychological strain. The healthcare system is portrayed as profit driven, with patients facing high costs and inconsistent treatment approaches. In education, the author observes ideological messaging and barriers linked to housing and social security requirements. Economic policy is described as unstable, with sudden regulatory changes affecting private business and personal livelihoods.

Drawing from these experiences, the author concludes that the political system prioritizes control and stability over individual welfare. The cumulative effect of historical trauma and present day constraints leads to a sense of insecurity and lack of long term predictability. For the author, leaving China is not framed as a simple choice, but as a necessary response to a system perceived as restrictive and uncertain.

The text emphasizes that departure is both an emotional and practical decision, shaped by concern for family, future generations, and personal autonomy.

For the full English version, please visit: www.ZYD1998.com



乡愁与流亡

作者：繆青

编辑：冯仍 校对：冯仍 翻译：彭小梅 美编：胡海宁



“乡愁不是乡土的回忆，而是文化的失根。”

历史学者余英时的这句话，像一枚沉重的铁钉，深深钉进无数政治流亡者的心里。它没有华丽的修辞，却揭示了一种残酷而真实的命运：政治流亡者失去的，并不仅仅是土地，而是与土地相连的精神根系。

他们被制度放逐，被历史边缘化，被现实迫害，被语言冷落。久而久之，他们仿佛成了精神与文化之间的游魂——怀着一点微弱却顽固的火种，在异域的夜色里行走。

而这火种，叫作乡愁。

一、乡愁：从地理之痛到文化之失

“独在异乡为异客，每逢佳节倍思亲。”

王维的诗句，千百年来一直是中国人理解乡愁的经典表达。然而，对于政治流亡者而言，乡愁早已超越了节日里的思念。它更像一种缓慢而持久的疼痛，是一种难以弥合的断裂。

我的故乡在重庆，一座山水交错、历史绵长的城市。记忆里有巷口老太太摆着凉粉的小摊，有街角老荫茶馆里飘出的清香，有夏日屋檐下摇曳的芭蕉叶，也有满山盛开的三角梅。

还有那些无名的老街小巷。它们不在地图上，却在记忆里清晰如昨。

然而，我也亲眼见证过另一种重庆。在城市拆迁的年代，一夜之间，熟悉的石板街被推平，取而代之的是冷冰冰的玻璃幕墙。那像一场暴力的失忆工程，让城市忽然失去了时间的层次，也让人失去了回忆的坐标。

过去 20 余年的时间里，中国许多城市都在迅速变

得陌生而魔幻。文化的消失与制度的破坏，并非一夜之间完成，但一旦形成洪流，便像决堤的洪水，再无退路。

我在北京生活工作期间，每每回到家乡都深深感到，曾经熟悉的街道已经变得陌生。于是乡愁不再是一张机票能够解决的问题，它成为心灵深处一处无法愈合的伤口。

二、政治流亡者：最深情的爱国者

很多人无法理解，为什么海外的中国异议人士与民主党人，总在批评中国。

事实上，我们从来没有批评中国。我们批评的是“中共国”，而不是“中国”。

他们指责我们“辱华”、“不爱国”。但真正的爱国，从来不是掩盖问题，而是敢于指出问题；不是在国家生病时沉默，而是在她痛苦时发出呼喊。

沉默有时也是一种背叛。

在今天的中共国，说出问题往往需要勇气。提出问题，常常被视为“抹黑国家”；而不提出问题，则意味着放弃人民最基本的尊严。

如果一个国家真的希望变得更好，它必须学会面对真相。自由与公平，不应是国家对人民的恩赐，而是人民与生俱来的权利。

因此我始终认为，政治流亡者不是恨国者，而是更深情的爱国者。

我们并非抛弃故国，而是被故国所抛弃。我们离开的，是一种政权，而不是一种文化。我们批判的是制度的邪恶，而不是中华民族的根。

三、历史中的流亡者

乡愁并不是现代人才有的情绪。在人类历史中，流亡往往与文明相伴。

唐代的杜甫在安史之乱中漂泊半生，从长安辗转到成都草堂。在帝国崩塌的废墟里，他写下：“国破山河在，城春草木深。”短短八个字，道尽家国两重悲凉。

林语堂一生漂泊海外。他说：“我离开中国，并不是因为不爱它，正因为爱它，所以离开。”在英文世界里，他用幽默而温暖的笔调讲述中国文化，却始终带着一种无法言说的忧伤。

俄国女诗人阿赫玛托娃在丈夫被枪决、儿子入狱的年代，仍然写下《安魂曲》。她没有离开祖国，却生活

在比流亡更沉重的监视与恐惧中。她说：“我愿意为人民守夜，而不是为暴君献媚。”

托马斯·曼在纳粹上台后离开德国。他曾对友人说：“德国已经死了，可是我还在活着。”在流亡中，他写下《魔山》《布登勃洛克一家》，为自己建立了一座精神上的祖国。

回望历史，人们会发现一个奇特的现象：很多时候，文明的火种正是由流亡者保存下来的。

他们不是失败者。他们是守夜人。

四、余英时：在流亡中重建中国

在众多流亡者之中，余英时先生或许最能给予我们精神上的支撑。

他一生没有政治职位，却成为中国近代思想史上最重要的声音之一。他不依附权势，也不投机政治，却始终坚定地站在自由这一边。

他将儒家“士”的精神重新注入现代知识分子的理想：“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

他说过一句意味深长的话：“我在哪里，中国就在哪里。”

这句话，是他对流亡状态最深刻的回答。一个人即使身处异乡，只要心中仍然保存着中华文化与自由理想，中国便不会真正消失。

有时我也会一个人陷入长久的沉思。流亡者的孤独，是一种安静而漫长的孤独。

但也正是在这样的孤独里，人才能重新追问：我们是谁？我们究竟为谁而坚持？

余英时的坚持提醒我们：在自由世界里，也依然可以为中国保留一块思想的净土。

五、我的乡愁

我的乡愁，不只是重庆的街巷、三角梅与芭蕉叶。也不只是火锅的味道和青石路脚步声。

我的乡愁，是父母说话的口音，是命运多舛的外公（本人外公苏更生，是黄埔军校10期生，少将）留下的家书，是我在地下家庭教会里唱过的诗歌。

我的乡愁，是每一次听到异见人士被秘密抓捕、维权律师突然失踪、记者被封口时，那种刀割般的疼痛。

同时也是一种沉重的羞愧：他们仍在拼死抗争，而



我却幸运地活着。

我曾站在旧金山的海岸线前发呆很久。眼前是太平洋的海风，而脑海里却浮现重庆嘉陵江边的晚霞。

在美国教会朗读经文时，我会想起自己在重庆圣爱堂受洗的那个清晨。

在民主活动中喊出“言论自由”的口号时，我的脑海里又浮现出2010年刘晓波在法庭上的最后陈词：“我没有敌人，也没有仇恨……我希望我能够超越个人的遭遇去面对国家的未来，去表达我对自由中国的向往。”

那一刻，我渐渐明白：乡愁并不是一个空间坐标，而是一种精神投射。

只要我们没有放弃信仰、理性、自由与正义，我们就没有真正离开中国。

余英时先生说：“我在哪里，中国就在哪里。”这句话不是傲慢，而是一种担当。

政治流亡者的乡愁，是背负理想的疼痛。它让人疲惫，让人迷惘，却也让人更加清醒，更加坚定。

在海外，我们生活在自由世界，却不能忘记那些仍在牢狱、监控与沉默中的同胞。

因此，我们用这份乡愁提醒自己：“不放弃，不沉默，不背叛。”

我们是流亡者，但不是失根者。我们是亡国之人，却不是忘国之人。

只要守住文化的根脉，延续价值的信仰。即使身在异乡，我们依然可以成为中华文明的火种。我们的存在，本身就是另一种形式的中国。

因此我常常这样想：每一个流亡者，都是一座微弱却倔强的灯塔。

我们用不大的声音提醒世界：中国还没有自由，中国人民仍在黑暗之中。

同时也提醒自己：不要停下。不要放弃。

也许有一天，当中国拥有自由的时候，人们会回头看这段历史。那时他们也许会发现，在最黑暗的年代里，总有一些微弱的声音没有沉默；在最孤独的流亡岁月里，总有人仍然守着语言、信仰与记忆。

历史往往如此：帝国会消失，政权会更替，但人类对自由的渴望不会终结。

如果未来某一天，中国真正走向自由与宪政，也许不会有人记得我们这些流亡者的名字。但那并不重要。重要的是，在历史最寒冷的时刻，我们没有熄灭手中的火。

只要这火仍然在燃烧，中国的黑夜就不会是永恒的。

《在野党》记者 缪青 旅美随笔 03/09/2026

For the full English version, please visit: www.ZYD1998.com

3月10日，不该被遗忘

——一个流亡者对西藏人民起义日的纪念与思考

作者：冯仍

编辑：钟然 校对：熊辩 翻译：吕峰 美编：胡海宁

每年的3月10日，对很多中国人来说，往往只是日历上平常的一天。

但对藏人来说，这一天不是普通的纪念日，而是一道至今仍在流血的历史伤口。

1959年3月10日，拉萨爆发大规模抗争，随后局势急转直下，达赖喇嘛出走印度，西藏从此进入一个漫长而沉重的时代。流亡藏人把这一天称为“西藏人民起义日”或“西藏抗暴纪念日”。而中共官方则一直把这一事件定性为“武装叛乱”被“平定”的开始，并将后续叙事导向定义为所谓“民主改革”。同一段历史，被两套完全不同的话语体系长期撕扯，这本身就说明：西藏问题，从来不是一句官方定性就能掩盖过去的。

说实话，在中国生活的时候，我对这段历史几乎没有真正的了解。不是因为它不重要，而是因为我们从小到大能接触到的信息，往往早已被过滤、删改、定向灌输。很多历史，不是我们不想知道，而是中共根本不想让我们知道。就像我后来到了美国，才逐渐补上一些被遮蔽的历史真相一样，西藏的1959年，也是我到海外之后才开始认真去看、去想、去面对的一段历史。

当我慢慢了解这段历史时，我心里有一种很深的震动。因为我发现，西藏人民起义日纪念的，不只是1959年3月10日那一天的抗争，更是在纪念一个民族在强权面前不肯彻底屈服的尊严。那一天之后，很多人失去了亲人，失去了寺院，失去了土地，失去了自由，甚至失去了在自己家园中按自己方式活着的权利。达赖喇嘛流亡印度以后，西藏问题再也不是一个地方性的行政问题，而成为全世界都无法回避的人权与民族自由问题。

让我特别在意的是，美国政府对这段历史并不是沉默的。1959年11月25日，美国国务院在《美国对外关系文件集》中一份正式外交电报里写到，美国支持西藏人民的“自决原则”，并表示美国人民“怀着钦佩”看待藏人捍卫自由、反抗中共压迫统治的努力。这样的表述非常值得重视，因为它不是某个学者的评论，也不是媒体报道，而是美国国务院正视历史档案中的文字。它至少说明一点：早在1959年，美国政府内部已经意识到，这不是一个简单的“地方叛乱”问题，而是关乎人民自由与政治命运的问题。

美国国会后来也多次就3月10日作出正式记录和表态。2000年《国会记录》收录的参议院文本，明确提到1959年3月10日拉萨民众因担心达赖喇嘛安危而聚集守护，并提到随后达赖喇嘛出走印度以及中国方

面对事件的镇压叙述。到2018年，美国参议院通过 S. Res. 429，更直接把1959年西藏起义59周年纪念定为“西藏权利日”，并再次把3月10日界定为西藏人民反抗中国政府统治的历史节点。2024年，美国参议院又提出纪念西藏人民为自由而起义65周年的决议草案，继续沿用“the uprising of the people of Tibet”这样的表述。与此同时，美国国务院近年的涉藏报告，也持续把“1959年西藏起义周年”列为中国政府在西藏加强控制、限制进入和提高戒备的重要敏感时期。

这些美国政府文件当然不等于全部真相，也不意味着西藏问题已经得到解决。但它们至少留下了一个清楚的记录：这段历史不是不存在，不是没人看见，更不是中共一句“平叛”就可以永久盖棺定论的。

对我来说，纪念西藏人民起义日，还有另一层更深的感受。作为一个从中国走出来、在压制和遮蔽中一点点补上真相的人，我越来越明白：中共最害怕的，从来不只是某一次抗争，而是人们开始记住历史、重新命名历史、拒绝接受它强加的历史解释权。它害怕的不只是达赖喇嘛，不只是流亡藏人，不只是海外纪念活动，而是越来越多中国人开始意识到：那些年被定性为“叛乱”、“风波”、“动乱”的，也许恰恰是一个民族、一个群体、一些普通人捍卫尊严的时刻。

西藏人民起义日之所以重要，就在这里。

它提醒我们，一个民族即使被强权压住，也未必会真正沉默；一个历史真相即使被封锁几十年，也不等于它已经死去。每年的3月10日都是一次警醒：不要相信暴政垄断的叙事，不要让恐惧替代记忆，不要让遗忘成为帮凶。

今天我写下这些文字，不是因为我能完全替藏人发声，而是因为我作为一个中国流亡者，越来越能理解那种被体制压迫、被历史噤声、被官方叙事掩埋的痛。也正因为如此，我更愿意在这一天，郑重地向1959年3月10日站出来的藏人致敬！

他们当年守护的，不只是达赖喇嘛，也是一个民族最后的尊严。

他们留下的，也不只是一场失败的抗争，更是一段不能被中共彻底抹去的历史见证。

3月10日，不该被遗忘。

西藏人民起义日，不该被遗忘。

那些为了自由而站出来的人，更不该被遗忘。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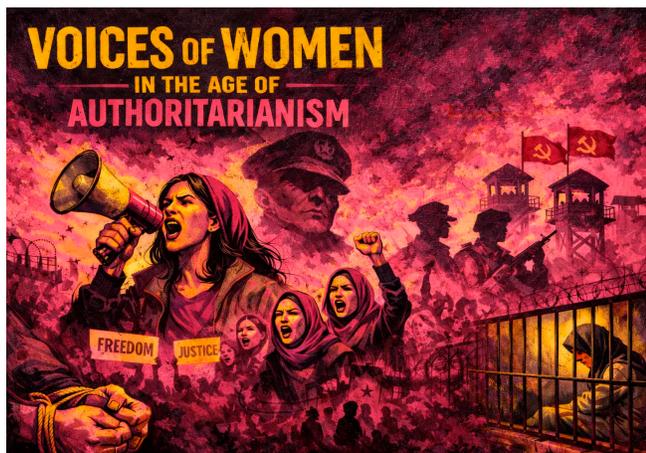
For the full English version, please visit: www.ZYD1998.com

威权时代的女性声音

——写在 2026 年的国际妇女节

作者：张致君

编辑：胡丽莉 校对：熊辩 翻译：吕峰 美编：胡海宁



三月的风吹进城市，空气带着潮湿与寒意。街角的梧桐树在风中轻轻摇晃，枝叶摩擦发出细碎的声响，像某种被压低低语。

城市看起来依然正常：地铁照常运行，咖啡店门口排着队，商场的大屏幕滚动着广告和节日祝福。

但在中国的互联网空间里，一些声音正在悄然消失。

女性博主的账号消失了，性少数群体的讨论区消失了，脱口秀演员小帕的社交媒体账号也被封禁。她们曾经写下的文字、发出的笑声、表达的愤怒与困惑，就像被风卷走的落叶，在互联网的地面上再也找不到停留的地方。

许多人曾经相信，互联网会让表达变得更加自由。但在中国，这片海洋布满了看不见的渔网。人们看不见它，却随时可能被困住。人们以为自己在自由地游动，实际上每一步都在被监控、被记录、被计算。

中国女性与性少数群体的公共表达空间正在迅速缩小。那些曾经可以被讨论的话题——身体、婚姻、性别平等、性取向、家庭暴力——逐渐被重新划入危险的领域。

红线在移动，在收紧。而这一切，并不是突然发生的。

在中国当代政治叙事中，女性问题从来不仅仅是社会问题，它同时也是一个政治问题。

长期以来，中国官方意识形态强调一种以国家发展和社会稳定为核心的国家主义叙事。在这种叙事中，个人权利往往被置于国家目标之后，而社会角色则被赋予明确的政治意义。

女性在这种叙事中通常被定义为三种角色：母亲、妻子和家庭照顾者。

这种角色定义并非偶然。随着中国人口结构迅速老龄化、出生率持续下降，人口问题逐渐被视为国家安全与经济发展的重要议题。近年来，中国政府不断鼓励生育，从二孩政策到三孩政策，再到各地推出的生育补贴和住房奖励，国家正在试图重新塑造一种以家庭和生育为核心的社会价值。

在这种政策逻辑下，女性的身体逐渐被纳入国家治理的框架。

官方媒体频繁强调婚姻与生育的重要性，一些地方政府甚至通过行政手段鼓励女性尽早结婚生子。与此同时，一些关于女性独立、性别平等或婚育选择的讨论，却被视为“西方思想”或“极端女权”。

这种意识形态上的冲突，使女性主义与国家主义之间逐渐形成张力。

女性主义关注的是个人权利、身体自主与社会平等，而国家主义更强调人口结构、社会秩序与家庭稳定。当女性开始公开讨论不婚、不育、家庭暴力或职场性别歧视时，这些讨论往往被视为对传统家庭结构和社会秩序的挑战。

因此，许多女性主义议题在中国的公共空间中逐渐被边缘化，甚至被压制。

这种冲突并不仅仅发生在网络审查或个别案件中，而是反映出一种更深层的意识形态矛盾：当国家试图通过家庭和人口政策塑造社会结构时，女性的自主选择往往成为最先受到限制的领域。

2022年初，一段来自江苏徐州农村的短视频在中国互联网迅速传播。

视频里，一个女人被铁链锁在一间破旧的小屋里。她的脖子被粗重的铁链拴在墙上，牙齿几乎全部脱落，头发凌乱，眼神空洞而惊恐。

据当地村民说，她已经为所谓的“丈夫”生下了八个孩子。

这就是后来震惊中国社会的“铁链女事件”。

许多女性在深夜刷到这段视频时，感到一种难以言说的震动。一个现代国家，一个每天谈论科技与繁荣的社会，却仍然存在这样的场景：一个女人像牲畜一样被锁在屋里，被迫不断生育。

公众开始追问：她是谁？她从哪里来？是谁把她卖到这里？

但随着调查的展开，官方通报却一次次改变说法。地方政府先称她是“精神病患者”，后来又说是“走失人口”，再后来又承认她可能是拐卖受害者。

几份通报之间互相矛盾，却始终没有给出清晰解释。

与此同时，大量前往徐州调查的志愿者和公民记者遭到警方阻拦，一些女性调查者甚至被警方带走讯问。互联网上关于铁链女的讨论迅速被删除。

一个女人被铁链锁住的身体，最终变成了一个被锁住的公共话题。

在铁链女事件之前，中国的女性主义运动就已经经历过一次重要的打击。

2015年3月，五名女性权利活动者计划在妇女节前夕发起反性骚扰宣传活动。她们原本只是计划在地铁和公交车上发放反性骚扰贴纸。

后来被称为“女权五姐妹”的她们，行动尚未开始，便被警方同时带走，以“寻衅滋事”的名义拘留。

这一事件引起国际社会关注。联合国和多个国家政府呼吁中国释放她们。37天后，她们被取保候审。

但这一事件成为中国女权运动的重要转折点。

许多女性主义组织被迫关闭，一些长期关注性别议题的NGO逐渐消失。

李翘楚长期关注劳工和女性权益。2021年，她因发布有关人权和刑讯逼供的文章被逮捕；2023年，被以“煽动颠覆国家政权罪”判刑三年八个月。

在中国，女性不仅难以讨论性别议题，也难以参与更广泛的公共事务。

2018年，中国媒体人弦子公开指控知名主持人朱军曾在央视后台对她实施性骚扰。

这一案件迅速引发中国版的#MeToo讨论。

许多女性开始公开讲述自己的经历。

但案件审理过程异常艰难，相关讨论在社交媒体上频繁被删除，弦子本人也遭遇巨大舆论压力。

2022年，北京法院判决弦子败诉。

这起案件在许多人看来，不仅是一场性骚扰诉讼，更像一次社会试验：女性是否能够公开讲述自己的经历。

答案令人沮丧。而发起“米兔运动”的黄雪琴，至今仍在狱中。

2021年，中国网球运动员彭帅在微博发布长文，指控一名高层官员性侵。

帖子在二十分钟内被删除。随后，彭帅从公众视野中消失。

国际社会要求调查，但在中国国内几乎无法讨论这一事件。后来，彭帅在官方安排的采访中表示自己“从未提出性侵指控”。

她在镜头前微笑。那种微笑平静得让人不安。

习近平上台后，中国多所大学的LGBTQ学生社团公众号被集中关闭，一些高校要求相关社团停止活动。

在官方媒体的叙述中，“性别多元”被描述为“西方文化渗透”。许多年轻人发现，她们曾经用来交流的社群一夜之间消失。

沉默再次成为一种生存方式。更多女性少数群体选择隐瞒自己的性取向，选择结婚或者形式婚姻，而性别暴力隐藏在这些不真实的关系中，许多犯罪在婚姻框架下变成“合法”。

这些现象的背后，其实还有一个更深层的政治背景：人口政策。

中国长期实行严格的计划生育政策。从1980年代的一胎政策，到后来逐步放宽为二胎，再到2021年的三孩政策。

当人口出生率持续下降时，国家的政策叙事开始发生转变。女性被越来越多地视为“人口生产者”。

官方媒体不断强调婚育责任，地方政府推出各种鼓励生育的政策——从现金补贴到住房优惠。与此同时，离婚冷静期被写入法律，一些地方开始限制单身女性冷冻卵子。

这种政策逻辑下，女性的身体再次被纳入国家治理的框架，处处彰显了中共统治下威权国家的性别政治。而在国际上中国也并不是唯一一个把性别问题纳入政治叙事的国家。伊朗的女性必须遵守严格的着装规定，2022年年轻女性马赫萨·阿米尼因“头巾佩戴不当”被道德警察拘捕并死亡，引发全国抗议。俄罗斯政府近年来强调传统家庭价值，并通过法律限制“同性恋宣传”。匈牙利总理欧尔班政府也不断强调“家庭主义”，反对性别多元政策。

这些国家的政治制度不同，但在性别议题上却呈现出相似趋势：国家试图重新定义女性角色，将其纳入民族、人口或传统价值的叙事之中。

而在这种政治逻辑下，女性与性少数群体的空间往往最先受到压缩。

从政治学的角度来看，女性运动之所以常常成为威权政府警惕的对象，并不仅仅因为性别议题本身，而是因为女性运动往往具有跨阶层、跨群体的社会动员能力。

在许多国家的历史中，女性运动往往是社会变革的重要推动力量。

女性问题几乎涉及每一个家庭。无论是婚姻、教育、就业还是生育，这些议题都与日常生活密切相关。当女性开始组织、发声和行动时，她们往往能够迅速触及广泛的社会群体。

这种广泛的社会联系使得女性运动具有一种特殊的政治潜力。

在威权体制中，政府通常通过控制媒体、压制反对

党和限制公民社会来维持权力。然而，女性议题往往从日常生活出发，很难完全被政治化，也很难完全被压制。

当一个关于家庭暴力、性骚扰或拐卖人口的事件引发讨论时，它就不仅限于一个个案，也可能迅速演变为对制度的反思。

正是如此，许多威权政府往往对女性运动保持高度警惕。

在中国，“女权五姐妹”因反对性骚扰活动而被拘留，弦子的 #MeToo 案件遭遇重重阻碍，铁链女事件的讨论被迅速压制，这些现象在一定程度上都反映出中共政府对社会动员的恐惧。

在中共的威权政治的逻辑中，任何能够跨越社会阶层、激发公众共鸣的议题，都被视为潜在的政治风险。

而女性运动，恰恰具备这样的力量。

当中国的女性开始讲述自己的经历、讨论自己的身体和权利时，这些看似私人 and 日常的议题，往往会被中共置于高度敏感的位置。

在这样的环境中，中国女性的声音就不单纯是一种社会表达，也可以被理解为一种政治行为。

历史也一再证明，极权可以压制声音，却很难彻底消灭记忆。

每一次被删除的帖子、每一个被封禁的账号、每一段被消失的讨论，都不会真正消失。它们会在人们的记忆里留下痕迹，在私人聊天、海外媒体和零散的叙述中继续流传。

铁链女的影像曾震动整个中国互联网；女权五姐妹的拘押让许多年轻人第一次意识到：性别平等也可能成为一种“敏感议题”；弦子的控诉、彭帅的失声、李翘楚的判刑，也让更多人看见权力与沉默之间的关系。

这些事件被压下了热度，但它们改变了许多人的认知。

在中共的威权社会中，权力往往试图让历史变得短暂，让公众忘记昨天发生过什么。

但社会记忆并不会完全消失。它会在新的代际之间缓慢传递，在新的语言和新的叙述中重新出现。

女性和性少数群体的声音，也许会被迫沉默一段时间，但它们不会真正消失。

因为这些声音所表达的，并不仅仅是个体的不满，而是关于尊严、身体与自由的基本问题。

三月的风仍然在城市之间吹过。

梧桐叶一片一片落下，是时间留下的痕迹。

哪怕红线不断收紧，哪怕沉默再次降临，那些微弱却真实的光点仍然存在——在记忆里，在语言里，在那些仍然愿意讲述的人心中。

Women's Voices in an Authoritarian Era

Written for International Women's Day 2026, this essay explores the gradual disappearance of women's and LGBTQ voices within China's increasingly restrictive public sphere. While daily urban life appears unchanged, online spaces reveal tightening control: feminist bloggers vanish, LGBTQ communities are shut down, and public discussions on gender, sexuality, and personal autonomy are increasingly censored. The essay argues that this contraction is not incidental but reflects deeper ideological tensions between state priorities and individual rights.

Within official discourse, women are often framed as mothers, wives, and caregivers, particularly in response to demographic concerns such as declining birth rates. Policies encouraging marriage and childbirth, alongside restrictions on alternative life choices, suggest that women's bodies are being incorporated into state governance. In this context, feminist ideas emphasizing autonomy and equality are frequently labeled as disruptive or foreign.

Several high-profile incidents illustrate these dynamics. The "chained woman" case in Xuzhou exposed human trafficking and systemic failures, yet public inquiry was constrained and information tightly controlled. The detention of the "Feminist Five" in 2015 marked a turning point, signaling official suspicion toward grassroots gender activism. The #MeToo case involving Xianzi and the disappearance of tennis player Peng Shuai further demonstrated the limits of public accountability when allegations intersect with political sensitivities. Meanwhile, LGBTQ student organizations have been shut down, reinforcing a narrowing of acceptable social expression.

The essay situates these developments within a broader pattern seen in some authoritarian contexts, where gender issues are linked to national identity, population strategy, and social order. Women's movements, with their capacity to mobilize across social groups, are often perceived as politically sensitive.

Despite censorship, the text emphasizes that memory and expression persist beyond formal suppression. Deleted posts, silenced accounts, and fragmented narratives continue to circulate privately and internationally, shaping collective awareness. Ultimately, the essay suggests that while voices may be temporarily muted, the underlying questions of dignity, autonomy, and equality remain unresolved and continue to resonate beneath the surface of controlled discourse.

For the full English version, please visit: www.ZYD1998.com

她们的苦难，不该被节日掩盖

——“三八妇女节”写给中国受压迫女性的一点纪念

作者：冯仍

编辑：黄吉洲 校对：程筱筱 美编：胡海宁



又到“三八国际妇女节”。在正常国家，这本来应该是一个尊重女性、感谢女性、为女性争取平等权利的日子。但对我这样一个从中国逃出来、如今流亡在美国的中国人来说，每到这一天，我心里想到的却不是鲜花、祝福和热闹，而是那些在中国大陆和香港，因为说真话、维权、参政、纪念历史、追问真相，而遭到打压和迫害的女性。

这些女性里面，有记者，有律师，有母亲，有学者，也有普通公民。她们并没有做什么伤天害理的事，她们很多人只是想讲一句实话，讨一个公道，守住一点做人最基本的良知。可就是这样，她们却被抓捕、被判刑、被长期羁押，被羞辱，被监控，有的人甚至失去了健康，失去了家庭，失去了自由。这样一个现实，实在让人心里沉重。

我自己也是一个中国流亡者。过去在中国的时候，因为中共长期的信息封锁，因为网络高墙，因为对言论的严密控制，很多事情我们根本不知道，或者知道得很少。那时的我，也和很多中国人一样，只能活在一个被筛选过、被扭曲过的世界里。来到美国以后，我才慢慢知道，原来这些年有这么多中国女性，在黑暗中承受了那么大的代价。她们替这个民族说出了真话，也替这个民族承受了本不该由她们承受的苦难。

这些年来，公开可见的案例已经很多。像张展，因为去武汉独立报道疫情真相，被中共判刑；黄雪琴，因为长期关注女权和社会公共议题，被重判五年；李翹楚，因为持续发声，被以“煽动颠覆国家政权罪”判刑；何方美因为替疫苗受害儿童家庭维权，最后也遭到重判。

还有更早一些的曹顺利、倪玉兰、高瑜等，她们的遭遇都说明一个问题：在中共治下，女人只要不甘心做沉默者，只要敢站出来说一句不一样的话，就随时可能成为被打击的对象。

香港的情况也是一样。过去很多人以为香港还有空间，还有法治，还有表达的自由，可是这几年大家都看得很清楚了。《港区国安法》实施后，很多香港女性也成了政治迫害的受害者。邹幸彤因为坚持纪念六四、坚持发声，被长期关押；何桂蓝因为参与民主初选被定罪；周庭、毛孟静等人，也都因为和平参与公共事务而付出了沉重代价。还有一些流亡海外的香港女性倡议者，连人在海外都仍然被通缉、被威胁，甚至家属都受到牵连。这样的政权，已经不是简单地打压异见，而是把一切不顺从、不配合、不沉默的人，都当成敌人。

让我感到特别沉痛的是，中共对女性的迫害，很多时候不只是一般意义上的政治打压，而是带着一种更阴冷、更残忍的特点。它不仅剥夺你的自由，还要羞辱你、摧毁你、孤立你，让你在身体、精神、家庭、孩子这些方面都付出更大的代价。对女性来说，这种迫害常常更深，更痛，也更让人看清这个制度的邪恶。一个真正自信、真正文明的国家，不会把说真话的女人当成威胁。只有一个极度虚弱、极度恐惧的专制政权，才会连一个记者、一个母亲、一个普通维权者都害怕。

作为一个男人，作为一个丈夫，也是一个父亲，我每想到这些事情，心里都很难平静。因为我知道，女人不是一个抽象的词。女人就是我们的母亲、妻子、女儿，是家庭里最能忍耐、最有担当、也最容易默默承受痛苦的人。如果一个社会连自己的女性都保护不了，反而去压迫她们、侮辱她们、毁掉她们，那这个社会还有什么文明可言？如果一个政权口口声声讲妇女解放，讲男女平等，结果却把敢于发声的女性送进监狱，把坚持追问真相的女性当成“危害国家安全”的对象，那这套宣传就完全是一种无耻的政治表演。

今天我人在美国，离中国已经有一段距离了。但也正因为离开了那个环境，我反而更能看清，中国最值得尊敬的一批女性，往往不是那些站在宣传舞台上的人，

而是那些在压力之下仍然没有放弃良知、没有放弃说真话的人。她们也许没有头衔，没有掌声，甚至没有多少人知道她们的名字，但她们的坚持本身，就是对谎言最有力的揭露。

我常常想，如果没有这些女性，中国社会会更加黑暗。因为正是她们，在最危险的时候站出来；在别人不敢说话的时候开口；在历史被掩盖的时候坚持记住；在整个社会都被恐惧压住的时候，仍然不肯完全低头。她们用自己的苦难，照出了这个制度的本相；她们用自己的代价，让世界知道中共所谓的“稳定”“和谐”“妇女解放”到底建立在什么之上！

所以，在这个所谓的“三八妇女节”，我更愿意把纪念留给这些真正受苦、真正勇敢的中国女性。她们不是节日宣传里的符号，不是口号里的点缀，也不是官方拿来装点门面的“妇女代表”。她们是中国苦难现实中的亲历者，是强权之下没有低头的人，是这个民族还没有彻底麻木的证明。

我写下这篇短文，也是想表达一个最简单的意思：今天纪念中国妇女，不能只讲鲜花和赞美，不能只讲成功和风光，更不能在中共制造的节日气氛中假装一切都很好，真正值得被纪念的，是那些因为坚持良知而被迫害的女性，是那些在监狱里、在看守所里、在监控之下、在流亡路上，仍然没有放弃尊严的人。

她们的苦难，不该被节日掩盖。

她们的名字，不该被沉默吞没。

她们的勇气，也不该只停留在少数人的记忆里。

愿有一天，中国的妇女节不再带着压抑和眼泪，不再有那么多人因为说真话而坐牢，因为追求公义而受罚，因为坚持尊严而被毁掉人生。到了那一天，中国妇女才算真正迎来了属于自己的节日。



Their Suffering Should Not Be Hidden by the Holiday

Written for International Women's Day, this essay reflects on the condition of women in mainland China and Hong Kong who have faced repression for speaking out, defending rights, or seeking truth. Rather than celebrating with flowers and praise, the author emphasizes remembrance of female journalists, lawyers, activists, scholars, and ordinary citizens who have been detained, imprisoned, surveilled, or otherwise punished for their actions. These women, the author argues, did not commit crimes but exercised basic moral courage by telling the truth or demanding justice.

Drawing from personal experience as a Chinese exile, the author describes how information control and censorship once obscured awareness of such cases. Only after leaving China did the scale of these women's sacrifices become fully visible. Examples cited include Zhang Zhan, Huang Xueqin, Li Qiaochu, and He Fangmei, as well as earlier figures such as Cao Shunli and Ni Yulan. Their experiences, the essay argues, demonstrate a pattern in which women who refuse silence are treated as threats.

The situation in Hong Kong is presented as part of the same trajectory. Following the implementation of the National Security Law, female activists such as Chow Hang-tung, Gwyneth Ho, and others have been prosecuted or imprisoned for peaceful political participation. Some activists abroad continue to face pressure and threats, with repercussions extending to their families.

The essay further argues that repression of women often includes psychological, social, and familial consequences beyond legal punishment, making it particularly severe. A system that claims to promote gender equality while penalizing outspoken women is described as internally contradictory. The author frames these cases as evidence of a broader environment in which dissent is equated with danger.

From a personal perspective as a husband and father, the author connects these issues to family and social values, arguing that a society that fails to protect women undermines its own moral foundation. The women highlighted are portrayed not as symbolic figures, but as individuals whose persistence exposes deeper systemic issues.

Ultimately, the essay calls for recognition of these women as central to understanding contemporary Chinese society. Their experiences, the author suggests, should be remembered not only as individual tragedies but as part of a broader narrative about rights, dignity, and public memory.

For the full English version, please visit: www.ZYD1998.com

一个说真话的人，死在谎言体制里

作者：张宇

编辑：李聪玲 校对：熊辩 翻译：戈冰 美编：胡海宁

今天，是李文亮医生去世六周年的日子。

六年前的那个夜晚，一个 34 岁的武汉医生在隔离病房里停止了呼吸。官方通报说，他死于新冠肺炎。但所有清醒的人都知道，真正夺走他生命的，并不只是病毒，而是一个把“说真话”视为威胁的政治体制。李文亮不是疫情的制造者，却成了体制失控的牺牲品；他不是公共安全的破坏者，却被当作“造谣者”按在地上训诫。

李文亮究竟做错了什么？

他没有召开记者会，没有煽动恐慌，没有对抗政府。他只是以一个医生的本能，在同行之间提醒一句：“注意防护”。这在任何一个正常社会，都是值得尊重的职业操守。但在中国，这却触碰了中国共产党最敏感、也最致命的神经——权力对信息的垄断。

正是在那一刻，李文亮被选中了。不是因为他多么出名，而是因为他足够普通。一个普通医生的声音，竟然能够动摇体制的“维护稳定”，这本身就暴露了中共政权的脆弱与恐惧。于是，训诫代替讨论，封口取代了防控，政治维稳凌驾于专业判断之上。

六年过去，中国共产党试图用“烈士”称号为李文亮盖棺定论，用时间冲淡责任，用遗忘完成洗白。但有些问题，注定无法被掩埋：如果当初没有封口，会死这么多人吗？如果真话不是罪，李文亮还会死吗？

纪念李文亮，不是为了怀旧，而是为了拒绝被再次欺骗。因为当一个政权必须靠压制真相才能维持运转时，李文亮的死亡，就不是一场悲剧的终点，而是无数悲剧的起点。

如果必须追究李文亮的“错误”，那我们首先得弄清楚：他到底做了什么。

2019 年 12 月底，李文亮在一个仅限医生的微信群中，提醒同行注意一种“类似 SARS 的不明肺炎”，建议大家加强防护。这不是公开发声，不是媒体爆料，更不是政治表态，而是一名医生在面对异常病例时，最本能、最职业、也是负责的反应。

在任何一个正常社会，这种行为只有一个名字：专业预警。

但在中国，它被定性为“散布谣言”。

这个定性本身，就已经荒谬到近乎残酷。因为如果连医生之间的专业提醒都必须等待官方允许，那么医学就不再是科学，而是政治的附庸；防疫也不再是公共卫生行为，而是一场服从测试。

问题从来不在于李文亮“说错了什么”，而在于他不该在没有得到政治许可的情况下说任何话。中国共产

党无法容忍的，并不是真假问题，而是控制权问题。真相如果不是从官方口中说出，即便完全正确，也被视为威胁；专业判断如果不服务于政治，即便挽救生命，也会被视为“不稳定因素”。

于是，一个再普通不过的医生，被拉进派出所；一张无需法庭、无需证据、无需辩护的训诫书，被强行按在他面前。那不是法律文书，而是权力向个体发出的赤裸警告：你可以是医生，但你不能先于党说话。

更讽刺的是，李文亮后来感染病毒，并最终去世，恰恰证明了他当时的判断是完全正确的。所谓“谣言”，成了现实；所谓“维稳”，成了灾难的前奏。但在中共的体系中，正确与否从来不是评判标准，服从与否才是。

因此，李文亮真正的“罪名”只有一个：他在一个以谎言维持秩序的体制里，说了一句实话。而当社会把“说实话”定义为原罪时，任何专业、任何良知、任何普通人，都会随时成为下一个李文亮。

李文亮的遭遇，迅速完成了一次高效的社会教育——它不需要文件下发，不需要会议传达，却精准地让每一个人学会了同一件事：沉默，是最安全的专业选择。

这正是中国共产党统治最可怕的地方。它并不需要对每一个人施暴，只需要让暴力被看见一次。恐惧就会像病毒一样扩散，进入制度、进入组织、进入每一个普通人的判断中。久而久之，封口不再需要命令，自我审查会自动运转。

在这样的环境中，疫情失控并不是意外，而是结果。

当早期预警被压制，当专业判断被噤声，当所有人都在等待“上面的态度”，病毒却不需要态度。它不理解维稳，不尊重权威，也不在乎政治正确。它只遵循生物学规律，而恰恰是这些规律，被中国的政治系统忽视。

更讽刺的是，当灾难已经无法掩盖，舆论开始反噬，中共并没有反思体制本身，而是迅速切换叙事：从“没有人传人”到“人民战争”；从“造谣者依法处理”到“感动中国英雄”。责任被稀释，错误被模糊，真正需要被追问的制度问题，再一次被推入沉默。

李文亮并没有等到一个真正的道歉，社会也没有等到一次真正的反省。相反，这种“以恐惧换稳定、以沉默换秩序”的治理逻辑被证明是可行的，于是被继续沿用。

从疫情到后来的一切，我们看到的是同一套模式的不断复制：

先封口，再失控；

先否认，再宣传；

先牺牲个人，再歌颂集体。

李文亮之所以重要，不只是因为他死了，而是因为他的遭遇，清楚地展示了一个事实：在一个惩罚诚实、奖励服从的体制里，灾难不是偶发事件，而是制度必然。

当整个社会被训练成“不要第一个说话的人”，当所有专业都学会向权力低头，下一次悲剧的种子其实已经种下。而它是否爆发，只取决于时间。

在李文亮去世后不久，中国共产党迅速完成了一次熟练而冷酷的叙事转换。

他被“平反”了。

他被追授“烈士”称号。

他被纳入官方纪念体系，成为可控的符号。

表面看，这是对一个逝去医生的肯定；但本质上，这是一场权力对责任的系统性逃避。

真正的问题，从来没有被回答：是谁下令训诫？依据是什么？程序在哪里？如果李文亮没有“被造谣”，为什么当初要他签字认错？如果他说的是真话，那当时惩罚他的权力，是否构成对公共安全的严重伤害？这些问题，没有调查，没有问责，也没有结果。

所谓“平反”，并不是为李文亮讨回公道，而是为了体制止血。它的目的不是厘清责任，而是尽快终结讨论；不是修正制度，而是恢复权威。通过赋予他“烈士”的身份，中共成功地把一个制度性问题包装成了一场个人悲剧，再把悲剧纳入可被管理的叙事之中。而真正需要被审视的制度，却因此逃过了清算。

更具讽刺意味的是，李文亮事件之后，同样的封口机制并没有停止。相反，它被证明是“有效的”，于是继续被复制、被常态化。对不同领域的专业人士、不同阶段的公共事件，权力依旧优先选择控制信息，而不是尊重事实。

这恰恰说明，所谓“平反”并没有带来任何制度性改变，它只是一次精心设计的情绪安抚，是对公众愤怒的临时止痛药。真正的责任人没有付出代价，真正的机制没有被拆除，真正的问题仍然完好无损。

在一个健康的社会中，纪念意味着反思，意味着改革，意味着不再重演同样的错误。而在中国，纪念往往意味着盖棺定论——不仅为逝者盖棺，也为问题盖棺。

因此，“烈士”这个称号，与其说是荣誉，不如说是一道封条。它告诉人们：故事已经结束，不必再追问；错误已经翻篇，不必再讨论；体制已经自省，不必再质疑。

但事实恰恰相反。

一个拒绝追责、拒绝反思、拒绝改变的体制，不可能从悲剧中学习。它唯一学会的，只是如何更高效地掩盖、更熟练地转移、更冷静地等待人们遗忘。

而对李文亮而言，这样的“平反”，不是安慰，而是第二次伤害。

李文亮的存在，戳破了中共长期维持的一个核心谎言——它宣称自己代表人民、保护人民、依靠专业治理国家。但当一个真正站在公共安全一线的医生被当作威胁处理时，这个谎言就瞬间破产。体制所展现的，不是

自信，而是恐惧；不是能力，而是脆弱。

更致命的是，李文亮让无数普通人意识到：问题不在于你是不是“反对党”，而在于你是否说了不该由你说的真话。

这意味着，在中国，没有“安全的诚实”。只要你的事实先于官方口径出现，只要你的判断不受政治控制，你就可能成为下一个被训诫、被噤声、被牺牲的人。这种不确定性，正是极权维持统治的关键工具。

李文亮真正留下的，并不是一句口号，而是一道无法回避的问题：如果一个社会需要靠压制医生、恐吓专业人士、封锁预警信息来维持秩序，那它到底在害怕什么？答案并不复杂。它害怕的，是事实本身；是无法被指挥、无法被统一口径、无法被“正确引导”的现实。它害怕普通人意识到：权力并非无所不知，官方叙事并非天然正确，真相并不一定掌握在权力手上。

李文亮不需要被神化。他的危险性，恰恰在于他的普通。他证明了一件让中国共产党极度不安的事实：不需要反抗者，只要还有人坚持不说谎，谎言体制就永远无法真正安全。

六年过去了，李文亮的名字仍然被允许出现，但他说过的话，却依然危险。

如果一个政权真心尊重真相，那么说出真相的人不需要以死亡换取清白；

如果一个制度真正以人民生命为先，那么预警者不会先被训诫，再被追授；

如果所谓“平反”不是谎言，那么同样的封口、同样的恐惧，就不该在六年后依然存在。

但现实是，中国共产党什么都没有改变。

李文亮的悲剧，没有终结在他的死亡那一天，而是被制度完整地继承了下来。继承的不只是训诫书这种具体手段，而是一整套以控制代替治理、以封口代替责任、以遗忘代替清算的统治逻辑。

李文亮不是体制的例外，而是体制的必然产物。

六年过去，我们真正要纪念的，不是一个已经无法说话的人，而是那个仍然悬而未决的问题：在一个惩罚诚实的国家里，我们是否已经习惯了不再开口？如果答案是肯定的，那么李文亮的死亡，就不仅是他的悲剧，也是整个社会的失败；如果答案是否定的，那么至少有一点可以确认——即使在谎言构筑的高墙之内，真相仍然在敲门。

纪念李文亮，不是为了过去，而是为了拒绝成为一个明知真相却选择沉默的人。



湾区集会声援“香港议会”

—— 关注黎智英案与宏福苑大火百日

作者：关永杰

编辑：钟然 校对：程筱筱 翻译：周敏 美编：胡海宁



当地时间3月8日，作为海外多城市联动行动的一部分，旧金山湾区中国民主人权联盟成员及关注香港事务的民众举行集会，声援流亡海外筹组的“香港议会”。本次参与联动的城市包括伦敦、洛杉矶、旧金山、纽约及拉斯维加斯。与会者在发言中谈及香港近年来政治与社会环境的变化，并关注媒体人黎智英案件及宏福苑大火百日等议题。活动由李海风主持。

李聪玲在发言中表示，自2020年《香港国安法》实施以来，香港原有的政治空间与社会环境发生巨大变化，许多民主派人士被捕或被迫流亡海外。在这样的背景下，一些流亡港人推动成立“香港议会”，希望为散居海外的香港人建立一个能够表达意见、讨论公共事务的平台，让香港人的声音继续在国际社会被听见。

杨坤在发言中谈到香港近年来的社会变化。他表示，香港曾长期以开放、法治和国际化著称，但随着北京对香港的全面接管，社会气氛明显收紧，言论环境也发生了很大变化。他认为，这种转变不仅影响香港本地居民，也让许多长期关注香港发展的海外华人感到担忧。

何冬玲在发言中提到香港媒体人黎智英的案件。她表示，黎智英创办《苹果日报》，长期支持新闻自由和民主价值，但在《国安法》实施后被控多项罪名并被重判，这一案件在国际社会引起广泛关注。她呼吁外界继续关注黎智英及其他香港政治案件，并声援仍在为自由发声的香港人。

李树青则在发言中提到宏福苑大火百日。他表示，自己在中国大陆从事建筑工程行业十多年，对相关行业

黑幕较为了解。在他看来，这场造成重大伤亡的火灾很难被简单视为普通意外，其中可能涉及行业腐败及监管缺失等问题。在香港整体政治环境发生变化的背景下，一些人也担忧，过去香港制度中的透明度与社会监督机制正在被逐渐削弱。

主持人李海风在总结发言时表示，香港曾是一个以自由、法治和繁荣闻名的国际城市，但近年来这些特质正面临严重冲击。他指出，支持海外推动成立“香港议会”，不仅是为了让流亡港人继续参与公共事务讨论，也是为了提醒国际社会持续关注香港的处境。

在随后的自由讨论环节，与会者还就香港社会变化、中国政府的统战策略以及台湾社会对相关问题的看法进行了交流。有参与者表示，香港近年来发生的变化，对台湾社会具有一定警示意义，希望台湾民众能够更加警惕来自北京方面的政治影响，不要轻信中共的统战叙事。

活动最后，现场延续此前发起的“一人一美元支持大陆良心犯”募捐行动。同时，与会者也以捐赠支持的方式声援中国“恶俗维基案”当事人牛腾宇的母亲，现场展示了她创作的部分画作。据介绍，这些画作目前是牛腾宇母亲的重要生活来源。由于在中国境内购买相关作品可能面临公安骚扰，因此部分画作寄送至美国，由李海风协助保管，并通过自愿捐赠的方式表达支持。

主办方表示，希望通过持续举办类似活动，让更多人关注香港与中国的人权状况，并为相关人士提供力所能及的支持。



For the full English version, please visit: www.ZYD1998.com

枷锁下的风骨末路狂奔

——从洛杉矶抗争看黎智英案与中共的末路狂奔

作者：赵文龙

编辑：周志刚 校对：熊辩 翻译：戈冰 美编：胡海宁

2026年2月15日，在南加州明媚却透着寒意的阳光下，一群中国民主党成员集结在洛杉矶中共领事馆前。他们手中举着的，是那位年近八旬、满头白发的守望者——黎智英的照片。这不仅仅是一场跨越太平洋的声援，更是一场关于自由意志与极权压迫的文明对垒。

作为一名长期关注中国政治与中国人权状况的中国民主党员，我必须指出：黎智英案不仅是香港法治的“葬礼”，更是中共这个独裁组织在面对现代文明价值时，因极度恐惧而陷入的末路狂奔。

欲加之罪：当新闻自由变成“危害安全”

黎智英，一位白手起家的企业家，本可以在晚年含饴弄孙、颐养天年。但他选择了留守。他创办的《苹果日报》曾是香港自由精神的灯塔，而今却成了中共口中的“反华基地”。中共以所谓的《香港国安法》对其进行政治审判，指控其“勾结外国势力”。

这何其荒谬！在一个健康的社会里，媒体监督政府、与国际社会交流是再正常不过的民主运作；但在中共的语境下，任何不愿下跪、不愿合唱的独立声音，都被冠以“卖国”之名。黎智英受审，审判的不是某一个人的罪行，而是审判香港曾经拥有的新闻自由、言论自由和司法独立。

独裁者的恐惧：为什么他们如此害怕一个老人？

中共土匪组织之所以不顾国际社会的严厉制裁，执意对黎智英进行政治迫害，根源在于其内心深处对“真话”的极度恐惧。

黎智英代表的是一种不屈的道德力量。他曾直言：“我是一个有信仰的人，我不能违背我的良知。”对于一个依靠谎言维持统治、依靠恐惧驯服人民的政权来说，这种基于信仰和良知的坚定，是比任何武器都令其颤栗的威胁。中共判刑黎智英，是试图通过“杀鸡儆猴”向全世界宣告：在它的权力辐射范围内，绝不允许存在不受掌控的灵魂。

然而，这种高压统治恰恰暴露了中共政权的脆弱。一个强大的国家不需要监狱来禁锢思想，只有内心虚弱、合法性缺失的独裁者，才需要通过摧毁一个垂暮之年的老人来维持其所谓的“稳定”。

全球联动：正义的力量在洛杉矶集结

今年2月15日的这场抗议，其意义远超行动本身。当中国民主党的同仁在洛杉矶中领馆门前喊出“港人无罪、中共放人”的口号时，他们实际上是在修补那条被

中共试图切断的自由阵线。

长期以来，中共试图将香港问题简化为“内政”，试图用民族主义的叙事来掩盖其反人类、反自由的本质。但洛杉矶的抗争者们用行动告诉世界：追求自由是人类的共性，无论是在维多利亚港还是在斯塔莫尼卡海滩，反对暴政、要求法治的声音是跨越国界的。黎智英不仅是香港的黎智英，他是全球民主阵营中一面不倒的旗帜。

结语：历史终将判决独裁者有罪

我们中国民主党在此强烈要求中共政权：立即、无条件释放黎智英！停止对香港民主派人士、维权律师及所有良心犯的政治迫害。

独裁者或许可以查封报纸，可以封锁网络，甚至可以把义士投入深牢大狱，但他们永远无法囚禁人心对光明和自由的渴望。历史的审判台早已搭建完毕，正如黎智英在狱中所展现的坚韧，真正有罪的绝不是追求自由的人，而是那些躲在铁幕后，妄图逆转历史车轮的独裁爪牙。

黎智英先生，请保重。世界各地的同仁正与你一同守候黎明。中共的暴政终将崩塌，而自由的精神将如洛杉矶的阳光一般，终会照彻神州大地。



For the full English version, please visit: www.ZYD1998.com

雕塑承载记忆，艺术见证信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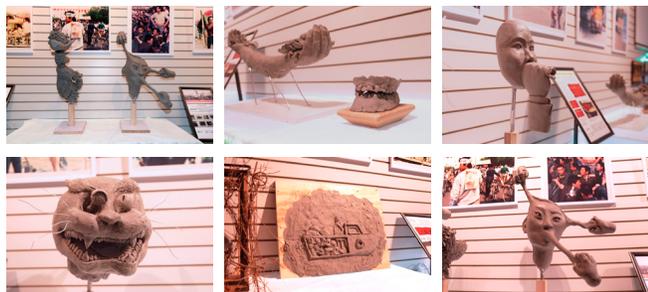
—Ella Wang 于洛杉矶六四纪念馆举办纪念王炳章主题雕塑活动

作者：邢志远
美编：胡海宁



2026年2月28日，一场以纪念中国民主运动先驱王炳章精神为主题的雕塑艺术活动在洛杉矶六四纪念馆举行。本次展出的雕塑作品由王炳章先生的孙女 Ella Wang 创作，通过雕塑这一具有历史重量的艺术形式，表达对自由价值的思考，并向为推动中国民主事业付出努力的人们致以纪念。活动吸引了来自艺术界、人权界及社区的众多人士到场参与，共同见证艺术与历史的交汇。

作为此次展览的创作者，Ella Wang 在现场介绍了自己的创作理念。她表示，自己从小在家族的记忆与故事中成长，对外公的人生经历有着深刻的情感认知。随着年龄增长，她逐渐意识到，这不仅是一个家庭的记忆，更是一段与时代紧密相连的历史。因此，她选择以雕塑作为表达方式，希望通过可触、可见的形式，让抽象的历史与信念变得具体而真实。



展出的雕塑作品采用简洁而富有力量造型语言，通过人物轮廓的延展、断裂与重构，象征个体在历史洪流中的挣扎与坚持。一些作品呈现出未完成的形态，寓意仍在延续的追求与尚未结束的历史进程。Ella Wang 表示，她希望观众在观看作品时，不仅看到艺术本身，

也能感受到其中所承载的记忆与精神。“雕塑是一种可以跨越时间的语言，它让那些无法亲历历史的人，依然能够与之产生连接，”她说道。“我希望通过这些作品，让更多人了解那一代人为信念所做出的选择，也让记忆以艺术的形式继续存在。”

活动期间，民主运动人士王丹发表讲话。他回顾了王炳章在中国民主运动历史中的重要角色，并强调记忆对于社会的重要意义。他指出，历史不仅属于过去，也影响着未来，而艺术正是让历史得以被持续看见的重要方式。“当年轻一代用自己的方式去讲述历史时，这本身就是一种延续，”他说。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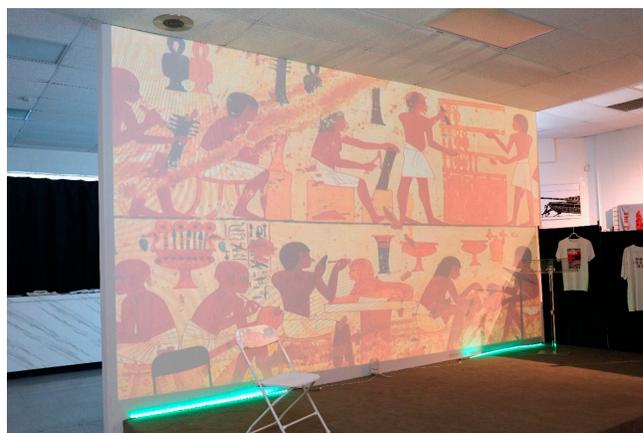


民主运动人士、《在野党》杂志社创办人朱虞夫先生亦莅临活动现场参观，并与现场来宾交流。他表示，艺术作为一种表达形式，能够突破时间与空间的限制，让更多人了解历史的真实面貌，并促使社会持续关注自由与人权的价值。





视觉艺术家协会创办人刘亚亚女士也在现场发表了主题演讲。她从艺术史的角度出发，通过解读多幅世界名画，回顾了从古至今人类对自由的不懈追求。她指出，无论是宗教时期的象征性绘画，还是现代艺术中对现实的反思，艺术始终在记录人类对尊严与权利的渴望。



在展览现场，观众们在雕塑之间缓步而行，静静驻足观看。不少参与者表示，通过 Ella Wang 的作品，他们不仅感受到艺术的力量，也更加理解了历史与个体之间的联系。一位参观者表示：“这些雕塑让人意识到，记忆不仅存在于文字中，也存在于艺术之中。”



在发言的最后，她将历史的视角带回中国，提及1989年6月4日发生在北京天安门前的事件。当时，许多大学生走上街头，表达对国家未来与民族发展的理想与诉求，却遭到武力镇压。她表示，艺术与记忆的存在，是为了让真实得以被看见，让历史不被遗忘。“艺术提醒我们，自由从来不是抽象的概念，而是无数人曾真实追求的目标，”她说道。



本次活动在洛杉矶六四纪念馆举行，使展览本身具有更深的历史象征意义。主办方表示，希望通过艺术展览与公共交流，让更多人了解历史，并鼓励公众关注自由、人权与社会发展的议题。

在安静的展厅中，雕塑无声伫立，却承载着跨越时代的重量。通过 Ella Wang 的创作，个人的记忆被转化为公共的表达，历史也以另一种形式继续被讲述。艺术不仅记录过去，也让人们在当下重新思考自由与未来的意义。



Sculpture as Memory, Art as Witness

On February 28, 2026, Ella Wang presented sculptures at the Los Angeles June Fourth Memorial Museum to honor Wang Bingzhang. Her works use abstract forms to express memory, history, and the pursuit of freedom. Speakers noted that art helps preserve historical awareness. The exhibition shows how personal memory can become shared reflection.

For the full English version, please visit: www.ZYD1998.com

藏人行政中央

—— 流亡政治与对中共统治的历史控诉

文 / 《在野党》杂志社副主编 陆乾坤
美编：胡海宁



在当代中国政治问题中，西藏问题始终是最具象征意义的议题之一。1959年之后，在印度达兰萨拉建立的藏人行政中央（Central Tibetan Administration），不仅是流亡藏人社会的政治与行政机构，更成为对中国共产党统治西藏政策进行持续批判与控诉的重要平台。

六十多年来，这一机构没有领土、没有军队、也没有国际承认的国家地位，但它却始终存在，并持续向世界讲述一个完全不同于中共官方叙事的西藏历史。

藏人行政中央的存在本身，就是对中共政治体制的一种深刻挑战。



一、1959：一场改变西藏命运的历史断裂

西藏问题的现代政治冲突，可以追溯到1950年代初。当中国共产党在内战中取得胜利并建立中华人民共和国后，新的政权迅速向西部推进。1950年，中国人民解放军进入西藏，此后西藏逐渐被纳入中共政权的政治与军事控制体系。

1959年，拉萨爆发大规模政治危机。冲突迅速升级，并最终以中共军队的全面镇压告终。第十四世达赖喇嘛

被迫离开西藏，进入印度避难。随后，大批藏人翻越喜马拉雅山脉，流亡到印度和尼泊尔。

这一事件不仅改变了西藏的政治格局，也彻底改变了藏民族的历史轨迹。

对于流亡藏人而言，1959年并不是简单的政权更替，而是一场民族政治与文化命运的断裂。许多人认为，在中国共产党高度集中化的一党专政体制下，西藏传统社会、宗教体系与民族文化将不可避免地遭遇压制甚至消失。

正是在这样的历史背景下，流亡藏人在印度建立了新的政治组织体系——藏人行政中央。



二、流亡政治：一个民族在失去国家后的自我组织

藏人行政中央最初只是一个临时行政机构，目的是协调难民安置、教育和社会事务。然而随着时间推移，它逐渐发展成为一个具有完整制度结构的流亡政治体制。

这一机构的核心结构包括：

- 行政机构“噶厦”（Kashag），负责行政事务
- 西藏流亡议会，作为立法机构
- 司法机构，负责流亡社区内部法律事务

在流亡社会中，这套制度承担着类似政府的职能。

但与传统西藏政体不同，藏人行政中央逐渐引入了现代民主制度。议员由全球流亡藏人选举产生，行政首长也通过选举产生。

2011年，第十四世达赖喇嘛宣布放弃政治权力，使流亡藏人社会完全转向民选制度。这一举措不仅是制度改革，也是一种政治宣示——

在一个由中共一党专政统治的中国周边，一个流亡民族正在尝试建立民主政治。

这种对比本身具有强烈的象征意义。

三、中共体制与西藏问题的根本矛盾

在流亡藏人的政治叙述中，西藏问题从来不仅仅是民族问题，更是制度问题。

中国共产党建立的是一种高度集中化的政治体制。在这一体制中，政治权力由单一政党垄断，社会组织、宗教活动和文化表达都必须服从国家控制。

对于藏民族这样具有独特宗教传统与文化结构的社会而言，这种政治体制往往意味着严重的冲突。

流亡藏人长期批评中共在西藏的政策，包括：

宗教控制

藏传佛教寺院与宗教活动长期受到严格监管，宗教领袖的认定也受到政治干预。

文化与语言政策

许多藏人认为，普通话教育的推广正在削弱藏语的社会地位。

政治压制

在中国现行政治体制下，任何涉及民族自治或政治改革的公开讨论几乎不可能存在。

对于藏人行政中央而言，这些问题并不是局部政策问题，而是中共体制本身的结果。

换句话说，只要一党专政的政治结构不改变，真正的民族自治就难以实现。

四、非暴力抵抗：一种政治与道义的选择

尽管对中共体制持强烈批评立场，藏人行政中央始终坚持非暴力路线。

达赖喇嘛提出的“中间道路”政策主张通过和平方式解决西藏问题，争取真正的自治，而不是通过武装冲突实现独立。

这种策略既是一种政治选择，也是一种道义姿态。

它试图向世界展示，西藏问题并非民族仇恨，而是关于人权、文化与政治制度的问题。

在国际社会中，这一立场为藏人运动赢得了广泛同情。

然而，在流亡藏人社会内部，也存在不同声音。一些年轻活动人士认为，中间道路过于温和，无法改变现实局面。因此，在近年藏人政治讨论中，出现了更多直接批评中共统治的声音。

五、文化保存：对抗同化的另一种方式

对流亡藏人而言，政治抗争不仅发生在外交舞台，也发生在文化领域。

在印度和其他国家，藏人行政中央建立了完整的藏文教育体系，使流亡藏人子女能够继续学习藏语与传统文化。藏传佛教寺院在流亡社会中重新建立，许多宗教传统得以延续。

这种文化延续在流亡藏人看来，本身就是一种政治行动。

他们认为，只要语言、宗教与文化仍然存在，民族身份就不会消失。

在面对强大国家机器时，这种文化抵抗往往比政治口号更加持久。

六、未来：历史仍在继续

六十多年过去了，藏人行政中央依然存在。这一事实本身说明，西藏问题并没有随着时间而消失。

然而，未来仍然充满不确定性。

一方面，流亡藏人社会正在经历代际变化。越来越多年轻藏人出生在海外，他们与西藏的联系更多来自文化记忆，而不是个人经验。

另一方面，中共政权的政治结构仍然保持高度稳定。在可预见的未来，中国的政治体制是否会发生根本变化，仍然是未知数。

但无论未来如何发展，藏人行政中央所代表的政治象征已经深深刻入历史。

结语

藏人行政中央不是一个传统意义上的政府。它没有领土，也没有国家主权。但它的存在提醒世界，一个民族即使失去土地，也仍然可以通过政治组织和文化传承



继续存在。

更重要的是，它持续提出一个问题：

当一个高度集权的政治体制面对多民族社会时，是否能够真正容纳文化与政治多样性？

对于许多藏人而言，这个问题至今仍然没有得到回答。

藏人行政中央组织结构

藏人行政中央（Central Tibetan Administration, CTA）成立于 1959 年，总部位于印度达兰萨拉，是流亡藏人社会的最高政治机构。其政治体系由精神领袖、行政机构、立法机构和司法机构组成。



一、精神领袖

西藏民族的精神领袖是第十四世达赖喇嘛 Tenzin Gyatso。

2011 年以后，达赖喇嘛正式退出政治权力，政治事务由民选政府机构负责。

二、行政机构

行政机构由司政（Sikyong）领导，相当于流亡政府的行政首长。

现任司政是 Penpa Tsering。

司政由全球流亡藏人选举产生，任期五年，主要负责：

- 领导政府行政工作
- 制定政策
- 代表藏人行政中央进行国际事务

行政机构称为 噶厦（Kashag），下设七个主要部门：

1. 宗教与文化部
2. 内政部
3. 财政部
4. 教育部
5. 安全部
6. 信息与国际关系部
7. 卫生部

三、立法机构

立法机构为 西藏流亡议会（Tibetan Parliament-in-Exile）。议会由全球流亡藏人选举产生，议员约 45 人，

这些候选人正是议会选举的候选人名单。

议员主要来源包括：

- 1 西藏三大传统地区
 - 卫藏（U-Tsang）
 - 康区（Kham）
 - 安多（Amdo）

2 宗教代表

藏传佛教各主要宗派。

3 海外藏人社区

例如：

- 印度与尼泊尔
- 北美
- 欧洲
- 亚洲及其他地区

议会主要职能：

- 制定法律
- 审议财政预算
- 监督行政机构

四、司法机构

司法体系由最高司法委员会（Supreme Justice Commission）组成。

主要职责：

- 处理流亡藏人社区法律纠纷
- 仲裁行政争议
- 维护法律制度运行

五、附属机构

藏人行政中央还设有多个研究和文化机构，例如：

- 西藏政策研究院
- 西藏文献与档案馆

同时，围绕西藏问题还有许多社会组织和国际支持网络，与藏人行政中央保持合作关系。

总体而言，藏人行政中央形成了一个具有行政、立法和司法结构的流亡政治体系，并在国际社会代表流亡藏人的政治与社会事务。

请访问藏人行政中央官方网站：www.tibet.com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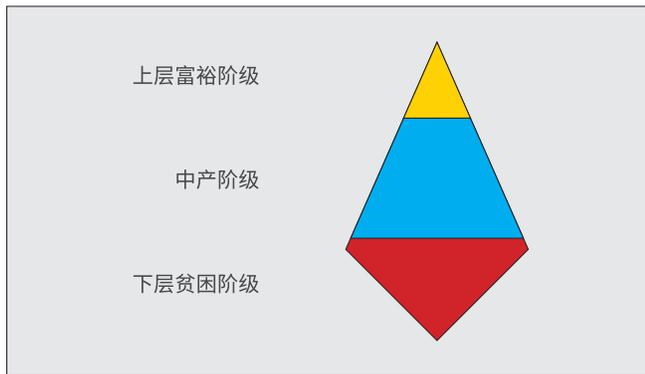
藏人行政中央司政边巴次仁于藏历 2153 年火马新年之贺词

政治民主

第二章 人性与社会结构

作者：祝正明

编辑：冯仍 校对：冯仍 翻译：吕峰 美编：胡海宁



研究人类社会的政治结构，必须首先对人的本性有一个正确的认识，政治结构本身就是以“人”作为主体的，政府要么是以管理人为目的而建立，要么是以服务于人为目的而建立，政府本身就是由人组成。因此，必须充分认识人性的弱点，才能采取针对性措施，避免人性的弱点体现在政府的行为之中。

一、人的共同习性

人是一种动物，尽管人的生活方式已经远远有别于其它任何一种动物，人不再需要去追杀猎物、采摘果实以维持生存，人类依然无法脱离动物的实质，人依然有许多与其它动物完全一样的本能。这些基本的本能需要包括：进食饮水、避暑御寒、繁育后代、保持安全、休息娱乐等，人类活动的所有内容几乎都是以满足这些本能需要为目的的。尽管在现代社会，机器的采用和生产的专业化使人类的劳作方式发生了很大变化，人们做着各种各样与直接满足本能需要无关的事情，但目的只有一个，人们由此得到的报酬可以兑换成食物、饮料、衣物、住房等满足本能需要的东西。假如没有这种交换，没有人会天生喜欢天天按规定的时间去操作乏味的机器，搬运毫无兴趣的货物，忍受肌肉的酸痛。

人其次是一种高智商的动物，在一个拥挤的世界，当人的利益发生冲突时，人懂得进行合作的好处，与自己的亲朋好友或部族组成团体，形成强大的力量，能给自己带来更大的安全，因此，人时常也会为了自己集团的利益而牺牲自己的个人利益。在集团内部，为了防止出现混乱，维持秩序，人懂得相互间需要遵守一些共同的约定，克制自己欲望，这使人表现出一定的社会性。

人与其它动物的关键区别在于人拥有巨大的记忆力。而文字和印刷术的发明则几乎又无限制地增加了人

类的记忆力。知识与经验的广泛积累与传播最终使人类改变了整个地球的面貌，同时也完全改变了自己的生活方式。但人类所有创造发明的目的可以说只有一个：以更少的劳动获得更大的收益。

好吃懒做是人的本性，人不喜欢体力劳动。

人类研究自身问题由来已久，对于那些富于好奇心的人来说，这是一个有趣的题目。有部分的人认为：“人之初，性本善，”长大以后才开始变恶。马列主义者则认为：“人性恶”的根本原因是财产的私有制，人对财产的占有欲望导致了人与人之间的矛盾冲突，并由此产生出压迫、剥削等丑恶现象。而实现财产的公有制，则可以一劳永逸地解决所有这些问题，就可以使所有的人都成为所有财产的主人，每个人的工作都是在为自己做，工作中就会产生出无穷的积极性。而所有的财产都是公共的，人人有份，人们再去占有财产已毫无意义，从而可以消除掉人的私心。当人们在为自己工作的同时也是在为他人工作，自然就会出现一种人人为我，我为人人的团结友爱的社会气氛，形成一个完美的具有无比优越性的理想社会。

然而，实践的结果表明，这个出发点很好的理论并没有成功。原因很简单，人的私心并不会因为消灭了私有制而消除，当人们努力进行单调乏味的劳动，付出酸痛不适的代价后，发现自己并不能得到与辛勤程度成比例的收获，看到的是无数的别人，甚至是看不到的人都在共同享用自己的成果。当人们以逸代劳时，分享的东西并不会明显减少，人的智慧告诉他应该怎样做就很清楚了。其结果，在经过短期的狂热以后，是惰性而不是积极性，成了财产公有制社会人的共同特征。几乎没有人一直愿意为了能让无数的人共同享用自己的成果而努力创造发明和从事劳动，社会发展停滞不前，“均富社会”成了“均贫社会”。

人是自我为中心的动物，或者说自私是人的本性。这一点在人类的婴儿身上表现得特别明显。对婴儿的仔细观察可以表明，婴儿都是以极端自我为中心的，他会毫无顾忌地想占有任何他认为是有用的东西，其动机完全出自于他自己的需要与愿望。成年人的区别仅仅在于能够克制自己的需要，懂得合作与忍耐的好处。但是，只要一有机会，婴儿的特征仍然会暴露无疑。人的私心是不可磨灭的，人只会首先从自身的角度去考虑问题，这一点并不会由于改变了财产的所有制而随之改

变，也不会因人的地位发生了改变而改变。

同样，人类学研究表明，人还是一种以家族为中心的群体活动动物，尽管人类社会已经远远有别于原始生活方式，但是，人们对自己的亲人、对朋友的关心与热情总是胜过对待陌生人。人与人之间关系的密切程度类似于洋葱的结构，一层又一层，由亲至疏。人并不愿意将自己的利益拱手让给陌生人，为陌生人作无私奉献。

人还有其它种种常见的弱点：高傲、固执、逞强、虚伪、懒惰、贪婪等等。人性特点具有可塑性，就像橡皮条。橡皮条在外力作用下可以改变自己的形状，但外力撤除后，就会很快恢复原来的形状。与此类似，人在受到外界制约时也会改变自己的本能习性，但当这种制约消失后，人性的弱点很快就会恢复。

人性远非是完美的，人性具有种种弱点和缺点，而政府官员和普通入并无两样。对人类的这些本性，在研究政治问题，构造政府结构，选任政府领导人时，是绝对不能忽视的。

当然，统治阶级并不希望人民大众认为他们是有这类缺点的。他们总是试图让民众相信，他们大公无私、谦虚好学、知识渊博、英明正确。但目的只有一个，就是让大众放心地接受他们的统治，使他们的特权能够轻轻松松地维持下去。

如果一个初衷良好的社会制度是建立在对人性的错误假设之上，过高地估计了经济所有制对人的影响，过高地估计了人对群体的责任心、积极性、同情心，忽视了人性的种种弱点，对这些弱点没有任何预防与制止措施，那么，这种社会制度在运作过程中不免会偏离原来的设想，最后扭曲、变态，给整个社会带来灾难性的后果。

在任何一个政治社会，政府都是一个最庞大的组织，没有任何其它民间社团的实力能与之相对抗，政府具有排他性，一个国家只能有一个政府。而任何人一经当权，品尝过权力的味道，就不会再自愿放弃权力。因此，一种社会制度和政府一经创立，重新再进行改造往往非常困难，绝非是在短期内由少数人就能做到的事情。

有政府就有政府官员，政府的权力总是要由政府官员来执行。这些官员在人性上和一般人并没有什么区别。然而，这些人手中却拥有巨大的权力，他们能在许多方面直接影响平民百姓的生活方式。特别是在财产公有制条件下，他们成了所有社会财产的实际支配者，直接获得了支配百姓生活的巨大权力，掌握了百姓的生杀大权。然而，这些人也贪图个人生活的方便舒适，当他们发现他们能很方便地用权力换取物质享受后，他们很快就会组成与权力大小相对应的特权阶层，享受各种不同规格的待遇，最终形成一个庞大的官僚统治阶级。

如果权力能明显地给个人利益带来巨大的好处，人们就会处心积虑地去争取官位，并培植自己的势力，试

图终身任职，甚至传给后代。如果官僚们拥有绝对的支配百姓行为的权力，在使用权力时又能不受约束，他们就会感到自命不凡而变得盛气凌人，不可一世，或者出于懒惰的本性而固执己见、麻木不仁，在遇到反抗时就会野蛮残酷地镇压，要求百姓对他们绝对服从，甚至强行驱使百姓去为他们及他们的阶级提供各式各样的服务。最终，管理者与被管理者的关系还是会演变成压迫与被压迫的关系，统治者与被统治者的关系演变成剥削与被剥削的关系。

国外有个研究小组曾经做过这样一个试验：将一批自愿接受试验的青年学生以抽签方式随机分成两组。一组人充当囚犯，另一组人充当狱警，在一起过一种类似于监狱的生活。然而，两个星期以后，研究人员发现试验已不能再继续进行下去了。他们都已经完全进入了角色。充当狱警的人开始对“囚犯”进行肆意的欺压、咒骂、虐待。而充当囚犯的人则充满了憎恨、绝望，随时准备逃跑。

这个试验对于人性是一个很好的揭露。它表明：当一部分人可以随意处置另一部分人，而对方又没有任何对付办法时，人与人之间的和睦关系就会发生重大变化。

只要有政府，有拥有权力的官员，也就永远会存在政府官员滥用权力的倾向。尽管人们可以推翻旧政府、旧官僚，由民众中间有能力，了解百姓疾苦的人掌权执政，但这些人地位发生变化后，他们的利益仍然会逐渐与平民的利益相脱离，仍然会逐渐变成新的官僚阶级，产生新的压制。这类现象在历史上周而复始，不知重复了多少次，每次只是在历史上多增加一个朝代而已。

可以认定，只要人拥有了支配他人的权力，而又不受任何制约时，藐视他人，运用权力驱使他人自己的利益服务，是当权者皆有的一种倾向，这在研究政治问题时必须深刻牢记。

尽管世界各地人类社会的形态各有不同，但是，世界各地的人种、民族在智商上并没有明显区别，有区别的只是气候、环境、习俗、经济发展水平和受教育程度。在人性的弱点上，世界各地的民族也没有区别。因此，各国在政治制度上取得的成功尝试和治理经验，完全可以互相吸取采用。

政治科学同自然科学一样，并没有国境的限制，就像任何先进的科学产品，在全世界都能够普遍适用一样，对于其真正的优越性，给人们的生活所带来的便利，全世界人民都能够感受到，并最终受到全世界人民的拥戴与欢迎，成为全人类生活中不可缺少的一部分。

但是，有些地方保护主义者尚未了解该产品的性能，却已感受到自己的利益可能受损，他们大肆强调本地区的民族习惯不同，宣称该产品不适用于该地区，排斥外界新产品，拒绝百姓接触，实际上就是以牺牲大众

的利益为代价，保护其极少数人的的特权利益。

二、人的个性差异

人有许多共同属性，但还存在明显的个性差异。人不仅在身高、体重、外貌上各不相同，而且在知识、经验、为人方式上各有不同，人有智愚勤惰之分。如果一种社会理论或制度忽视这一点，并试图使所有的人收入平等，则无疑是惩罚勤劳的人，奖励懒惰的人，抑制有能力的人，纵容无能之辈，扼杀人的创造性与积极性，培养人的惰性与庸俗性。这样的社会貌似平等，实际上并不平等。除非直到所有的人都变得同样平庸，同样懒惰，同样无能才会有真正的平等。其结果，整个社会将变得死气沉沉，停滞不前。生产的目的仅仅在于维持生命。可以说，在经济上使人人平等富裕的社会理论，虽出发点良好，但实施后必将严重阻碍社会的进步。

人的能力的差异是显而易见的，造成这种差异的原因有先天性的，也有因后天成长环境不同而造成，总之，原因多种多样。

社会要想迅速进步和发展，必须依靠有效的组织管理，这项工作并非所有的人都能做得好，只有少数出类拔萃，能力卓越的人才能胜任。

也许有人认为，精明的人整起人来更可怕，的确有这种可能。但是，假如社会允许官员滥用职权，又不会使其受到惩罚，蠢猪和天才同样都会给百姓的利益造成严重危害。社会要想避免这一点，重要的是要有完善的措施防止他们滥用职权，并随时约束和撤换他们，使其明白，想保住官位的唯一可靠办法，就是尽最大努力地为民众服务。实践证明，在严格的惩罚与制约手段面前，掌权者滥用职权的倾向是可以得到有效遏制的。

一个健全的社会，应该由这个社会最有能力的人来进行组织与管理，不仅是各级政府，企业、社团、科研机构等概不例外。只有让最精明能干，最勤奋，最有创造性的人担任重任，组成社会进步的火车头，才能保证社会得到迅速发展。

如何才能发现在智慧和才干上最适合担任某一职务的候选人？如何才能将社会的优秀分子选拔出来？这是一个良好的政治制度必须首先解决的问题。因为，有能力的人并不总是不招自来，贤才往往蛰伏在简陋陋室之中，并非是有任用权的大人物都能有机会发现的。

必须相信，人民大众的眼睛是雪亮的，他们有充分的识别判断能力，挑选出最能干的人来为自己提供最好的服务，人民大众是自身利益的最好维护者，是全社会利益的最好监护人。因此，选拔领导人的最有效方法就是由民众自己来进行广泛的、普遍的、直接的选举。

竞选过程可以培养竞选者的荣誉感，公民的信任可以增加当选者的责任心、公正性和工作热情。

同时，报酬应该与贡献相适应。由于这些人给社会所创造的价值与贡献明显大于普通人，社会应当给予充分的物质奖励。实际上，也只有充分的报酬，才能吸引

到有能力的人出来担任公共事务的组织领导工作。当然，报酬必须是公开的，限额的，绝对不能是靠权力可以去秘密捞取的。报酬过低，往往会成为腐败者捞取好处的心理借口。

政治平等与经济平等是两个不同的概念，两者并没有必然的联系，在公有制条件下，人人收入平等，并不等于人们的政治权利平等，一些人可能更完全地受制于另一些人，在经济不平等的私有制社会，经济不平等并不意味着人就无法拥有政治平等，政治平等是机会的平等，人人都有同样的机会去实施自己的权力，能取得多少财富，只取决于自己的能力，而不是特权。政治与经济对社会特征的影响可用下表表示：

	政治状态	经济状态	社会特征
一	政治平等	经济平等	乌托邦社会，安逸、贫困
二	政治不平等	经济平等	公有制社会，专制、贫困
三	政治不平等	经济不平等	封建制社会，专制、贫困
四	政治平等	经济不平等	民主社会，自由、富裕

社会绝对不应该提倡经济上的人人平等，而应该鼓励和保障具有创造力和良好组织管理能力、为社会的进步和发展作出贡献的人获得丰厚的经济回报。以有效的物质奖励，激励广大民众的创造性和积极性，这样，才能将广大民众个人的创造力转变成社会进步的巨大推动力。

当然，贫富之间不应有过大的差距，特别是由一些不合理的因素造成的贫富差距，社会不应当鼓励。比如，由于贫困而无法接受适当的教育，竞争的条件与基础不公平等。第一种情况，可以向高收入的人征收高比例的税收，对贫困的人进行补贴，提供免费的基本教育，并资助他们接受高等教育。第二种情况，应由政府进行适当干预。当产生垄断性经营时，扶持处于不利地位的弱小者。总之，还可以采取多种方法，让强者带动弱者提高生活水平，但绝对不能用简单的平均财富的方式。社会要鼓励有能力的人冒尖，又要对财富的过分集中进行适当的调控，对无能的人进行适当的补贴照顾。

实际上，任何一个社会最富有与最贫困的人在人口总数中都只占一个很小的比例。绝大多数人都处于中间水平，能维持正常而体面的生活。其分布象一个菱形，如右图所示。在一个健全的民主社会，绝大多数人的意志是可以对法律和政策起决定作用的。选举持什么样政治、经济观点的人主持政坛，完全取决于民众。应当相信，民意是能够兼顾贫富双方的利益的。

丁家喜：我要做一只不停扇动翅膀的蝴蝶，一定会引发社会变革的飓风

作者：余杰

编辑：胡丽莉 校对：毛一炜 翻译：戈冰 美编：胡海宁



丁家喜：人权律师，“新公民运动”主要活动家之一。二零一三年，被捕并于次年以“聚众扰乱公共场所秩序罪”判刑三年六个月。二零一九年，再度被捕，一直关押到二零二三年四月十日，才以“颠覆国家政权罪”判刑十二年，剥夺政治权利三年。

丁家喜，一九六七年八月十七日生于湖北宜昌宜都县香客岩村。那里是鄂西贫穷的山区，他小时候村民还在用三国时期发明的水翻车浇地，玉米、小麦都是用石磨等原始工具处理。

丁家喜的人生堪称一部波澜起伏的“四重奏”，是文革之后四十多年来中国政治经济剧变过程的缩影，也是当代中国知识人追求真理和正义的奋斗之路的缩影。他放弃了人人争先恐后、而自己已然走得风生水起的名利之路，转而走上一条少有人走的、艰难崎岖的、甚至需要牺牲最宝贵自由的道路。

丁家喜人生“四重奏”的第一乐章，是科学救国之路。这是文革后一九八零年代进入大学的那一代青年普遍的人生理想。文革期间残酷的政治斗争，大部分倒霉的知识分子都是文科出身，这让中国人对学文史哲及法律、政治等望而生畏。文革后的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又以科技开路。所以，那一代人对理工科，尤其是尖端科技趋之若鹜。丁家喜曾说：“我总是希望学那些难、但又非常实用的东西。我不想学那种难、但是不实用，或者实用却不难的东西。而航空发动机是中国到现在也没能解决的一个技术难题。”一九八六年，他以优异的成绩考上北京航空航天大学，在大学期间得过三次一等奖学金，很多课程都是满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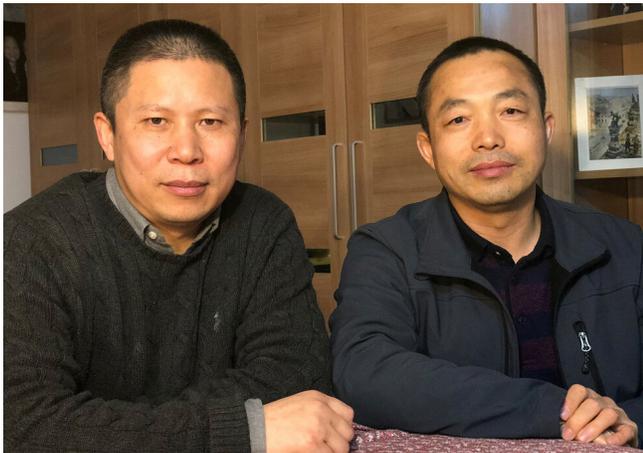
大学毕业后，丁家喜被分配到中国航发沈阳发动机研究所（六零六所）。两年后，被保送回北航读研究生。读到一半，转到飞机设计系。他的兴趣本来是做研

究，但他发现，体制内大部分研究人员的心思并不在研究上，而是赚钱、往上爬；而且，以当时的研究环境，中国在飞机设计和发动机领域很难取得重大突破。他厌倦了天天和数据、设备打交道，有了转型的想法，在业余时间考取了律师资格。研究生毕业后，他在北京的中国航天科工三院三〇四所工作了一年多，就辞职“下海”了。

丁家喜是“六四”一代，在大学校园里经历了天安门民主运动。他完全认同学运中“反官倒、反腐败、要求民主、打倒老人政治”等诉求，“说游行去，我们就跟着去；别人喊口号，我们也跟着喊；天安门广场上静坐，我们也去静坐”。他在天安门广场最长的一次待了整整三天三夜。运动后期，因为父亲意外身亡，他赶回老家奔丧，与后期的学运擦肩而过。之后，他的“六四”情结蛰伏多年，直到二零一一年到美国做访问学者，接触到大量关于“六四”及之后中国反对运动的信息，这才重新唤醒青春时代的记忆，此后每年“六四”纪念日都穿黑衣并绝食纪念——即便在狱中也坚持绝食。但他坦承：“我并不认为我的生命的选择与天安门学生运动有直接的联系。那是一个水到渠成的结果。”

丁家喜人生“四重奏”的第二乐章，是做民商律师。一九九六年六月，他从研究所辞职，转入律师这个崭新的职场。初期，他参与做过刑事案件，却发现法官通常很强势，律师难有作为，逐渐放弃刑辩这一块。他有技术背景，做民商有优势，渐渐形成了公司并购重组、投资、破产法律事务、知识产权保护等方面的专长。二零零三年四月十六日，他创建了德鸿律师事务所。第一年，事务所的收入是两百万；到二零一二年年底，已增长到两千五百万。二零一一年，他被评选为北京市十佳知识产权律师。他还担任一系列有头有脸的社会职务：北京律师协会企业重组专业委员会委员、北航创业家协会秘书长、中关村国际孵化软件协会法律委员会主任等。

丁家喜却不以此为满足。跟他打交道的大都是公司董事长、老总，与这个阶层的接触，使他有了更宽的视野来看待社会。但他仍会遇到各种不公平的案例，由此思考案例背后的共性是什么，以及是否存在改变这种现实的可能。他最初的一个选择是加入所谓“八大民主党派”之一的“中国民主同盟”，并在二零零二年至二零零七年间任民盟中央法制委员会委员。他期望通过民盟的



中国人权律师许志永、丁家喜被控颠覆国家政权获重刑

渠道，将自己对社会和法治问题的看法提交到政协或人大，以温和、渐进、改良的方式推动社会进步。

丁家喜加入民盟后，曾在一年间提出八个提案。例如，毒奶粉事件发生后，他提出关于加强奶粉质量监管的提案。然而，即便此类并不危及中共统治的提案，往往也如石沉大海。二零零三年，孙志刚事件发生后，在民盟中央法制委员会的许志永因提出废除收容遣送制度的提案，被逐出民盟。当时丁、许并无深交，但此事让他意识到民盟并不是一个正常的“政党”，其运作高度僵化。后来，他就不再参加民盟的活动了。

商业上的成功，并不能弥补丁家喜在社会和政治参与上的挫折。他发现，在中国，所有的规则往源头追，到最后往往指向同一个制度性问题。这个问题不解决，许多规则上的困境也难以真正化解。此时此刻，丁家喜对民商律师的工作逐渐失去兴趣，希望改变大学毕业以来二十年的选择。他联系了一个到美国纽约福德翰姆大学做访问学者的项目，在美国大半年的时间，像海绵一样沉浸在自由世界的信息环境中。此前，他虽是八九一代，但对之后中国民间反对运动所知甚少。这时，他才发现中国国内一直存在着绵延不断的民间行动。

在此期间，丁家喜完成了数万字的《历史的比较》等文稿。他通过比较近代以来中美不同的发展路径，逐渐形成了对制度与社会问题的进一步思考。

丁家喜人生“四重奏”的第三乐章，是在未彻底放弃民商律师身份的同时，以“业余”身份从事人权相关活动与公民行动。二零一一年十月，他从美国回到中国，与许志永再次会面并展开合作。

随着参与程度加深，他开始面临警方的频繁关注与压力。

二零一二年十二月九日，丁家喜和许志永等人发表公开信，呼吁推动官员财产公示。随后，他参与组织多地相关公民行动。

二零一三年四月十三日，他在家中被警方带走。十七日，被以“非法集会”罪名刑事拘留。

二零一四年四月十八日，北京海淀区法院以“聚众

扰乱公共场所秩序罪”判处其有期徒刑三年六个月。

丁家喜在法庭上作了名为《我要做一只蝴蝶》的最后陈述：“因要求全国人大对财产公示立法，我却成了钦定的罪犯……我要做一只蝴蝶。蝴蝶不停扇动翅膀，一定会引发社会变革的飓风。”

二零一四年七月十八日，北京市第一中级法院对丁家喜、李蔚案进行二审，以书面而非开庭审理，宣布维持原判。

Ding Jiayi: I Want to Be a Butterfly Whose Wings Never Stop, One That Will Stir a Hurricane of Social Change

Ding Jiayi, born in 1967 in rural Hubei, is a human rights lawyer and a key figure in the New Citizens Movement. His life reflects decades of political and social change in post-Mao China, moving from scientist to successful commercial lawyer, and eventually to a public advocate for civil rights.

In the 1980s, Ding studied aerospace engineering at Beihang University, representing a generation that believed science could strengthen the nation. After working in research institutes, he became disillusioned with a system that prioritized advancement over genuine innovation. He later obtained a legal qualification and entered the legal profession.

As a commercial lawyer, Ding built a successful career, founding a law firm and specializing in corporate and intellectual property law. However, repeated encounters with injustice led him to question deeper institutional problems. He joined the China Democratic League, hoping to promote reform from within, but soon realized its limited role in a tightly controlled political system.

A turning point came during his time as a visiting scholar in the United States, where he gained broader exposure to democratic ideas and civil society. After returning to China in 2011, he began working with Xu Zhiyong on civic initiatives, including campaigns advocating for officials to disclose their assets.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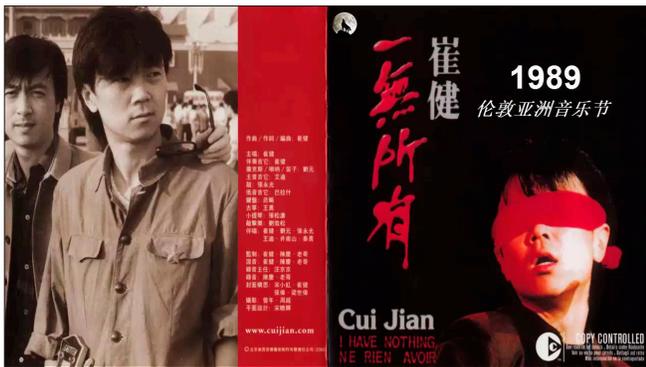
His activism brought increasing pressure from authorities. In 2013, he was detained and later sentenced to three and a half years in prison. In 2019, he was arrested again and in 2023 received a twelve-year sentence for subversion of state power.

At his trial, Ding delivered a statement titled "I Want to Be a Butterfly," expressing his belief that persistent individual action, even if small, can eventually lead to wider social change.

For the full English version, please visit: www.ZYD1998.com

再来听一遍《一无所有》

作者：余晓平
编辑：钟然 校对：熊辨 翻译：吕峰 美编：胡海宁



我们六零后听着崔健的《一无所有》走过了年轻岁月，尤其是走过了那个具有历史意义的1989年春夏之交。如今我想问现代的年轻人一个问题：如果对方一无所有，你还愿意跟着走吗？

在如今大陆的年轻人当中，可以说，为了理想而放弃物质诱惑的人已经越来越少了。这二十多年来，另一种价值观的长期灌输，使得物欲横流，也造就了在精神层面相对匮乏的一代年轻人。我不是说所有人，而是说大多数人。

其实，我们可以很容易从概率上判断：为了精神上的东西而宁愿一无所有的人，到底能占多大比例？而把物质财富作为主要判断标准的人，又能占多大比例？当物质与精神不可兼得的时候，人们到底会先放弃哪一个？

举一个大家都知道的例子：梅兰芳在日本占领时期蓄须明志，拒绝为日本人登台演出。这就是为了精神世界而放弃物质利益。再比如，当年唱《一无所有》的崔健，因为在天安门献唱被封杀多年，后又因不愿接受当局审查，拒上春晚舞台。这些人完全可以选择合作，那样财富会源源不断地到来。

但这样的人，在中华民族的历史中一直都是凤毛麟角。现实社会里，大多数人都会选择合作。几乎所有人都会说：“那也没办法，要不你来救救我，别在旁边说风凉话，要办实事。”

在这些人眼里，直接把好日子准备好，把钞票点好放在手里，或者干脆把绿卡发下来……这些物质上的东西都叫“实事”，而精神上的追求却被称为空话。这样的人，真的能过上真正的好日子吗？

好好想一想，这样的人在社会中究竟占了多大的比例。这个民族两千年的历史，很大程度上就是一部被侵

略和被奴役的历史：不是外族打进来，就是内部不断折腾自己。更滑稽的是，当一部分人欺压另一部分人的时候，欺压者往往还会大谈“稳定”的好处。

于是，越来越多的人为了蝇头小利出卖自己的灵魂。人们都希望不要一无所有，却没有真正分清物质与精神之间的区别。灵魂如果没有了，其实就是一种更深层的、一种精神上的一无所有。

还记得当年谷歌离开中国的时候，很多人认为他们放弃了中国这么大的市场，会损失天量的财富。人们看到的只是物质上的一无所有，却很少有人去思考背后的价值选择，这其实正是价值观的问题。

我们年轻的时候，资讯不畅，而且长期受到单一叙事的影响。那么，到底有什么是今天的年轻人所缺乏的？在我看来，是一种在精神上追求自由的激情。也许正是因为曾经受到长期的压抑，而改革开放初期那短暂出现的思想松动，让一部分年轻人像井底的青蛙突然跳起，看见了一片蓝天。那种对自由的渴望和追求，可以说是奋不顾身的。

而那个时代，也正是崔健的《一无所有》红遍大江南北的时候。

那种精神，也促使了大量中国年轻人远赴海外，通过艰苦的勤工俭学去追寻外面更自由的世界。那种艰难，是很难用语言完全描述的。事实上，很多能够出国移民的人，在国内完全有能力通过违心的合作获取更高的物质利益。但他们选择了承受一切从零开始的压力，在国外一无所有重新奋斗，最终换取精神上的自由。

而如今，很多人出国，追求的已经不再是精神上的东西，而更多只是物质环境上的改善。同时，在国内的很多人，则在追求物质的过程中逐渐放弃精神追求，失去了独立思考的能力，过着只要有吃有睡就满足的生活。

如果一个社会越来越多的人只满足于这种状态，那么最终的结局，往往就是被人随意摆布、任人宰割。



最后我们再来听一遍《一无所有》

我曾经问个不休
你何时跟我走

可你却总是笑我，一无所有

我要给你我的追求
还有我的自由

可你却总是笑我，一无所有

噢.....你何时跟我走
噢.....你何时跟我走

脚下这地在走
身边那水在流

可你却总是笑我，一无所有

为何你总笑个没够
为何我总要追求

难道在你面前
我永远是一无所有

噢.....你何时跟我走
噢.....你何时跟我走

脚下这地在走
身边那水在流

告诉你我等了很久
告诉你我最后的要求

我要抓起你的双手
你这就跟我走

这时你的手在颤抖
这时你的泪在流

莫非你是在告诉我
你爱我一无所有

噢.....你这就跟我走
噢.....你这就跟我走
噢.....你这就跟我走

Listen Again to "Nothing to My Name"

This essay revisits Cui Jian's song "Nothing to My Name" as a lens for examining generational shifts in values in China. For those who came of age in the late 1980s, especially around 1989, the song symbolized idealism, sacrifice, and a willingness to exchange material comfort for freedom and dignity. The author contrasts this with what he sees as a stronger focus on material success among many young people to day.

He raises a central question: if someone truly has nothing, would others still choose to follow them? In his view, fewer people are willing to prioritize ideals over tangible benefits. Over time, a value system has taken hold that equates success with wealth and stability, while treating moral conviction as impractical. When forced to choose between material security and inner values, most people choose the former.

Historical examples illustrate alternative choices. Mei Lanfang refused to perform during the Japanese occupation, sacrificing income for principle. Cui Jian faced bans after his 1989 performance but did not compromise. Such figures, however, remain rare. In everyday life, most individuals adapt to prevailing systems and justify it as necessity.

The essay criticizes a mindset that defines "practical action" only in terms of money, housing, or legal status, while dismissing ideals as empty talk. It questions whether material comfort alone can define a meaningful life. Without moral grounding, material success may conceal a deeper form of emptiness.

The author also reflects on reactions to Google's withdrawal from China, noting that many focused on economic loss while ignoring underlying value choices. This reveals a broader difficulty in distinguishing between material and non-material priorities.

Looking back, he attributes earlier generations' pursuit of freedom to the contrast between long-term restriction and brief periods of openness. Many chose to study or emigrate abroad despite hardship, starting from nothing in exchange for autonomy.

In contrast, he observes that many today pursue improved living conditions rather than ideals, while some accept a life defined by comfort and limited questioning. A society shaped by such attitudes, he warns, risks passivity.

Returning to the lyrics, the essay highlights an enduring question: what does it mean to have nothing, and what truly matters when everything else is stripped away.

For the full English version, please visit: www.ZYD1998.com

中国民主党主办

Sponsored by the China Democracy Party

《在野党》杂志社

总编辑: 朱虞夫
社长: 郑存柱
出品人: 景辉辰

荣誉主编:

毛庆祥 (发起人) 谢长发 (倡导人) 胡石根 陈西 吕耿松 查建国 陈树庆 许万平 刘贤斌 胡明君 黄燕明

副总编辑暨副社长: 鲁慧文

副总编辑: 彭小梅

轮值总编辑: 彭小梅

日本分社社长: 漠北孤侠/漠北孤侠

加拿大分社社长: 韩瑞媛

副主编: 张致君 陆乾坤

编辑部: 李聪玲 (部长) 李晶 (副部长) 钟然 (副部长) 张娜 (副部长) 冯仍 王梦梦 周志刚 Gloria Wang 赵杰 Geoffrey Jin 李堃 韩立华 张宇 黄吉洲 胡景 胡莉

美编部: 胡海宁 (部长) 阎梦菁 (副部长) 刘敖 (副部长) 宋佳航 傅贻红

收稿部: 马群 (部长) 彭小梅 (常务副部长) 彭小亮 杨长兵

信息技术部: 卢新虎 (部长) 李建伟 (副部长) 邢致远 卢超 张湘潇 程筱筱 张荣鑫

校对部: 冯仍 (部长) 熊辩 (副部长) 程筱筱 (副部长) 王滨 林小龙 孔祥庆

翻译部: 彭小梅 (部长) 吕峰 (常务副部长) 何兴强 周敏 戈冰

采访部: 巫伟杰 (部长) 林小龙 (常务副部长) 缪青 (副部长) 胡向飞 陀先润 胡景 Rong 方鹊 宋娟华 瞿成松 邢致远 [旧金山记者站]: 缪青 (站长) 侯冰封 郝剑平 庄帆

宣发部: Gloria (部长) 彭硕 (副部长) 曾群兰 (副部长) 何愚 (副部长) 夏体姗 黄吉洲 李延龙 程筱筱 张晓丽 Rong 汪洋

人权观察部: 安浦 (部长) 张维清 (副部长) 黄吉洲 (副部长) 何愚 (副部长) 胡志飞 黄子腾 陈娟 老默

外联部: 张致君 (部长) 赵杰 (副部长) 林小龙 (副部长) 常坤 张俊杰 权录军 房兰峰 汪洋 Rong 史庆梅

财务部: 朱晓娜 (部长) 高晗 (副部长) 朱小砚 (出纳) 张致君

行政部: 吕聪 (部长) 张宇 (副部长) 陈婷 (副部长)

档案部: 侯改英 (部长)

法务部: 陈闯创 郑存柱

投稿与联络方式

URL: www.ZYD1998.com
Email: zaiyedang1998@gmail.com
Tweet: @zaiyedang1998
Address: 228 N Garfield Ave #202, Monterey Park, CA 91754, USA
Telephone: +1-626-889-0419 | 张致君

亲爱的读者与战友们:

《在野党》是我们共同的火种, 承载着无数中国民主志士二十七年来前仆后继的牺牲与期盼。这份刊物从1998年的呐喊中诞生, 在铁蹄与暴力下中断, 却从未泯灭我们追求自由与正义的信念。今天, 我们《在野党》重新出发, 这不仅是一次杂志的复刊, 更是为中国民主、人权与法治而战斗的庄严誓言!

一路走来, 我们深知前方依然布满荆棘。但我们也更加明白, 只要有您的支持, 这盏希望之灯就能持续燃烧。您的每一份捐款, 都将帮助我们支付杂志制作、印刷与发行费用, 帮助我们搭建更加广阔的传播平台, 也为我们调查迫害案例、组织采访交流提供有力保障, 让《在野党》成为海内外民主力量集结的号角, 让真相与呐喊直达世界各个角落。

历史的洪流正在前行, 我们呼吁您与我们一起, 不再沉默, 不再退让! 请扫描本页二维码, 以 Zelle 捐款支持我们, 让我们手牵手、心连心, 共同守望一份对自由的承诺、一份对正义的坚持、一份对美好未来的追求!

您的善意将铭刻在《在野党》的史册中, 您的力量也将成为中国民主进步最真实、最可贵的见证!

如有国际合作与联系意向, 也欢迎通过 zaiyedang1998@gmail.com 与我们取得联系! 请关注我们的官方推特: @zaiyedang1998, 与我们保持密切互动, 共同见证并参与这场改变中国未来的努力!

抗共救国, 我们是认真的! 为了中国民主自由, 我们更加坚定!

《在野党》杂志社 敬上



可直接转账到 Zelle 账号 zaiyedang20250625@gmail.com
收款名称为: Opposition Party INC

《在野党》2026年2月接收的捐款信息如下:

捐款日期	捐款者姓名	捐款用途	捐款金额 (USD)
02.02.2026	LIBIN WEI	捐国内政治犯	\$400.00
02.02.2026	LIANJIANG WANG	定向捐朱虞夫	\$200.00
02.02.2026	LIYING DENG	捐国内政治犯	\$116.00
02.02.2026	CHANGWU LIN	捐国内政治犯	\$100.00
02.03.2026	JIE CAO	捐国内政治犯	\$300.00
02.06.2026	YANBO LIU	日常	\$20.00
02.10.2026	LIANJIANG WANG	捐国内政治犯	\$200.00
02.17.2026	JINGHUI CHEN	日常	\$2000.00
02.17.2026	QIANG WANG	捐国内政治犯	\$200.00
02.23.2026	LIANJIANG WANG	捐国内政治犯	\$200.00

幕后团队

《在野党》并非在真空中完成。

从选题策划、内容编辑、事实核实与语言转换，到版式设计、校对、发布与长期维护，每一期的完成都依赖一支长期协作、分工明确的幕后团队。

团队成员分别承担文字编辑、资料核验、翻译协调以及版式与技术支持等工作。多数情况下，他们并不出现在显眼位置，但正是这些持续、稳定的专业劳动，构成了杂志得以按期完成并保持质量的基础。

编辑与出版岗位分工说明：

一、内容策划与选题统筹

由编辑团队共同完成选题方向的确立与内容结构规划，确保刊物在价值立场、主题连续性与公共讨论深度上的一致性，构成每一期内容生产的起点。

二、记者与写作

由前线记者、特约作者及撰稿人员组成，负责采访、资料整理、事实核实与写作，为刊物提供第一手文本内容与信息来源。

三、编辑与校对

由编辑团队对稿件进行结构性编辑与语言修订，并由校对人员对定稿内容进行文字、标点、事实与格式层面的复核，确保文本准确性、严谨性与出版一致性。

四、翻译与语言支持

由翻译与语言支持人员负责中英文内容的互译与语言协调，确保各语言版本在语义、语气与信息完整性上的一致，为刊物的跨语言传播提供保障。

五、版式设计 with 出版制作

由幕后制作团队完成刊物整体版式设计 with 出版制作工作，包括版式系统设定、页面结构规划、文字与图像编排、双语内容技术适配，以及印刷与数字版本的最终文件输出与校验。该环节承担将内容转化为可持续出版成品

七、发行与传播支持

由相关支持人员协助完成刊物发布、传播渠道协调与读者反馈整理，使出版成果进入公共视野并形成持续影响。

荣誉墙



马群，中国民主党党员，现任《在野党》收稿部部长。任职以来，认真履行岗位职责，负责刊物稿件征集、来稿初审等工作，统筹投稿流程衔接与作者沟通协调，保障稿源渠道畅通有序。

她工作中严格落实稿件初审规范，扎实做好基础质量把关与流程管理，协助提升编辑审稿效率；通过优化收稿流程与协作机制，有效提升团队运转效率，为刊物稳定出刊和内容建设提供坚实保障。



黄吉洲，中国民主党党员，现任《在野党》人权观察部副部长，兼编辑与宣发工作。主要参与人权议题资料整理、内容编辑审核及对外传播，保障刊物内容准确输出。

他在工作中注重资料核实与逻辑梳理，提升信息可靠性与表达严谨性；在编辑与宣发协同中，优化内容呈现与传播路径，增强传播效果，为刊物内容建设与对外传播提供支持。

根敦確吉尼瑪 (Gedhun Choekyi Nyima, 1989 -) 第十一世班禪喇嘛 · 世界最年輕的政治失蹤者

六歲那年，他被認定為西藏最高宗教領袖之一；三天後，他從世界的視野中消失。自1995年至今，他的名字仍在國際社會的追問中回響。一個孩子的失蹤，成為一個民族記憶的傷口，也成為信仰與權力衝突最沉重的象徵。

有些名字，被帶走；但歷史不會忘記。

